

甘肃史志



2014.2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

甘青宁三省（区）地方志工作座谈会在兰州召开



6月13日上午，甘青宁三省（自治区）地方志工作座谈会在兰州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王伟光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由中国社科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李培林主持，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党组书记田嘉、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李富强出席会议。

在座谈会上，甘肃及青海、宁夏的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人汇报了各地贯彻落实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的情况，兰州、白银、庆阳、酒泉等8市地方志办公室负责人在会上进行了交流发言。会议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工作建议。

王伟光对近年来三省（区）地方志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各地要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地方志工作人员要热爱本职工作，并充分认识其重要性；要加强督办检查力度，依法推进地方志工作；要健全机构，落实编制，加大投入，全面改善地方志工作条件；要切实加快修志编史进度，并保证志书的出版质量。王伟光强调，各地要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切实做到领导到位，地方志工作部门要积极开展读志用志活动，做好地方志服务社会的工作。

握手

钱 旭

我要和上帝握手，
不管你是否灵验，
我今生今世求你保佑；
我要和阎王握手，
虽然我还活着，
但死后请你给我自由。

我要和领袖握手，
虽然我不是领袖，
但我也有同样的胸怀和谋筹；
我要和乞丐握手，
虽然我没有沦为乞丐，
但谁都可能有落难的时候。

我要和哲人握手，
虽然我没有哲学家的头衔，
但我同样阅尽古今看破春秋；

我要和疯子握手，
虽然我不是疯子，
但我也有呐喊狂奔的时候！

我要和淑女握手，
虽然你嫌弃我相貌丑陋，
但你会羡慕我精神富有；

我要和荡妇握手，
虽然我讨厌你举止放浪，
但我欣赏你体态风流。

我要和君子握手，
因为我敬仰君子，
君子之交如日月长流；

我要和小人握手，
因为我害怕小人，
多少豪杰在小人面前栽了跟头。

我要和幸运握手，
虽然幸运并不爱我，
但我懂得珍惜那天赐之酬；

我要和厄运握手，
虽然我曾厄运缠身，
但我从不向厄运低头！

我要和昨天握手，
虽然昨天有辛酸苦辣，
但没有昨天怎能有今天的成就？

我要和明天握手，
明天正在向我召唤，
岁月不让我驻足停留……



甘 肃 史 志

季 刊

2014 年第 2 期
(总第 18 期)

(史志资料 免费交流)

甘新出连续性内部资料
准印证 G01—0098 号

卷首语

握手钱 旭(1)

特 载

李克强总理对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批示.....(4)

刘延东与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
部分代表座谈时的讲话(5)

王伟光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7)

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纪要(16)

工作论坛

浅析加强地方志建设的必要性和现实性 柴永亮(19)

践行群众路线 打造“民牌”方志 闫 亮(21)

理论研究

敦煌文化的特征孙占鳌(22)

浅论陇东根据地的社会教育 关润鸿(27)

志鉴编研

二轮修志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何成才(30)

提高志书可读性的几点思考..... 张国彦(34)

浅议如何解决二轮修志过程中资料收集难的问题
.....杜小军(36)

录

篇目选登

金川区志(38)

史海钩沉

张维与《陇右金石录》

——《陇右金石录》校点序例 赵逵夫(45)

从礼县大堡子山乐器坑出土乐器看秦国早期的礼乐文明

.....魏泽民(49)

武都万象洞洞壁题记探微 董云飞(53)

历史回眸

民国时期甘肃工业 安文迟(57)

1960年上肖“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第一师”案

.....镇原县地方志办公室(65)

乡土民情

散见于西北地区的旧式婚姻 潘硕珍(70)

家乡的中秋节 潘硕珍(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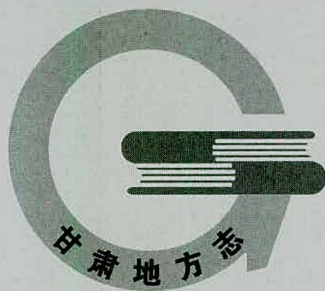
志苑随笔

百年沧桑向君寺 令陆胤(77)

力量的源泉 桂发荣(78)

联村联户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关于致社会各界参与甘肃双联行动的倡议书(80)



《甘肃史志》编委会

主 任:李 虎

副 主 任:车安宁 钱 旭

李振宇 孙奇明

编委委员:杨东海 李拾良

贺红梅 张正龙

石为怀

主 办 单 位: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甘肃史志》编辑部

主 编:李 虎

副 主 编:钱 旭

编辑部主任:贺红梅

责 任 编 辑:梁兴明 陈 谦

孔令奇 石战涛

司德芳 高天成

王 旭

本 期 责 编:孔令奇

联 系 地 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广场
南路 51 号统办一号楼九楼

邮 编:730000

电 话:0931-8960622

电 子 邮 箱:gsdfz911@163.com

印 刷:甘肃省政协办公厅印刷厂

电 话:0931-8960384

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

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存史、育人、资政，做好编修工作十分重要。五年来，全国广大地方志工作者执着守望、辛勤耕耘，地方志工作成绩斐然，这项事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谨向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修志问道，以启未来。希望你们继续秉持崇高信念，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以求真存实的作风进一步做好地方志编纂、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李克强

2014年4月16日



与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 部分会议代表座谈时的讲话

(2014年4月19日)

刘延东

今天召开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这是地方志工作中的一件大事。刚才听了伟光同志的情况汇报，感到很受鼓舞。首先，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在座的各位并通过你们向全国广大地方志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诚挚的问候！

地方志是传承和彰显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瑰宝。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习近平总书记2月25日考察首都博物馆时强调，搞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李克强总理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专门作出重要批示，他指出，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存史、育人、资政，做好编修工作十分重要。五年来，全国广大地方志工作者执着守望、辛勤耕耘，地方志工作成绩斐然，这项事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谨向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修志问道，以启未来。希望你们继续秉持崇高信念，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以求真存实的作风进一步做好地方志编纂、管理和开发利用工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的重要讲话和批示深刻阐述了做好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意义，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立意高远、催人奋进，对地方志事业和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

过去五年，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指导下，经过全国广大地方志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地方志

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地方志工作的法治化、制度化建设不断完善，逐步进入依法修志的新阶段；二是首轮修志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阶段性成果明显，部分地区已经完成修志规划任务；三是年鉴工作发展迅速，五年共新创刊地方综合年鉴400多种、专业年鉴200多种；四是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成果丰硕，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公共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日益提高，社会认可度和参与度不断提高；五是地方志工作机构与队伍建设不断优化，整体素质明显提升。地方志工作及其成果，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璀璨的历史。连绵不断地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基因，为中华文明代代相继、血脉相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意义十分重大。下面，我就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精神，进一步做好地方志工作，提四点希望：

一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党的十八大提出“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部署。“方志乃一方之信史”。地方志全面翔实地记录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绵延辉煌的悠久历史，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谋求民族独立解放、国家繁荣昌盛的奋斗历程，记录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推动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既能展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无穷魅力，也能体现现代文明与历史文明的一脉相承，特别是能够更好地凝聚人心，提升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对实现

“两个百年”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各地要从战略全局高度重视和加强地方志工作,将其作为文化强国建设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来抓,进一步推进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

二是要进一步明确相关职责。要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进一步明确地方各级政府管理和发展地方志事业的重要职责,切实做到认识到位、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编制到位、经费到位、设施到位、规划到位、工作到位,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要进一步发挥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指导等职能,动员和组织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地方志事业;要把解决问题与建立长效机制紧密联系起来,从地方志工作和事业发展的要求出发,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进一步提高工作水平,推动地方志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三是要进一步加强质量管理。地方志不同于一般的研究论著,确保质量至关重要。地方志质量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根基所在、活力所在、价值所在。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要通过地方志全面系统、客观真实地记录历史,坚决反对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要始终坚持质量第一原则,认真总结修志经验教训,深化对地方志工作规律和特点的认识,以科学认真的态度,精益求精的学风,将质量意识贯穿于修志工作的始终。不仅要全面真实反映历史发展脉络,还要充分展示历史细节。要结合发展的新形势,加强对地方志包括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乡镇村志编纂的业务指导和服务,综合运用执法检查、行政督察等手段,完善资料报送、志稿评审、质量评价、审查验收、批准出版等制度,打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民族的系列精品佳志。

四要进一步强化开发利用。“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地方志是一座巨大的文化宝库,是

各级党政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熟悉地情,了解地方发展历史的重要载体。开发利用地方志要与实现“三个自信”结合起来,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各地要自觉把地方志工作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当中,加快方志馆、地情网站、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强对地情文献资料的专门研究,重视地方志资源的普查摸底,开展数字化、网络化建设,做好地方志资源的整合、共享与开发利用。各级领导干部要“读志”、“传志”、“用志”,“究兴衰之由,陈利弊之要,补救时政之阙失,研求民生之荣枯”,用历史的智慧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要发挥优势,创新服务手段和方式,拓宽服务渠道,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利用地方志、传播地方志。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是一篇大文章,比如教育系统应当鼓励全国青少年阅读地方志,有些地方志内容应纳入当地中小学教材或课外读物,把当地历史上有特色的东西挖掘出来,让每一个出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都不能忘记祖宗、忘记历史。地方志开发利用水平是衡量地方志工作成绩的重要标准,不要把地方志工作变成单纯的事务性工作,要学以致用、修以致用。现在文化产业异军突起,可以按照地方志记载的内容编些动漫作品,出一些普及性、趣味性读物,还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宣传。地方志应该是严谨的资料性文献,但是传播地方志的形式和方式应该是生动活泼的。地方志开发利用做得越好、推广得越多、运用得越广泛,地方志工作的现实意义就越重大,贡献就越大。

广大地方志工作者承担着传承文明、记录历史、弘扬文化、服务社会的光荣使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进程中,地方志工作大有可为。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扎实持续有效开展有关工作,努力开创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11卷约1500万字的编纂任务,即将交付出版。

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积极开展修志工作调研,不断加强业务指导;组织召开全国省级方志工作机构主任会议、第二轮省级志书编纂工作经验交流会议、修志工作试点经验交流会议,总结交流经验,研究解决存在问题,推动《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的贯彻落实。各地不断加大资料搜集力度,充分发挥主编和总纂的作用,完善志稿评议制度、审查验收制度和质量评估制度,编制编纂规范、编纂指南和编纂手册,开展志书质量建设年和优秀志书评比活动,努力提高志书编纂质量。

第二,年鉴工作快速健康发展。

地方党委政府对年鉴工作更加重视,下发文件、增加经费、召开高规格的年鉴工作会议,逐步理顺地方综合年鉴管理体制,大力推动年鉴工作全面开展。继安徽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南省、四川省之后,五年来,又有广东省、贵州省、西藏自治区、甘肃省将省级综合年鉴划归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编纂。各地新创刊地方综合年鉴400多种、专业年鉴200多种。上海市、江苏省分别出版《上海年鉴》《江苏年鉴》英文版。我国是世界年鉴编纂出版大国。目前,全国地方志系统组织编纂的地方综合年鉴达1700余种,还有包括军事年鉴、武警年鉴在内的专业年鉴1200多种,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湖北、广东、海南、四川等省(直辖市)基本实现县级以上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全覆盖。

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加大指导和规范年鉴编纂的力度,召开全国地方综合年鉴编纂研讨会,制定颁布《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试行)》,举办全国地方志系统第二届年鉴评奖活动,启动《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教程》编写工作。各地积极制定年鉴编纂规范,印制编纂教材和编辑手册,组织评奖活动,开展队伍培训,建立会议点评、互评互审、集中审读制度,对提高年鉴编纂质量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地方志学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和各地年鉴社会团体召开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论文集,推动年鉴理论研究。五年来,全国地方志系统共发表年鉴论文800多篇,出版著作、论文集10余部。

第三,旧志整理工作成绩斐然。

五年来,全国地方志系统以点校、注释、影印、复印、扫描、原版复制等方式,整理旧志700多种,累计整理2000多种。其中,广东省全部完成旧志搜集整理,出版了《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北京、河北、辽宁、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河南、四川等省(直辖市)大规模集中整理旧志并取得阶段性成果,为抢救保护地方历史文献和加强全国古籍整理工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旧志整理工作中,有的地区成立旧志整理工作机构和学术机构,制订整理出版规划、点校通则和审稿细则,保证整理质量;有的开展旧志普查工作,编制旧志目录,理清、摸透家底;有的还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进行旧志研究和专题资料类编,拓展整理工作的广度和深度。

第四,方志理论和方志学学科建设迈出新步伐。

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编写出版《中国方志通鉴》《当代志书编纂教程》,启动并有序推进《方志百科全书》编纂工作,努力创建方志理论的概念体系和方志知识体系;积极开展对港澳台和对外学术交流,举办新方志编纂论坛,研讨交流方志理论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以《中国地方志》期刊为纽带,召开全国方志期刊工作座谈会,充分发挥方志期刊的理论阵地和引导作用。中国地方志学会建立学术年会制度,举办三届针对性较强、影响较大的学术年会,较好地发挥了学会的学术引领作用。学会城市区志专业委员会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推动城市区志理论研究。各地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地方志学会积极举办学术年会和理论研讨会,设立专项研究课题,组织优秀论文评选,编辑出版论文集,激励广大地方志工作者开展理论研究。五年来,全国地方志系统共发表方志论文6000多篇,出版专著、教材、论文集90余部。

方志学学科建设取得新进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召开《方志学学科建设规划》研讨会,与暨南大学合作举办方志学方向研究生进修班。复旦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宁波大学等高校继续招收培养方志学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在地方志系统、高校和科研机构中,形成一支具有较高理论水平的方志专家队伍。

第五,地方志系统设施设备信息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全国地方志系统信息化建设经验交流会,设立信息化建设试点单位,实施中国地方志网、《中国地方志》期刊网、志书和年鉴数据库建设工程,与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合作开展中国历代方志数字化工作。各地积极建设地情网站,五年来,新开通省级网站7个、市级网站80多个、县级网站200多个。目前,全国省级网站达到26个、市级网站近200个、县级网站470多个。山东、广东等省加快省、市、县三级地情网络群建设,实现全省联网、资源共享;一些地方与政府门户网站、图书馆网站实现链接,公共服务能力大大提高。北京、内蒙古、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河南等省(自治区、直辖市)不断对网站进行改版升级,加快地方志成果数字化速度,完善地情资源数据库,将海量电子资源上传到地情网站,供社会各界查阅使用。

各级方志馆建设加速推进。五年来,国家方志馆建成,新建省级馆7个、市级馆20多个、县级馆80多个,一些地区的方志馆已获准立项或正在建设中。全军军事志馆建设正逐步推进,中国武警史馆建成开馆。目前,全国已建成国家方志馆1个、省级馆15个、市级馆60多个、县级馆近200个。随着方志馆的陆续建成,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千方百计丰富馆藏资源,并陆续向社会公众开放,展示地情、提供服务。

第六,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开创新局面。

各地地方志工作机构积极开展地情研究,编写地方简史和志书干部读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广东等省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创办资政刊物,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参与规划编制、旅游开发、招商引资、历史文化遗产发掘保护、防灾减灾等方面的工作,努力将地方志工作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利用地方志资料,编纂出版反映重大事件、历史名人、特色产业、重要物产等方面的地情资料和地情书籍,深度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

领导小组办公室与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十集电视纪录片《方志·中国》,并在中央电视台第四频

道黄金时段播出;启动方志蓝皮书《中国方志发展报告》编写工作,努力扩大方志文化的影响。各地与报刊、电台、电视台、网站等媒体合作,宣传地方历史文化和方志文化;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其中《吉林年鉴》编辑部与新闻媒体联合持续组织“感动吉林”年度十大人物评选活动,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纂《中国红——辛亥革命百年祭》、举办“喜迎十八大、中国红巨幅国画展”,积极营造昂扬向上的舆论氛围。

第七,地方志工作机构与队伍建设取得新成绩。

领导小组办公室多次举办修志主编培训班和地方志工作机构新任负责人培训班,联合开展当代中国史和口述史专题培训。各地通过相互交流、出国出境考察学习、专题培训、举办讲座、与高校联合办学、以会代训等方式,对主编、总纂、编辑、组稿人员、撰稿人员等开展针对性强、内容丰富的业务培训,努力改善队伍知识结构,提高队伍整体素质。

为稳定机构与队伍,指导小组及其办公室配合各地和主管部门,积极推进地方志工作机构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范围;争取到中央编办的有力支持,明确指导小组办公室不参加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开展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表彰活动,同时单独开展了全国方志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评选活动。不少省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与人社部门联合或单独开展了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的评选表彰活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表彰了修志先进单位和个人。

第八,地方志工作法治化建设深入推进。

继北京、河北、吉林、安徽、江西、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贵州、陕西、宁夏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之后,五年来,先后又有江苏、甘肃、新疆、云南、上海、河南、山西、海南、内蒙古、浙江、福建等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颁布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四川省人大常委会修订了《四川省地方志工作条例》。目前,全国已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150多个市、县颁布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或政府规范性文件,其中山东省形成较为

完善的法规体系。有些部门和行业制定部门志、行业志编纂工作规定,解放军将《军事志工作条例》列入中央军委立法计划,武警部队出台《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史志工作规定》。河北、山西、吉林、江苏、山东、河南、湖北、广西、贵州、甘肃、青海等省(自治区)开展人大执法检查或政府督察,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沈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等取得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强化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的权威性,有力地推动了地方志工作的健康开展。

按照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要求,许多地区制定出台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把地方志工作列入“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或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制定第二轮修志工作规划和志书编纂方案,完善资料报送制度、编修备案制度,为地方志工作有序开展提供制度保障。

五年来,全国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广大地方志工作者科学总结地方志编修历史经验,紧密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充分发挥聪明才智,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优化地方志工作格局,推动地方志事业向更深层次发展,初步形成了由制度保障、工作成果体系、事业发展格局、共同价值理念等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志文化。

五年来,全国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广大地方志工作者进一步弘扬历经千年的修志人优秀传统,形成了“淡泊名利、甘于奉献、恪尽职守、锲而不舍、开拓进取”的修志人精神。广大地方志工作者秉持这种精神,在艰苦、辛苦、清苦的岗位上默默耕耘,忘我奉献。这种精神,是地方志工作者爱民报国情怀的完美诠释,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五年来,我们对做好地方志工作的认识进一步深化,积累了一些弥足珍贵的经验。主要有: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与党中央保持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高度一致;必须大力推进地方志工作法治化、制度化建设,依法开展地方志工作;必须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改革发展大局,牢固树立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理念;必须坚

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实施、社会组织 and 力量积极参与的地方志工作体制;必须把地方志工作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文化事业发展规划和各级政府工作任务之中,切实做到认识到位、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编制到位、经费到位、设施到位、规划到位、工作到位;必须始终坚持质量第一的原则,建立健全科学实用的地方志质量保障体系;必须深化地方志理论研究,加强地方志学科建设,使地方志工作建立在坚实可靠的科学基础之上;必须加强地方志设施设备建设,将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到地方志工作中,推动地方志工作的现代化建设;必须把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工作摆到重要位置,增强公共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提高服务水平;必须大力弘扬修志人精神,加强地方志工作机构领导班子建设,建设一支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高素质队伍。这些经验,既是对五年来全国地方志工作实践的精心总结,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广大地方志工作者艰辛探索的结晶,是保证地方志事业顺利前进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认真领会,并在实践中及时予以丰富和发展。

总体来讲,五年来,地方志工作成绩令人瞩目、形势振奋人心。我们深刻体会到,全国地方志工作进步和事业发展,离不开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离不开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强力推动,离不开各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热情帮助和积极参与,离不开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广大地方志工作者的精心筹划和艰苦奋斗。在这里,我谨代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向党中央国务院、地方各级党委政府、各部门和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向全国地方志工作者致以诚挚的敬意!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地方志工作在前进的道路上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有些问题已经困扰着有些地区地方志工作的正常开展。主要是:地方志工作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落实不到位的现象仍然存在,有的领导同志对地方志工作重要性认识还不够到位,一些地区地方志工作

发扬成绩 谋划长远

奋力书写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篇章

在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

(2014年4月19日)

王伟光

这次会议得到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在会议召开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专门作出重要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与部分会议代表座谈,转达李克强总理对本次会议的关心,作了重要讲话。李克强总理在批示中充分肯定地方志和地方志工作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地方志工作和事业取得的显著成绩,对全国广大地方志工作者提出殷切期望。刘延东副总理在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地方志工作的同时,对继续做好地方志工作提出了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进一步明确相关职责、进一步加强质量管理、进一步强化开发利用的总要求。李克强总理的重要批示和刘延东副总理的重要讲话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对广大地方志工作者是巨大的鼓舞,对地方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

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五届一次会议要求,总结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五年来的工作,分析当前地方志事业发展形势,明确地方志事业奋斗目标和今后五年的工作任务,审议《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4—2020)》(草案),集思广益,再接再厉,努力开拓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五年来的地方志工作

自2008年11月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至今,已有五年多的时间。五年来,全国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广大地方志工作者紧紧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改革大局,辛勤耕耘,奋发有为,地方志工作取得了新成绩,地方志事业发展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修志工作取得重大成果。

经过五年来攻坚克难的扫尾工作,首轮修志任务全面完成,全国累计出版规划内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5800多部。首轮修志硕果累累,开创了我国方志编修的崭新局面,是中国方志发展史上的壮举,也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盛事。

全国第二轮修志工作深入展开,部分地区已经完成修志规划任务,其中广东省全面完成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五年来,全国出版规划内三级地方志书1000多部,累计出版1400多部;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编修成果丰硕,累计出版2万多部;乡镇志、村志编修方兴未艾,累计出版4000多部。水利、海关、铁路、民航、气象、煤炭、石油、烟草、文物等系统的修志工作稳步推进。全军第二轮修志任务基本完成,启动军事大事记和《中国军事地理志》《中国边海防志》编纂工作。武警部队积极推动第二轮武警志编修工作。受国务院委托、由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牵头组织编纂的《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心支持和全志编委会、各分卷编委会的有力领导下,经过近百个参编单位几千名编纂人员共同努力,完成全部

机构、编制和队伍还不健全,事业发展基础设施薄弱、投入不足的问题尚未妥善解决,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水平还不能更多地满足社会需求,方志学独立学科地位还没有完全确立,等等。以上问题,虽然是前进中的问题,但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和重视,并在今后的工作中根据不同情况,有重点、有步骤地切实加以解决。

二、地方志事业发展形势和奋斗目标

保持和发展地方志事业的大好局面,必须认清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改革大局,抓住和用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和广大地方志工作者不断增强大局意识,抢抓机遇,迎接挑战,推动地方志事业迈上一个又一个新的台阶。当前,地方志事业发展又面临着大好形势与机遇,亟需乘势而上、顺势而为。

一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新举措。这一系列重要讲话,是对党的十八大精神的深化和拓展,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阶段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纲领,是全面阐述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重大原则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文献,是指导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行动指南,更是进一步发展繁荣地方志事业的重要指导方针。讲话中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科学发展,加强宣传思想和意识形态工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方面的重要论述,贯穿的坚定的信仰追求、可贵的历史担当精神、坚定的人民立场和真挚的为民情怀等立场观点,都为地方志事业发展确定了基调,提供了基本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今年2月25日,他在首都博物馆考察调研时强调,搞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

今、启迪后人。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这一重要论述精准地概括了史书、方志等文献典籍的当代功用和千秋价值,明确了新时期地方志事业的发展方向,我们一定要抓好学习贯彻和落实。

二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构筑了广阔舞台。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揭开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同时也给地方志工作者提供了发挥更大作用的空间。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形成的珍贵历史资料,需要我们及时搜集、整理和保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伟大实践中出现的代表社会发展趋势、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重大事件和典型人物,以及在全面深化改革实践中出现的新思路、新创造、新经验,需要我们及时发现、记录和宣传。另一方面,30多年来我们生产、积累的地方志成果和地情资料,翔实记录了前人和当代人的实践活动和智慧经验,可以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深化改革提供智力支持,为各级领导干部了解熟悉地情提供咨询服务,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历史借鉴。因此,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地方志工作者完全可以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地方志事业完全可以具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五年来地方志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表明全国地方志工作者勇于担当历史责任,正在奋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添砖加瓦。

三是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党的十八大准确把握国际上思想文化发展竞争态势,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高度和广阔视野,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大政方针。地方志事业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的基础工程和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推动力量。我们建设的地方志资源宝库,内容纵贯古今、横陈百科,覆盖了我国各个地域,有助于认清中华文化和地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有助于了解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观念、鲜明特色;可以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精神食粮,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华传统美德,开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新闻写作、文学影视创作等提供基本素材。因此,地方志工作者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当前,各级党委政府为激励文化事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我们要利用掌握丰富地情资料的独特资源优势,团结协作、群策群力,以更大的力度、更先进的手段,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承担更多任务、发挥更大作用。

时代的车轮快速向前,地方志事业不进则退。综合外部环境和自身实际,当前地方志事业发展面临着难得的大好形势,处在一个崭新的发展起点上。我们要立足当前、谋划长远,确定地方志事业的奋斗目标。

党的十八大顺应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作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庄严承诺。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地方志事业发展需要,基于新中国建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志工作取得的巨大成绩和丰富经验,到2020年,我们完全有信心建成由地方志编修体系、地方志质量保障体系、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地方志理论研究体系、地方志学科建设体系、地方志工作领导体系、地方志人才队伍体系、地方志工作财力保障体系组成的,比较完善的地方志事业发展综合体系,推动地方志工作和方志文化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迈上一个大台阶。

到2020年,应当圆满完成地方志工作的主要任务:全国第二轮修志任务全面完成,第三轮修志工作准备充分,高质量的地方志成果群更为丰富;年鉴编纂工作形成规模,实现县级以上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全面覆盖;地方志理论建设、地方志学科建设取得突破性成果,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地

位显著提升;省级地情网站群建设初步完成,地情资料库、方志馆等设施设备基本配齐,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明显提高;以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为核心的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体系基本完善,地方志工作立法取得新的进展,地方志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和制度保障更加有力;地方志工作机构、队伍建设取得新突破,形成一支素质高、业务精、作风正的地方志工作队伍;以《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4-2020)》为主导的事业发展规划与实施体系基本形成。

三、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

认真分析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以来的工作,科学研判地方志事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按照地方志事业的奋斗目标,今后五年,要扎实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国地方志系统要继续认真学习、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刻领会和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提高政治理论水平,强化理论武装。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要在全面学习的基础上,着重把握其精神实质、基本内涵和主要观点,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要同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结合起来,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起来,进一步坚定地方志工作者的理想信念,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要紧密联系实际,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观察分析、研究解决地方志工作实际问题,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修志工作,提高对地方志工作发展规律的认识水平;要始终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毫不动摇地做到地方志工作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要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唯物史观,坚守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价值观,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真正做到

地方志工作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事实坚决反对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

第二，坚持把修志作为基本任务，努力为群众提供更多、更优秀的方志文化成果。

方志编修是地方志工作的基本任务，是检验评估地方志工作的首要标准。当前，全国第二轮修志工作正处于深入推进的关键时期，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未完成的地区，应抓紧抓好，按时完成任务。第二轮修志规划任务已经完成的地区，要认真总结首轮、二轮修志经验教训，做好第三轮修志启动前的方案策划、理论研讨、资料收集、队伍培训等准备工作，加强修志的各项基础工作。继续鼓励对方志编修的探索和创新，加强对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乡镇村志编纂的指导和服务。支持香港、澳门地区修志工作，加强与台湾地区修志交流。指导小组办公室要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组织方志界专家学者，做好编修一统志的可行性研究工作。

要继续建立健全志书质量保障体系。继续做好修志试点工作和志书评奖工作，组织修志经验总结和交流，研究制订志书修订、重修、再版制度。进一步严格志书评议、审查验收和出版工作，坚决杜绝不合格志书出版发行。推进方志出版社志书精品工程，建设全国地方志专业出版基地，努力打造一批优秀志书。鼓励扩大地方志编修的社会参与度，积极吸收有志于此的专家学者、离退休干部及其他人员参与各类志书编纂工作。

第三，继续做好年鉴工作，真正使年鉴成为翔实可靠的年度地情文献。

年鉴工作是地方志工作新的增长点和支撑点，是地方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的规定，全面理顺地方综合年鉴工作管理体制，推动县级以上行政区域全面开展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工作。鼓励年鉴种类和记述内容的创新，逐步形成丰富多样的年鉴成果群。

要努力提升年鉴质量，推动年鉴理论研究。有计划地组织年鉴评奖活动，开展年鉴质量建设试

点工作，推介先进编纂经验，加强对各类年鉴编纂的业务交流、培训和指导。修订正在试行的《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出版规定》，推动各地规范年鉴编纂流程。拓展年鉴信息资料的广度和深度，坚持年鉴当年编纂、当年出版。建立健全年鉴编纂评议和审查机制，推广年鉴出版前的审读制度。充分发挥中国地方志学会年鉴工作专业委员会和各地年鉴社会团体的作用，组织编纂全国年鉴综录、年鉴词典等大型工具书，编写出版《地方综合年鉴编纂教程》，增强年鉴理论研究的计划性和系统性，逐步形成年鉴学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

第四，大力加强资料建设，夯实地方志事业发展和方志文化建设的基础。

资料是地方志编纂的重要基础，是地方志质量高低的决定性因素，也是地方志事业发展和方志文化建设的源头活水。要开展有关地方志资料建设的专题培训和研讨，培养一批地方志资料搜集、研究方面的人才。要密切与党政机关、高校、科研机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行业协会、企业、民间组织和社会人士的联系，继续运用社会调查、口述史等方法，大力拓展资料搜集范围和渠道。要加大依法征集地方志资料的力度，建立和完善地方志资料年报制度，加强地方志资料的集中收藏、保存和管理，逐步构建一个能够全方位适应地方志编纂、地方志事业发展和方志文化建设需要的地方志资料保障体系。

第五，积极推进旧志整理工作，抢救保护好地方历史文献。

历代留存下来的旧志是我国宝贵的传统文化遗产，开展旧志搜集整理与出版是功在当代、惠及千秋的重要工作。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要争取党委政府的更大支持，对留存的旧志孤本、善本进行收集保护，有计划地集中整理本地历代方志。加强对旧志普查和旧志目录编制工作的指导，鼓励设立旧志研究专项课题，有重点地分类编辑旧志资料。积极稳妥地开展海外藏中国旧志的引进工作，推动旧志数字化建设，逐步建立全国旧志资源数据库。组织召开全国旧志整理工作经验交流会，开展全国地方志系统旧志整理成果评比活动，大力

培养和聚集旧志整理专业人才,确保旧志整理的质量。

第六,加大对地方志工作基础设施的投入,更好地发挥地方志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中的作用。

加强地方志信息化建设,实现地方志资源数字化、网络化,为社会提供全面、便捷的地情信息服务,是开发地方志资源、发挥地方志作用的有效途径。要加快地方志工作服务形式的现代化进程,推动网络信息技术在地方志工作各个领域的应用。继续开展信息化建设试点工作,组织信息化建设经验交流,有计划地培养信息化建设人才。积极整合全国地方志系统网站资源,建设以“中国地方志网”为基础平台,国家、省、市、县四级地方志网站联网的全国地方志网络,推进建立省级地情网站群。推进地方志成果和各种地情书籍数字化,建设全国地情资料全文检索数据库。

方志馆是地方志工作向社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基础设施和重要平台。要研究制定方志馆建设指导意见,开展方志馆建设的经验交流,推动方志馆建设的规范化。发挥国家方志馆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推动数字方志馆建设,逐步实现方志馆之间的资源共享。开展方志馆定位的研究,努力将方志馆建成地方志和地情资料收藏展示中心、地情研究咨询中心、地方文化对外交流中心,建成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基地。

第七,深入挖掘地方志资源,充分展示方志文化魅力。

地方志资源宝库中蕴含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财富,要加强对地方志资源的深加工,积极拓宽地方志资源的服务渠道和服务手段。继续通过编辑信息简报或月报、编写地情读本、开展专题研究,为党政机关和社会各界提供服务。大力推动地方志成果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进军营,发挥地方志资源在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集中力量汇编新旧方志中有关典型事例和代表性资料,为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有力支撑。充分挖掘地方历史文化资源,开展地方史编写工作。积极开展地情调研,编纂出版地情资

料和地情书籍。主动加强与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合作,发挥方志期刊的作用,加大对地方志工作、地情信息和方志文化、地域文化的宣传力度,满足社会各界对方志文化资源的需求。配合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重点推介一批高质量的地方志成果,推动方志文化走向海外,增强中华文化凝聚力、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

第八,大力加强地方志理论研究和方志学科建设,努力扩大方志学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

实现地方志事业的科学发展,必须深化地方志理论研究。要根据地方志工作需要和学科特点,制定理论研究规划,研究解决关系地方志编纂、地方志事业发展的重大业务问题和基础理论问题。加强方志理论研究学术规范建设,提高研究的档次和深度。打破较为封闭的方志理论研究模式,加强方志学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文学等学科的关联性研究,积极借鉴吸收其他学科的先进理论和研究方法。组织召开地方志国际学术会议,合作开展地方志专项课题研究。充分发挥中国地方志学会和《中国地方志》期刊的平台作用,办好中国地方志学术年会,做好全国地方志系统的期刊工作。

要逐步构建科学的方志学学科体系。尽快制订方志学学科建设规划,逐步建立学科带头人制度。完成《方志百科全书》的编纂出版工作,开展方志辞典的修订工作,组织编写方志学通用教材和方志学各分支学科研究论著。继续争取教育行政部门的支持,加强与高校、社科院研究生院的联系,设立方志学专业,招收、培养方志学研究生,不断提升方志学的学科地位。

第九,继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增强推动地方志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

人才队伍素质是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才辈出、人才济济,事业发展就能上台阶、上层次。要建立健全分级分类培训制度,加强对志书主编、地方志工作机构新任负责人的专项培训,注重对基层修志人员的岗前培训。继续与高校联合举办地方志业务培训班,鼓励和支持地方志工作

者接受继续教育。探索适合地方志工作的人才政策和措施,重视专业人才的选拔、引进和任用,采取各种措施吸引优秀人才参加地方志工作。不断优化人才成长环境,鼓励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开展多种形式的人才交流活动,建立健全人才评价和激励机制。

要积极与编制部门沟通协调,从有利于地方志事业长远发展和稳定地方志工作机构队伍的需要出发,妥善解决好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的定位问题。继续积极与人社部门联合开展表彰先进活动,在全社会大力宣传、努力彰显修志人精神。

第十,深入推动地方志工作法治化进程,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是开展地方志工作、保障地方志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和政策依据。要适应建设法治中国的要求,推动全国地方志工作立法。没有制定或正在制定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的地方,要力争早日出台;已经出台的,要抓好贯彻落实。坚持依法开展地方志工作,推动建立各级政府依法履行领导责任、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依法履行组织实施和管理职责、社会各界依法参与和提供支持的法治化工作格局。进一步建立健全与法规规章相配套的制度体系,鼓励开展地方志工作执法检查和行政督察,推动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的贯彻落实。继续做好地方志工作法规规章宣传工作,加大普法力度,营造依法开展地方志工作的良好社会环境。

第十一,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提供有力组织保障。

地方志工作是一项不容易引起重视的重要工作,要严格按照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国务院办公厅有关通知要求,进一步提高对地方志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切实做到领导到位。指导小组及其办公室要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制定和完善有关规章制度,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好的经验,注意发现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定期向党中央国务院反映情况,对地方志工作中涉及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及时请示报告,真正担负起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指导全国地方志工作的职责。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健全工作机构,解决人员编制,改善工作条件,地方志工作所需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各地地方志编委会要履职尽责,及时协调解决地方志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第十二,努力做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制定工作,确保地方志事业健康持续发展。

整体、协调推进全国地方志工作,需要制定出科学合理、符合实际、方便操作的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目前,领导小组办公室经过认真研讨、征求意见,起草了《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4—2020)》(草案),并在本次会议上征求意见。会后,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进一步反馈修改意见,领导小组办公室抓紧修改完善后,适时提交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审议,并争取提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今后,全国层面的相关规划要进一步加强。在时机、条件成熟时,推动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之中;要制订旧志整理工作规划、信息化建设规划、方志馆建设规划和方志学学科建设规划,推动各项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开展。各地要继续争取党委政府支持,制定本地区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将地方志工作纳入本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文化事业发展规划和政府工作任务之中。

五年时间虽长犹短,应只争朝夕。地方志事业发展的新征程已经起步,党和人民寄予厚望、赋予重任。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紧紧依靠各级党委政府,紧紧围绕发展改革大局,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奋力书写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篇章,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纪要

经国务院批准，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于2014年4月19日至20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会前与部分代表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王伟光出席会议并作题为《发扬成绩，谋划长远，奋力书写地方志事业发展新篇章》的工作报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李培林传达了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和刘延东副总理的重要讲话，就《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4—2020）》（草案）作出说明，并在会议结束时作总结讲话。国家档案局局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长杨冬权布置了全国地方志系统表彰先进工作。杨冬权和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副组长何雷分别主持会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部分成员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各副省级城市，解放军、武警部队分管或联系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同志、地方志工作机构主要负责人，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局史志机构负责人，共140多人与会。

（一）

李克强总理在批示中指出，地方志是传承中华文明、发掘历史智慧的重要载体，存史、育人、资政，做好编修工作十分重要。五年来，全国广大地方志工作者执着守望、辛勤耕耘，地方志工作成绩斐然，这项事业呈现良好发展势头。谨向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修志问道，以启未来。希望你们继续秉持崇高信念，以更加饱满的热情、以存真求实的作风进一步做好地方志编纂、管理和开发利用工

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刘延东副总理在讲话中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习近平总书记2月25日考察首都博物馆时强调，搞历史博物展览，为的是见证历史、以史鉴今、启迪后人。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李克强总理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专门作出重要批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李克强总理的重要批示，深刻阐述了做好地方志工作的重要意义，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希望和要求，立意高远、催人奋进，对地方志事业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刘延东副总理指出，过去五年，地方志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地方志工作及其成果，为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延东副总理对做好地方志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一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必须从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战略全局高度重视和加强地方志工作，将其作为文化强国建设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来抓，进一步推进地方志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和智力支持。二要进一步明确相关职责。要继续深入贯彻落实《地方志工作条例》，进一步明确地方各级政府管理和发展地方志事业的重要职责，切实做到认识到位、领导到位、机构到位、编制到位、经费到位、设施到

位、规划到位、工作到位,将地方志工作纳入各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之中;要进一步发挥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的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指导等职能,动员和组织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地方志事业;要把解决问题与建立长效机制紧密联系起来,从地方志工作和事业发展的要求出发,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健全相关制度,进一步提高工作水平,推动地方志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三要进一步加强质量管理。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要通过地方志全面系统、客观真实地记录历史,坚决反对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要始终坚持质量第一原则,认真总结修志经验教训,深化对地方志工作规律和特点的认识,以科学认真的态度,精益求精的学风,将质量意识贯穿于修志工作的始终,打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民族的系列精品佳志。四要进一步强化开发利用。开发利用要与实现“三个自信”结合起来,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结合起来。各地要自觉把地方志工作纳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当中,加快方志馆、地情网站、数据库等基础设施建设。要加强对地情文献资料的专门研究,重视地方志资源的普查摸底,开展数字化、网络化建设,做好地方志资源的整合、共享与开发利用。各级领导干部要“读志”、“传志”、“用志”,用历史的智慧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要发挥优势,创新服务手段和方式,拓宽服务渠道,用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利用地方志、传播地方志。

刘延东副总理强调,广大地方志工作者承担着传承文明、记录历史、弘扬文化、服务社会的光荣使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进程中,地方志工作大有可为。

(二)

王伟光同志在工作报告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修史修志的重要讲话、李克强总理的重要批示和刘延东副总理的重要讲话内涵丰富、意义深远,对广大地方志工作者是巨大的鼓舞,对地方

志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

王伟光同志全面系统总结了第四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召开五年来修志工作、年鉴编纂、旧志整理、方志理论和方志学学科建设、设施设备信息化建设、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工作机构与队伍建设、法治化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绩,总结了地方志工作积累的弥足珍贵的经验,指出了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王伟光同志强调,当前地方志事业发展面临着大好形势与机遇,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实践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构筑了广阔舞台,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部署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他指出(到2020年,要建成由地方志编修体系、地方志质量保障体系、地方志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地方志理论研究体系、地方志学科建设体系、地方志工作领导体系、地方志人才队伍体系、地方志工作物力财力保障体系组成的)比较完善的地方志事业发展综合体系,推动地方志工作和方志文化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迈上一个大台阶。

王伟光同志指出,今后五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把修志作为基本任务,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优秀的方志文化成果;继续做好年鉴工作,真正使年鉴成为翔实可靠的年度地情文献;大力加强资料建设,夯实地方志事业发展和方志文化建设的基础;积极推进旧志整理工作,抢救保护好地方历史文献;加大对地方志工作基础设施的投入,更好地发挥地方志工作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中的作用;深入挖掘地方志资源,充分展示方志文化魅力;大力加强地方志理论研究和方志学学科建设,努力扩大方志学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影响;继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增强推动地方志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深入推动地方志工作法治化进程,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提供法律保障;加强

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为地方志事业发展提供有力组织保障;努力做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制定工作,确保地方志事业健康持续发展。

李培林同志向大会介绍了《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4—2020)》(草案)起草过程、总体框架和主要内容。他指出,规划纲要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就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组织制订的第一份比较全面系统的规划性文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会后,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要根据这次会议上和会后各省(区、市)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认真研究、消化、吸收,对规划纲作进一步修改完善。规划纲要经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审议通过后,报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杨冬权同志对2014年至2015年全国地方志系统开展表彰先进活动进行布置,并就表彰名额、组织领导、时间安排和有关要求向大会作出说明。他指出,此次表彰先进活动是全国地方志系统四年一次的大事、好事,表彰文件会将正式印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方志工作机构要高度重视,认真落实。

(三)

会议分成四个小组,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刘延东副总理重要讲话、王伟光同志工作报告以及《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4—2020)》(草案)等文件,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修史修志的重要讲话、李克强总理的重要批示和刘延东副总理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地方志和地方志工作的重要作用,充分肯定地方志工作和事业取得的显著成绩,对各地党委政府提出明确要求,对全国广大地方志工作者提出殷切期望,鼓舞人心、令人振奋。王伟光同志的工作报告客观总结了过去五年的工作成绩、工作经验,科学分析了当前

地方志事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发展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改革大局,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今后五年的主要任务,是指导地方志工作和事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4—2020)》(草案)全面系统、可操作性强,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为推动地方志事业发展而进行的顶层设计,是地方志事业奋斗目标和今后一个时期地方志工作任务的具体化。与会代表建议,要大力推动地方志工作立法,争取将地方志工作列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妥善解决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在事业单位分类改革中的定位问题,争取《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4—2020)》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加大对国务院部委局以及中央企业修志业务指导的力度,充分发挥方志出版社在地方志质量建设中的作用等。

李培林同志在总结讲话中指出,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是第五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开局之年召开的共商地方志事业发展大计的重要会议,是领导重视、内容丰富、成果丰硕、勤俭节约的会议。会议取得的成果必将对今后一个时期,尤其是今后五年的地方志事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李培林同志强调,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具有丰富的内涵,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将会议精神转化为推动地方志事业发展的巨大力量,是下一步的重要任务。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和服务意识,动员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地方志工作,不断增强质量意识和精品意识,进一步完善《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4—2020)》(草案);各地、各部门要汇报阐释好会议精神,学习宣传好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



设还是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我们都收到了巨大的回报,而这些巨大回报的背后,无一不体现着我国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和优秀民族传统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各地利用当地历史文化资源,挖掘自身潜力,发挥自身优势,吸引外资、外商,取得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事实证明,地方志建设不是可做不可做的问题,而是谁在这方面做好了、做早了、做快了,谁就能更好地把握和发展自己,而这种把握和发展往往又是现实和有针对性的。近年来,金川区利用各类地情资料和地方志办大量的史料做好服务工作,不同程度地解决了基层和人民群众的部分历史疑难问题。在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发展旅游文化产业、开展沙井文化论坛、发展现代农业等项目,开发历史名胜九洞湾、三角城遗址公园、建立现代循环农业度假村,已吸引了大量的区外资金,也取得了一定的经济效益。所有这些都说明地方志建设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现实的。

第三,从地方志工作的现实和历史意义以及它的资政目的看,加强地方志建设也是非常必要和现实的。一段时间以来,全国各地不少地方存在着史志部门的撤、并现象,致使地方志出现机构不健全、人员短缺、工作淡化或断节,应该说这是一种损失。可能这些地方认为地方志工作并不重要,没有必要单独设立,但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且不说历朝历代对历史记载的重视程度和单独设立史官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文化娱乐活动和社会、经济等发展的基本决策,都源于一种历史的继承和发展,而这种继承和发展恰恰来源于对历史史实的记载和回顾。笔者在多年的地方志工作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奇怪的现象:有的地方、有的人,对地方志工作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用起来找不到。其实,就是因为平时不够重视造成的。地方志工作作为一种政府行为,它所出版的志书、年鉴等书籍、资料和刊物,不仅是系统的、综合的,而且是具有史实性和权威性的。因此,它又是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进行计划、决策和发展规划的基本依据。如果一级政府或部门对当地的人文、社会历史状况、自然条件和环境以及各种资

源优势不够了解或者了解的不彻底,那可想而知它所做的计划、决策和发展规划的针对性和科学性是否置得怀疑?它工作的成效性是否有所保证?总之,对地方志工作必须有到位和正确的认识,笔者认为,这也是一个实事求是和科学发展的问題。另外,加强地方志建设还有一个对后来者负责的问题。我们做了我们该做的事,这里边当然有成绩、有失误,有经验也有教训,我们更应该把这些成绩、失误、经验和教训留下来,让后来人尽可能地减少失误、接受教训、总结经验取得更好的成绩,推动社会更快更好地发展。而所有这些内容,正是地方志工作部门和地方志工作者的神圣职责。

第四,从地方志工作的教化、育人的作用看,加强地方志建设更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性。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自身发展的历史和过程,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前提和基础。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后来人就是通过我们对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公正、真实的记载,形成理性认识,指导行动、发展社会。毛泽东一生学习、研究和探讨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博览群书,使其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可借鉴的经验、应吸取的教训以及哪些力量可靠、哪些力量可以争取等都有了明确的划分和理性的认识,才使毛泽东成为中国人民真正的领袖,才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才有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社会发展是有其连续性的,加强地方志建设,就是为了更好地促进这种连续性,从而保证社会各项事业沿着正确的轨道向前发展。

总之,无论从社会历史发展还是从现实社会需要出发,都应该把地方志工作认真重视起来抓好抓实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当前,加强地方志建设,主要是建立健全地方志工作机制,成立一个稳定的地方志工作队伍,提供必要的工作的条件,加强工作人员的培训和管理,提高业务水平和自身素质,保证地方志工作有序、规范展开,为我们的后来人积累和提供有价值、可利用、既客观又真实的历史资料,为社会历史的进步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作者系金川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

践行群众路线 打造“民牌”方志

闫亮

90多年的风雨历程，中国共产党以星星之火，逐渐发展壮大，领导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走向了光明，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建国后的60多年中，我们党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使中华民族以一个巨人的姿态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今天，国际关系日益错综复杂，我们的党迎来了执政、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新考验，在这个发展的重要关头，党内却出现了精神懈怠、脱离群众、消极腐败等一些不容忽视的危险，其中，脱离群众是党面临的最大的危险。党中央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在全党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切中要害，意义深远。

作为一名地方志工作者，一名党员干部，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切实践行党的群众路线方针，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地方志工作主要从事研究史志、征集地情资料、编纂地方志书，记载地方历史，宣介地方特色，为社会各界及广大民众提供地情咨询服务，其功能是存史、资政和育人。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对于地方志工作来说，关键在于找准本职工作和群众路线的结合点——打造真正为群众所接受、喜爱和广为流传的地方志精品佳作。

诚然，打造地方志精品佳作，是史志部门和每个地方志工作者的一大追求，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肯定史志工作者的业务能力和水平。但是，精品佳作能否为群众喜闻乐见、广为流传，是一个值得深思和探索的课题。那么，怎样做才能使我们的作品真正为群众所喜爱的呢？

第一，赢得民心，编修对人民群众负责的志书。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地方志工作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唯物史观，始终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2013年3月，《庆城县志（1986—

2012）》编修工作正式启动，预计2015年底完成。目前，正处于搜集资料、编辑初稿的最后阶段，在全面收集全县各单位、各部门资料的同时，加强了对民间社团、群众性史志资料包括口述史资料的收集。为了真实、全面、客观地再现历史，在此过程中，志办编辑人员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人物采访、历史事实考证、民间艺术追寻……志办人员几乎踏遍了庆城的各镇各村，获得了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第二，凝聚民力，做庆城人民群众自己的志书。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庆城县志》是一项浩大的历史文化工程，只有充分调动干部职工的积极性，全力争取各单位的支持配合，汇集集体的智慧和力量，广泛征集资料，编纂人员深入一线，深挖庆城地方特色，才能打造出真正意义上的《庆城县志》。除在县内抽调人员担任志书编辑外，我们还聘请了庆城县原政协主席刘文戈、《庆阳市志》副主编张芹鹤、原机关工委书记褚斌等专家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人物各编进行提升把关，特别是我们还凝聚了马岭镇马岭村退休老干部杜鸿信及马岭镇琵琶寨村朱世武、桐川乡惠家庙村虎瑞祥等农民作家的力量，为我们提供最原始、最朴实、最贴近人民生活的素材。在编修《庆城县志》的同时，我们还注意挖掘县域内的典型事迹、知名人士及文艺作品，为下一步编写《庆城荣耀》和《历代文人咏庆城》创设条件。修庆城人民自己的方志，是我们不变的追求。

第三，符合民意，修人民群众喜爱的志书。像《史记》《资治通鉴》这样的精品佳作，为何能被永世流传，不但源于其对历史的真实记载，文辞的讲究，更重要的是它们贴近了民众，贴近了人民生活。然而，长期以来，“修志书就是修官书”的观念一直框束着人们的思维，致使相当（转78页）

敦煌文化的特征

孙占鳌

敦煌文化是以敦煌遗书、敦煌艺术、敦煌史迹遗存为主要内容的敦煌古代地域文化。敦煌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概括起来讲,敦煌文化有以下八个特征:

一、敦煌文化是一种地域文化

敦煌文化是一个地域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敦煌文化的地域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时空的地域性。敦煌文化的地域背景,最初局限在敦煌地区。随着历史遗迹的不断发现,敦煌文化逐渐放大到酒泉地区的大部分地域。敦煌石窟中包含了酒泉辖区内的玉门昌马石窟,瓜州榆林窟,肃北五个庙石窟,敦煌艺术也包括了这些石窟艺术;敦煌汉简包含了酒泉境内肃州、玉门、瓜州、敦煌出土的汉简,因以古敦煌郡出土最早、数量最多,因而学术界称之为敦煌汉简;西凉王国是敦煌历史上唯一建国、建都的历史时期,也是经济文化最繁荣时期之一。公元400年李暠在敦煌建立西凉王国,公元405年迁都酒泉,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随之转到了酒泉。同时,李暠迁都时,将敦煌15万人口中的近11万迁往酒泉,安置于酒泉、敦煌间。因而,酒泉文化成了这一时期敦煌文化的主体;存在了近200年的归义军政权时期,统辖范围包括了酒泉西部的敦煌、玉门、瓜州、肃北、阿克塞一带,前期还曾统辖肃州等地。这一时期,敦煌与酒泉大部分地域政治、经济、文化一体,文化形态基本一致。随着敦煌学的发展,目前敦煌文化的地域背景已经拓展到了甘州、凉州、伊州、西州、龟兹、楼兰、于阗等河西走廊和新疆东部地区。

敦煌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地域背景上发育、形成的。敦煌文化姓敦,敦煌学也姓敦。是敦煌地域造就了敦煌文化,敦煌文化铺陈了敦煌学的土壤,播下了敦煌学的种子,掘开了敦煌学的源头,疏通了敦煌学的经脉。敦煌学波澜壮阔的学术活剧,每

一幕都是在敦煌历史文化大背景的广阔舞台上演出的。敦煌学之所以能够区别于其他学科而独立存在,就是因为它根植于敦煌,根植于敦煌文化。离开了敦煌这一特定的地域环境,敦煌文化和敦煌学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2. 内容和风格的地域性。一是民情风俗的地域性。敦煌文化反映的都是敦煌古代地域所发生的事情,都是大漠边陲多民族聚集区、具有中西方经济文化汇集地特有的社会生活及其民俗风情。二是自然环境的地域性。敦煌文化中所展现的自然风光、山川地理,具有鲜明的地域性。丝路古道、关隘烽燧、大漠驼铃、戈壁风沙、长河落日、绿洲驻牧以及胡杨树、骆驼刺、沙枣花、番红花、刺梅花、野罂粟花,是敦煌文学中经久不衰的创作意象。历代文人骚客以敦煌特定的地理环境为背景,赋阳关、玉门关之雄壮,写边地景物之苍凉,发戍边壮士之悲壮,逼真生动地展示了敦煌地域的壮丽景色、人文环境。三是方言词汇的地域性。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在他的《语言学概论》中指出:方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敦煌文化中,拥有大量敦煌及其周边地区独特的方言词汇。这种独特的地域性语言,是敦煌人民社会心理的长久积淀,是民间思想最朴素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含义最丰富最深刻的一种语态,也是地域文化的一种特殊载体。它承载了敦煌人民对生活、对社会、对自然的独特感悟,反映了敦煌人民的人生观、价值观、乡情乡俗、经验教训和喜怒哀乐等情感,体现着地域认同感和地域凝聚力,构成了敦煌文化的语言特色。

二、敦煌文化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历史文化

敦煌文化史料、遗存非常丰富,既有文字的,又有图像的;既有可供观览触摸的客体实物,又有可令神思驰骋的意识形态。

敦煌遗书是中国古代的文献宝库,在数万敦煌古代文献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民族、语言、历史、科技等各个领域,并有汉文、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龟兹文、粟特文、梵文等众多语种。蕴涵历史之漫长,领域之广泛,内容之丰富,特色之鲜明,为世界所罕见。

敦煌石窟现存洞窟 853 个,壁画约 52000 平方米,彩塑 2400 多身。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艺术宝库,也是研究古代艺术最珍贵的史料。

20 世纪出土的 28000 多枚敦煌汉简,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法律、文学、艺术、军事、交通、医学、民族关系等方面,为两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丝绸之路研究,提供了大量鲜活的史料,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三、敦煌文化是一种多元文化

敦煌文化,是古代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交流融合的结晶。正如国学大师季羨林所指出的:“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交汇的地方只有一个,这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没有第二个。”各种文化在这里汇聚、交流,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体现了敦煌文化的多元共存,包容开放的特性。

敦煌文化的多元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量北方各民族文化的元素。敦煌及其河西走廊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集地。众多北方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各领风骚数百年。夏、商、西周时期,主体民族是羌、戎、周人;春秋、战国时期主体民族是月氏、乌孙;秦朝建立后,主体民族是月氏、乌孙和匈奴;秦初,月氏打败乌孙,乌孙西迁,月氏占领河西走廊;公元前 203 年前后,匈奴逐走月氏,占领整个河西走廊。直到公元前 121 年,汉武帝派霍去病进兵河西,统辖河西走廊后,实施大规模的移民实边,迁中原数十万人来河西开发,汉民族才成为河西人口的主体。此后,虽然

有过吐蕃、回鹘、党项、蒙古、满族较长时期的统治,但汉民族一直是酒泉人口的主体,汉文化一直在敦煌经济社会生活中起着主导作用。历朝历代,众多北方民族在这里交错杂居,长期共处。各民族文化在敦煌这个广阔的舞台上反复碰撞,最终走向融合。

自人类文明形成以后,就形成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两大板块。就敦煌文化而言,无疑是这两大文化融合的产物。夏、商、西周时期,农耕文化占主导地位;春秋战国时期游牧民族月氏、乌孙主导河西经济,游牧文化也占主导地位;西汉移民实边以后,农耕文化再度成为河西文化的主体,形成了汉族农耕文化为主,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并存的局面。敦煌文化就是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流、交锋、融合中成长起来的。因而,敦煌文化中,融有众多北方民族文化的元素。

二是大量中原文化的元素。敦煌文化的基因来源于中原文化。西汉王朝统辖酒泉地区后,把 4 万匈奴降众分别安置在秦长城以北,黄河以南的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之地,号为“五属国”。当时境内居住着零散的汉人、羌戎人、乌孙、月氏、匈奴,数量非常少,可能不过万人。因此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说的“故浑邪王地空无人”。面对地旷人稀的局面,西汉王朝采取的第一个战略举措,就是移民实边——迁中原数十万人来河西走廊进行农业开发。《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汉末年平帝元始二年(公元 2 年)全国 103 个郡的人口状况。其中:酒泉郡 9 县,户 18137,口 76726;敦煌郡 6 县,户 11200,口 38335。据此,酒泉地区的人口达到 115061 人。其中,10 万以上是移民。移民的主体多为“关东下贫”,即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些移民迅速成为敦煌人口和敦煌经济社会的主体。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也带来了先进的思想、文化。中原文化是随这批移民在敦煌开始传播的,敦煌文化则是随着中原文化的传播而开始发育的。

魏晋时期,中原地区战乱不断,而河西地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大批中原人士为躲避战乱,纷纷来到河西,或著书立说,或传经讲学,在大量传

播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原文化的过程中,催生了敦煌文化。因此,敦煌文化的源头在中原,敦煌文化是中原文化在敦煌本土文化的土壤中发育、成长起来的。不仅如此,敦煌文化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地吸收中原文化的营养,使各个时期的敦煌文化,都融入了大量各个历史时期中原先进文化的元素。

三是大量的佛教文化、中亚文化、西方文化元素。丝绸之路开通后,中西交往的日益频繁,佛教文化、中亚文化、西方文化进入敦煌。在敦煌文化的成长过程中,大量借鉴、吸收了佛教文化、西方文化、中亚文化的因子。形成了兼收并蓄、包容开放的敦煌文化。正因为如此,敦煌文化才成为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典范,世界文明交流的窗口。

四、敦煌文化是一种崇高唯美的理想主义文化

敦煌文化的这一特性主要体现在敦煌艺术中。

以建筑艺术、彩塑艺术、绘画艺术、乐舞艺术为主要内容的敦煌艺术,是唯美是尊的理想主义艺术。与平实质朴的文字作品相比,敦煌艺术作品雍容华贵、富丽堂皇,气势恢宏。无论是建筑、彩塑,还是壁画、乐舞,都体现着美的追求,美的向往,达到了古代审美的最高境界,观赏过后总能给人以美的冲击、美的享受。

莫高窟第220窟南壁的唐代贞观十六年的阿弥陀佛经变图,壁画上面是说法图,下面展示了唐代恢弘的宫廷建筑,两边是胡旋舞蹈和乐队齐奏,展示了大唐盛世的场景,气质高贵,场景华丽,不仅给人以美的视角冲击力,还给人以美的向往。

敦煌飞天是敦煌艺术的标志和象征。

飞天原是古印度神话中的娱乐神和歌舞神,因周身散发出奇特的香气,又称香音神。后来被佛教吸纳,列入天龙八部,在佛祖讲经说法时献花散香,载歌载舞,飞翔在佛国的极乐世界中,是自由欢乐的象征。

敦煌壁画中的飞天,以歌舞伎为蓝本,大胆吸收外来艺术的营养,创造出了表达中国思想意识、风土人情和审美理想的中国飞天。从十六国开始,

中国飞天跨越了十几个朝代,历时近千年。敦煌现存飞天6000多身,其形象、姿态、意境、情趣、风格,都因历史变迁而不断变化。

敦煌飞天巧妙地运用夸张和想象,在有限的空间,用豪放的笔力、对比的色调创作出一幅幅超越宗教内容、具有浪漫主义风格的民间风俗画。最具代表性的是莫高窟285窟的飞天画,在这幅6米多长的画卷中,描绘了12身头束双髻、上身裸露、腰系长裙、双手持各种乐器、肩披彩带、逆风飞行飞天,四周天花旋转,云气飘流,飞天轻灵洒脱、气韵生动,形体之美表现得淋漓尽致。

敦煌飞天之美,美在飞动,即人物的飞动和飞动中的节奏、韵律。敦煌壁画中的飞天的形象、姿态和形式风格,随着时间的推移,都在不断发生变化。通过人物形体的变化,如身体的翻转、扭曲,四肢的伸展、摆动,衣裙飘带的走势,以及背景纹样的流动感,使画面中的人物造型具有流动的意态。从而体现出由力量、运动和速度构成的动态之美,体现出飞翔的节奏与韵律。

五、敦煌文化是一种儒家文化为主导的现实主义文化

敦煌文化的这一特征主要体现在文字作品中。

敦煌文化是儒家文化与本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在敦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坚持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在敦煌文化中一脉相承。同时,敦煌文化发展过程中,又始终坚守本土文化的特性,实现了儒家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完美融合。

两汉时期是敦煌文化的发育期,母体是敦煌大地,种子是中原移民带来的儒家文化。在魏晋以后的敦煌历史长河中,儒家文化不仅有力地支配和影响敦煌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发展,而且还以其巨大的渗透力和同化力,使埃及文化、印度文化、西方文化和吐蕃、回鹘、西夏、蒙古等少数民族文化,佛教、道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等宗教文化都不同程度地染上了“儒化”色彩。最终形成了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儒家文化与本土文化高度融合的结晶体——敦煌文化。

敦煌文化中,有着浓烈的家乡情结。敦煌文化的创作主体是西汉移民及其后代。这些迁居者及其子孙,世世代代生活在敦煌地区,把这个“万古不毛发,四时含霜雪”(《敦煌甘咏·三危山咏》)的苦寒荒凉之地建设成了一个繁荣兴旺的戈壁绿洲。因而,他们庆幸自己找到了一个宜居幸福的家园,赞誉为开拓这块土地而付出血汗和智能的祖先,缅怀他们祖根所在的中原腹地。敦煌碑铭文、邈真赞、氏族家传等许多作品中都有溯源寻根、缅怀先祖的文字。这种热爱乡土、怀宗念祖的乡土血缘之情,构成了敦煌文化特有的“家乡情结”。这种家乡情结,是儒家文化的具体反映。

敦煌人民长期生活在大西北,长期与北方少数民族交往,长期受游牧文化的影响,特殊的人文环境,造就了敦煌人民淳朴、耿直、豪放的性格。他们对事物的认知,对情感的表达,喜欢开门见山、直来直去;他们爱家乡、爱亲人、爱国家,崇尚“匈奴不破,何以家为”的思想境界,推崇“不斩楼兰终不还”的英雄主义气概。这种性格反映在文学作品中,便形成一种质朴豪放的文风。

敦煌文化是以普通大众为基本对象的文化。敦煌文化的创作主体是中下层人士,听众和读者也多是中下层人士。因而,敦煌文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是反映实际生活的作品,具有明显的目的性、针对性;注重实际、关切人生;朴实无华、真实自然,为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总而言之,敦煌文化的文字作品,具有关切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通俗质俚的语言、活泼多样的大众化体式,具有以俗为主、以朴见长、平实质朴大众文化本色。

六、敦煌文化是一种积极进取的文化

在敦煌文化的发育过程中,社会变迁十分复杂,有兴旺繁荣时期,也有战乱动荡、灾害频发时期。不管外部条件怎么严酷,周边环境怎么动荡,敦煌文化的基调一直是健康向善、从容乐观的,始终传播着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敦煌文化的格调是积极向上的。与其它文化相比,敦煌文化中很少有讽刺、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品。敦煌文化所表现的是,不管社会环境怎么变化,不管遭遇多少挫折,都要从容、乐观地面对;任

什么时候,都要热爱家乡,孝敬父母,都要勤奋敬业,都要忠君爱国。这种文化格调的形成,与儒家文化、佛教文化有密切关系。

敦煌文化中,有一种强烈执着的追求和进取精神。敦煌文人的笔下,武将向往立功,僧侣追求正果,农民渴望丰收,商贩追求发财,情侣憧憬爱情,学子向往成名,老人希望子孙满堂。总之,各行各业的人,都有自己的向往和追求。这些愿望和追求,尽管形形色色,各不相同,但都朴素正当,合情合理。这种来自不同阶层的向往和追求汇集起来,给敦煌社会带来的是辛勤奋斗和热情创造,从而形成了一股强烈的进取精神。正是这种全社会的进取精神,极大地推动着敦煌经济社会的发展。如此广泛而又集中地体现某一个地方中下层人民的进取精神,在中国文化中是独一无二的。

七、敦煌文化是一种立体、交叉文化

敦煌文化是一种立体文化。敦煌文化的材料,内涵极其丰富,既是时间历史的纵向记载,又是空间内容的横向展示。任何一项敦煌文化材料,都承载着多种关系,从多个侧面体现出多种意义。比如洞窟中的一条供养人题记,既属宗教,又显世俗;既可据此进行石窟考古,又可因其察悉社会民情;既是历史学内容,又有文书学价值;既是佛教信仰的记号,又是敦煌史地的印证;既是文书学的珍贵资料,又是石窟艺术的重要附庸。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敦煌文化的立体性。

敦煌文化又是一种交叉文化。

一是内部交叉。即敦煌文化内部各分支、各系列、各类目之间的交叉。如敦煌洞窟考古同敦煌历史地理的局部交叉;敦煌壁画乐舞图像研究同敦煌壁画器物图谱考古的交叉;敦煌佛教史研究同敦煌石窟佛教画研究的交叉;敦煌佛教信仰同敦煌世俗福乐追求的交叉等等。

二是外部交叉。敦煌文化的各个学科同一般史学、美学、宗教学、文学、语言文字学、文献学、经济史、科技史等学科都有交叉。

三是地区空间的交叉。如敦煌学同中西交通史在敦煌这个地区空间方面发生的交叉;敦煌学同西域学、西藏学、河西史研究等在敦煌及河西地

区方面的交叉等。

四是历史时段的交叉。如敦煌美术史同中国美术史在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这个历史时段内的交叉；敦煌文学同中国文学史在唐、五代、宋、元这个历史时段内的交叉等。

以上四种交叉，使敦煌文化各门类之间、敦煌学同其它多种学科之间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和影响；内容方面出现彼此衔接或互相渗透现象。这样，敦煌文化就必然出入往返于多种学科之间，成为多种学科的聚焦和纽带。

八、敦煌文化是一种动态文化

敦煌文化的发展是动态的。敦煌文化是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变革中逐步形成的、逐步发展起来的，是一种与时俱进的文化。

敦煌文化的地域背景是动态的。敦煌文化的地域背景，最初局限在敦煌地区。随着地上、地下遗物的不断发现，敦煌文化的地域背景逐渐放大到了酒泉的西部地区，后又拓展到伊州、西州、龟兹、楼兰、于阗、肃州、甘州、凉州等河西走廊和新疆东部地区。敦煌文化成为东起凉州西至龟兹这一广大空间地域文化的代表性符号。敦煌文化地域背景的扩展，新材料不断发现，致使敦煌学学科体系结构在动态中发展，发展中不断丰富完善。

敦煌文化的时限是动态的。敦煌文化的时限延续，最初局限在西汉至清末。上下不过两千年。20世纪以来，在敦煌地区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

遗物，表明敦煌史前文化的存在。这就把敦煌文化的时限至少往前推进了1500年。从清末敦煌学兴起到现在，敦煌学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同时敦煌文物文献也在不断发现。已有的成果使敦煌学学科体系结构逐步形成逐步建立，新的发现、研究又使敦煌学学科体系结构在动态中逐步丰富逐步完善。

由于敦煌文化地域背景和时限延续的不断变化，决定了敦煌学学科体系结构无法一次性完成，更不能一次定型。从敦煌学起步时，主要局限于敦煌遗书研究；20世纪30年代，敦煌石窟艺术进入敦煌学体系；20世纪40年代，概括敦煌学内容和指导敦煌学研究的理论产生；敦煌田野考古、石窟考古及壁画临摹研究进入敦煌学体系；20世纪60年代以后，对敦煌石窟及其他敦煌文物的保护、维修学科相继诞生；近年来，敦煌壁画和敦煌舞蹈在继承方面的实践和探索，也作为一个新的分支加入敦煌学体系。总之，敦煌学体系结构是在动态中逐渐充实和完善起来的，这种动态性，从敦煌学诞生之日起，从未停止，并且还将继续。因此，学界对敦煌学结构体系进行建纲立目，只是划出了截至目前敦煌学涵盖的范围，并不否认未发现或虽已发现但被遗漏的内容的存在，更不拒绝这些内容补充丰富到敦煌学结构体系之中。

(作者系酒泉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志办主任)



浅论陇东根据地的社会教育

关润鸿

摘要:抗战时期,陇东掀起了以文化、政治、卫生和群众文艺活动为内容的社会教育高潮。这一教育实践不仅为根据地建立和巩固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革除封建陋习,促进生产发展,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为党的政治动员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1937年7月,全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以陕甘边区为中心的抗战教育随之建立和发展起来。在抗战教育中,社会教育有着重要的地位,发挥着显著作用。陇东是陕甘边区政府的所在地,开展了以文化、政治、卫生和群众文艺活动为内容的社会教育(俗称“社教”),社会教育活动开展以来,广大群众通过学习文化,开始从愚昧落后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树立新思想、新道德、新风尚,大大激发了陇东民众的抗日觉悟,推动了根据地的建设事业。

一、陇东革命根据地社会教育概况

陇东原是一个典型的封闭世界,传统习俗主导着老百姓的生活:“一年四季吃冷水,常不洗脸不洗手,作饭不洗米,上炕不脱鞋”,妇女中没有剪短发的,很多人还缠足。这里的习俗还规定女子不能陪客人吃饭,她们除了家庭缝纫做饭外,不思他事。在文化教育上,这里是“地球上最黑暗的一个角落”。除了少数地主、官吏、商人,几乎没有人识字,一块文化教育的荒地,知识分子如“凤毛麟角”,300人中才有一个稍识字的人。1931年,全区8个县,有完小24所、初小118所、在校学生4390人。文盲占全区人口的98%以上。^①

1937年秋,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教育事业,提出了“发展民众教育,消灭文盲,提高边区成年人之民族意识与政治文化

水平”这一为抗战服务的教育方针,社会教育迅速发展。同年9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号召在边区开展“扫盲识字突击运动月”活动;10月开始第一次冬学,仅环县、曲子、固北3县共办冬学58处,学员719名;识字班369处,学员2424名;夜校20处,学员225名。次年,新正、新宁、华池、庆阳冬学发展到95处,有学员1581名。以后随着识字组的建立,以小学为中心建立半日学校和夜校,组织不脱离生产的男女进行识字扫盲。1939年春,毛泽东提出“为消灭文盲而奋斗”,陇东根据地广泛发动群众办教育,社会教育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1940年底,各县共创办冬学80处,学员1334人;夜校239处,学员3182人;识字班374个,学员2390人,半日校62所,学员1124人。其中以新正县最多,全县参加学习人数2535,妇女达1105人,占妇女总数的40%。与此同时,各县相继创办民教馆、俱乐部以及剧团等社教组织。同年,陇东剧团(1939年成立)赴延安慰问演出,受到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毛泽东主席并为该剧团题词“向前进,勇往直前”,使全团同志倍受鼓舞。在返回陇东后,以更加高涨的热情投身于社会教育工作,演出许多反映新生活、服务于抗战与生产、群众喜闻乐见的戏剧,在当时很有影响。1942年,整风运动之后,使社会教育工作又重新获得生机。陇东地委认真贯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关于成人教育重于儿童教育的政策,以及社会教育“进一步为群众服务,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在开展社会教育活动中,根据本地区的实际状况,大力创办各种社教组织,各县民教馆、夜校、识字组、读报组等在以前基础上又有大幅度增加。同时还采用“旧瓶装新酒”的办法,利用社火、秧歌等民间艺术开展

活动,寓教育于娱乐之中,掀起了社会教育活动高潮。在当时众多的社教组织中,以冬学最为突出。从时间、对象、教学内容分,有全天冬学、半日冬学、卫生冬学和一揽子冬学等。这些方便群众的组织形式,符合人民群众要求,因而也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1944年,陇东的庆阳、合水、镇原、环县4个县冬学就由1942年的12所发展到474所,参加冬学人数也成倍增加。尤以庆阳县最为突出,冬学由1942年的5处增加到148处,学生由112人增加到2800名,特别是一向被关在屋里的妇女也走出家门参加学习。^②

二、陇东革命根据地社会教育的特点

根据陇东社会教育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出如下特点:

(一)形式灵活多样

陇东社会教育教学组织形式灵活多样,采取办民教馆、夜校、冬学、剧团、领导群众娱乐、借阅读书等形式,“进一步为群众服务,为政治服务”。夜校,一般是成年人,主要是冬学学生,为巩固过去所学的成绩和继续学习新的东西,晚上在学校上课温习,除识字、唱歌,也读报,如1941年陇东分区共举办夜校37处、1942年举办夜校18处,学员多半能识生字,能写便条;冬学,有全天冬学、半日冬学、冬学夜校,成人冬学、儿童冬学、妇女冬学、放牛娃冬学、文武冬学、卫生冬学和一揽子冬学等等,有的以生产单位为基础,如华池县城壕村的特等劳动英雄张振财,1个月就识下了300多字,带领全村31人全部参加了识字班,实行父教子、夫教妻、哥哥教弟妹、儿子教母亲,连小脚婆姨和光屁股的放牛娃也动员和组织起来;识字班,大都是在白天适当的时候集中进行学习,如华池白马庙的劳动英雄石怀玉3个月就学会了350个字,可读边区《群众报》;读报组,年龄要求不太严,只要有时间,喜欢听的都可以来,既学习时事政治,又学习文化知识;小先生,是利用学生每天回家,带个纸条,给母亲或姐妹进行识字教育;剧团,组织群众在街头参加演出新戏,如当时合水人民抗战剧团、庆阳老百姓剧团、陇东剧团,组织街头群众参加曾演出剧多次;书报室,每日开放,让群

众阅览,如1942年曲子借读书者有26次,借出各种书籍94本;领导群众娱乐,合水领导地方剧团,庆阳民教馆春节时组织秧歌,平常有室内游戏——棋类、扑克、乒乓球等。^③

(二)内容丰富多彩

陇东社会教育把学习文化和群众的实际生活、生产需要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安排教学内容,内容丰富多彩。主要教材有《农民识字课本》、《日用杂字》、《庄稼杂字》、《卫生课本》等,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增减,介绍庄稼栽培、纺线织布、妇婴卫生、珠算记账、公文知识等内容。^④对一字不识者则教扫盲识字;对乡村干部教记账、珠算以及写信等;对妇女教认票子。由于所教内容与群众需要密切相关,群众们都乐于参加。镇原县刘家城冬学,起初是以识字为主,后来教员李冰珠根据农村妇女疾病多的状况,便将冬学教学内容改为群众需要掌握卫生常识的“卫生冬学”,参加学习人数由原来26人很快增加为20人,经过学习,全村绝大多数妇女掌握了一定卫生知识,有效地预防疾病传染,出现人人讲卫生的好习惯。^⑤同时,社会教育利用快板、清唱、讲故事、讲演等多种形式教大家学唱,排练《不当亡国奴》、《爱中华》、《送郎参军》、《钉缸》、《买画》等小剧和歌舞。也请民间艺人给群众讲《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民间传统故事等。

(三)对象不拘一格

陇东社会教育面向群众,具有广泛性和普及性,参加社会教育的有军人、群众、学生、干部、僧人等;有男人、女人;有成年人、老人、儿童。

抗战时期陇东社会教育工作认真贯彻边区政府制定的《战时教育方案》精神,积极进行抗战教育,教育群众树立革命观念和战争观念,动员广大群众拥军、参军。1937年红军教导师帮助庆阳县建立民教馆,充分利用其场所采用举办演讲会、教唱革命歌曲、办墙报、黑板报等形式开展生动活泼的社会教育活动,很有吸引力。

1938年,陇东各级党委组织动员区、乡级干部同群众一道参加冬学、夜校、扫盲识字班学习文化知识。到了1939年,陇东各县的干部教育已初

具规模,仅环县就成立区级干部识字组 11 个,乡级干部识字组 40 个。华池、曲子等县也较前有所发展。1940 年,陇东分区党委组织地、县干部系统学习了《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下册)、《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上册)等理论书籍,以提高领导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⑥

1944 年曲子、新正等县的宗教界著名人士积极组织动员回民利用主麻日在清真寺内读报识字,深受回民拥护,也有力促进了陇东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⑦

三、陇东革命根据地社会教育的基本经验

陇东的社会教育在抗战时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在无产阶级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研究和总结陇东社会教育的宝贵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社会教育与党和人民所面临的基本任务紧密结合并为它服务。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边区,社会教育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就是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建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进行的。为了适应抗战的要求,陇东社会教育加强了抗战教育的内容。在教学内容中,着重讲解抗日英雄、防空、防毒有关的知识,通过教学,激发了人民群众对敌人的仇恨,鼓舞了人民群众对抗战的热情。

(二)社会教育同群众生产、生活相结合。抗战时期的社会教育比较灵活,同群众生产、生活相结合,因时、因地、因人制宜地创造了个别教、互帮互教、家庭互教等多种形式。在时间安排上采用大忙不学、小忙少学、农闲多学、雨天雪天集中学习的办法。群众迫切需要掌握的东西,也就是社会教育所教的主要内容。陇东各级党政组织遵循“群众需要什么就教什么、补什么”的原则,为配合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通常以识字为主,同时还进行政治、生产技术和卫生教育等。1944 年曲子周湾冬学教员赵晋英在教学当中为照顾不同对象要求,就创造了“一揽子冬学”。这些方便群众的组织形式,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因而也调动了群众识字学文化的积极性。

(三)社会教育贯彻群众路线,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共同举办。陇东社会教育贯彻群众路线,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共同开展,这是对以往单纯靠政府创办教育事业制度的重大改革,有效地促进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1941 年,由于机械地执行边区教育厅规定的办学标准,致使冬学等社教组织大为减少,对社教工作产生不良影响。由于用这种主观主义的强迫命令推行社会教育,使教育完全脱离群众,引起群众不满。通过 1942 年整风运动,在教育内容上根据实际需要出发,打破旧的条条框框。走群众路线,发展社会教育,这一行之有效的经验,今天仍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抗战时期陇东开展的社会教育活动,是抗战时期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它不仅为根据地建立和巩固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在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革除封建陋习,促进生产发展,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水平等方面都取得很大成绩;不仅创造出了形式灵活,多种多样的组织形式,而且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也是紧密联系革命斗争实际和群众“需要”进行的。它在抗日战争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注释:

①《庆阳地区教育志》,庆阳地区教育处编,甘肃人民出版社,第 3 页。

②《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刘凤阁主编,内部出版,第 40 至 42 页。

③《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第 488 至 492 页。

④《陇东革命斗争史》,马西林著,甘肃人民出版社,第 140 页。

⑤《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第 43 页。

⑥《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第 46 页。

⑦《庆阳党史论文集》(一),李占年主编,内部出版,第 223 页。

(作者单位:正宁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二轮修志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何成才

我市的二轮修志工作已全部启动。修志总的指导思想、原则及方法在2006年启动会议上我已讲过,修志的总体要求、体例通则、行文规范、质量标准在县上的编纂方案中已有详细规定,这里再不作赘述。现根据其他已完成二轮志书编纂任务的情况及本人的一些思考,提出一些问题与大家共同商榷。

一、二轮志书要全面体现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的问题

时代特点、地方特色鲜明,是衡量二轮志书质量高低的重要标准之一。在二轮志书的断限内,正处在改革开放的重要历史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为此,要始终坚持突出一个“新”字,一个“改”字,一个“变”字。在这一时期,最鲜明的时代特征就是改革开放,最典型的地方特色就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新成就。这个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既要体现在编章节目的合理编排上,更重要的是把它有机地融合到志书各个门类的具体记述之中。

改革开放贯穿于全县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的志书对改革开放的内容设了专章专节进行叙述,好处是记述相对集中,对大的改革措施一目了然,但存在的问题是,一方面记载的内容过少,显得空洞无物,另一方面同各章节记述的具体内容多发生重叠甚至冲突。我认为,对一些大的事件可作专门记述,并要突出整体性,如企业改制、张临高农村改革试验区等(1989年试点,1990年面上推广;1991年总结。临泽县志下限1990年),这些专题内容不宜割裂,有必要在相关编章中整体叙述,其它各行各业的改革就应该有机地融合到各个门类的具体记述之中。

突出特色就是强化重点事物和事物的重点方

面。而重点不一定是亮点,但亮点一定是有特点的事物。所以,必须抓住有特色的事物精雕细刻成为亮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亮点,共同构成鲜明的特色。体现时代特色要选择重点行业,关注重点领域。这个重点领域主要是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在商业领域,改革措施如租赁经营、承包经营、资产重组、所有制变革等;经营模式如超市、连锁店、专卖店、电子商务等,且经营模式的变化引发了商业理念、经营思维、营销策略、服务方式的变化等。在服务业方面,不能把眼光仅停留在过去的传统服务业上(旅店、理发、洗浴、照相等),对社会紧密联系的新型服务业如现代物流业、信息咨询业、广告媒体业等,从微观方面分析如职业介绍、婚姻介绍、房屋中介、休闲娱乐、家政服务等;还有一些从传统服务业中派生或嫁接出的新型服务行业,如美容、桑拿、健身、茶饮、酒吧、歌厅、网吧等。这些都是详细具体的当代“清明上河图”,必须以文字和图片的形式进行全面记录。在文化方面,不仅要记公益性文化事业,还要记新型文化产业,如自发性群众文化活动;在教育方面,除政府办学,还有社会力量办学等等。这就要求修志人员要有宏观把握和驾驭资料的能力,就必须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充分占有资料,在占有的资料上进行再创作。所以,对改革开放带来的新变化、出现的新事物、新人物、新风貌要进行全面系统的记述。例如:旅游业,在一轮志书中只是反映在文化章节中的文物遗址、遗迹,二轮志书中需要专章记述;制种业这是临泽的最大优势,必须用较多的笔墨专章记述,还有工业园区、民营经济、小康建设、资源开发、房地产业、保险业、文化产业、市场体系建设、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等反映本县特色的东西要充分记述。同时,对于已经消失或合并的行

业、部门也应记述清楚发展或消失的脉络。对于一些在改革开放中走了弯路乃至出现的失误也应进行客观的、真实的记述,在记载上要注意记事略人,这对于人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曲折性、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为后世提供借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二、关于经济部类所占比例的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是我看到已出版的部分县的志书经济部类所占的比例过大,社会部类、文化部类所占的比例过小,显得畸轻畸重。毫无疑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二轮志书需要浓墨重彩的,但地方志是反映一地自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的整体面貌,经济部类比重过大,就必然挤占了社会部类、文化部类。文化部类、社会部类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文化部类就包括科研、技术、教育、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网络音像、文学艺术、文物、医疗卫生、体育、娱乐等;社会部类包括社会组织、民族、宗教、家庭、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风俗、方言、人民生活等内容,所以,有必要大力彰显地方文化,全面记述其反映社会、服务社会的基本职能。根据各地的反映和专家学者的统计研究,经济部类的内容比重一般占到志书总量的40%左右为宜。这个问题前期在设置编目大纲时注意,特别在运行当中引起重视。

三、续志与前志的衔接问题

这个问题是二轮志书编修过程中的一个难点问题。处理不好,要么与前志造成过多的重复,要么对有些事件的记述有尾缺头,影响志书的整体质量。

总的要求是二轮志书尽量与前志避免过多重复,因二轮志书的基调是“续修”而不是“重修”,不是对一轮志书的补充。所以原则上要尽量避免与前志的重复。但二轮志书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整体,续志绝不是前志的续篇,续志是有连续性、独立性的一部志书,必要的合理的重复就不可避免。那么,怎样才算是合理的,哪些是合理的重复呢?

1. 对前志地理编中的资源、物产、交通、区域等县域、县情在创新的基础上复载是必要的。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对外联系和贸易往来

日益频繁,如果不详尽记载当地的资源、物产、气象、交通、通讯等方面的地情,外商就无从知晓投资环境和条件,这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同时,鲜明的地方特色、民俗风情等传统文化特色作为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续志也应复载,有些旧风陈俗已被新思想、新观念、新风尚冲垮和替代,续志记载新思想、新观念、新风尚时,也会涉及陈旧的风俗;还有一些名人或影响较大的人物前志还在世,续修时已去逝,需要为之立传;现在仍然健在者,一般也需作简介。在方言民俗中,一些旧俗的复兴、新出现的节日(圣诞节、情人节、佛诞节、庙会等宗教节日),还有宗族中修家谱、修缮祠堂、扫墓祭祖等,以及沉渣泛起的赌博、吸毒、卖淫、嫖娼等前志已载,续志也不能不记载。当然,重载的内容并非一字不缺的照搬,有些也是有变化的,如行政区划、资源的重新普查、气候的变迁等等,这也都是动态的,并非一成不变。另外在编排上也应做合理的归类。

2. 对于超上限的事物,应从事物发端的时间写起。如一项工程、一件大的事件,前志只记了头,还没有结果,续志中应溯其源头,从事物的发端写起(如张临高农村改革试验区)。同时,要注意写好转折点。所谓转折点,是指事物发展过程中出现重要变化的年份,即就是发生重大量变和质变的年份,不能只有上下限年份的资料,没有转折年份的资料,反映不出事物的曲折发展、兴衰起伏。这里就有合理利用年鉴资料的问题,对年鉴及其它方面的资料要进行整理、归类、筛选,去粗取精,言简意赅,切忌资料堆砌,切忌把志书年鉴化。

3. 各章节如何衔接。怎样承接前志,方志界专家的意见也不尽一致。但有几种承接方法我们可以去探讨。一是利用卷首的“概述”和编、章前的无题“小序”及节前的“引言”承接前志。概要记述事物的产生、发展、转折情况,以明晰事物的发展全过程。例如人物的“小序”,先追溯前志人物传、人物简介、烈士英名录的概略,再概括交待续志年份里故世对本地有较大贡献和在历史发展中起过较大作用的知名人士立传,以及人物表登录的概括,从而通过文字表述的构联,就能把前后志关系处

理好。二是追记前志未记、漏记、应记的内容。三是利用附录、名录、专记补充前志遗留的重大事件和纠正前志之误。四是利用表格适当上溯记录事物的发展情况。五是利用人物传略、简介和人物录补记前志遗漏的人物。六是利用“注”的办法承接前志。注释的方法有三种：①一段注释法，即对一句话加注，用一段注释记述事物的发端、发展情况，直接与续志上限相衔接。②分段注释法。即连续对几个句子加注，分段注释事物的发端、发展、曲折和变化情况，直至与续志的上限相衔接。③直接注释法，即对记述事物的标题加注，直接注释事物从发端开始的全过程，直到与续志的上限相衔接。利用哪种方法，根据实际情况择其定夺。

四、认真研读前志，纠错补漏

研读旧志，一是为了补漏。补漏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应记的未记，要在续志中进行补记，如经考古新发现的史料、新发现的古籍、民间遗物等有存史价值的新史料；漏记错记的人物及荣誉等。另一方面是应该详记的未详记，在续志中应详记。二是为了纠正错误。纠错不仅仅指校对一下错别字和标点符号，更重要的是要纠正某些问题有无原则性错误，有无失实或与现实不相符的问题，当然也包括数据是否失真，用词是否准确，以及时间、称谓、计量单位、引文等等，凡错必纠。漏与错的问题如何在续志中安排，方法有两种：一是专设“前志补遗勘误”，专门记述需补充的内容或纠正的错误。对错别字、标点、数据、计量单位等，用图表的形式来表现。二是对内容不全或事实有误的纠正内容可穿插在正文之中，或以加“注”的形式进行补充和纠错。同时，二轮志书要有“索引”，这是中指组提出的必要条件，作为“要件”必须要有“索引”。

五、加大图片用量，注重解决续志图文互补的问题

志书应坚持图、述、志、录一体化的格局，图片与文字互为表里，虚实相资，详略互见，相辅相成，构成一个完整的信息体系，发挥志书更大的社会效益。在前志中都搞了一些图片，一般集中放在志书首部。但总体上还是图片量少。续志中要加大图

片数量，最好将图片随文字插在正文之中，做到图文并茂，文图互补，互相衬托，相得益彰，使志书更加生活化、立体化、形象化。图片应统一编号，图注编录采用实物标注式、图文互补式、图文说明式和混合式等方式灵活应用。这就要求在各单位提供文字的同时，需要收集大量的图片，根据志书的总体要求筛选使用。

六、对市场化运作的一些行业、特别是人民生活部分要做一些专题调研和探讨

目前，一些市场化运作的行业及其管理部门缺乏有效的统计，情况不清，底子不明，这就需要进行一些专题调研。还有人民生活丰富多彩，这一时期，人们的衣食住行、文化生活、健身活动、休闲娱乐活动、节日纪念活动、婚丧嫁娶及社会风尚的变化都是前所未有的，也需进行专门的收集与整理，这方面要下些功夫，列出专题，确定专人，通过口碑资料、实地调查、社会调查、包括民意测验、群众代表座谈等多种形式，有针对性地进行收集与整理。

七、志稿的资料、行文等必须要统一标准的问题

这个问题涉及的内容很多，都有一些具体的要求，这里不再展开详讲，大致提一下。在总纂志书稿时，必须坚持同一标准，分类时参照2002年国家统计局颁发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注释）》的规定，它是划分国民经济行业的标准，也是二轮修志横分门类的尺子。参照此标准划分类目，就不会出现类目辈分混乱的问题。（1）入志资料要全面系统。（2）入志资料要真实可靠。（3）入志资料要前后一致。（4）入志的数字资料要以统计部门的数据为准。在书写规范上，要按照“以时有序”的竖写原则，志稿表述中，不能出现倒叙、插叙的问题，不能采取编年纪事的写法，更不能采取工作总结式、文件摘编式、议论式的写法。要坚持记好起点、转折点、终点。在行文规范上，用字按2003年修订的《现代汉语词典》为准；标点符号执行国家标准《标点符号用法》；数据按国家《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执行；计量单位执行国家标准《量和单位》的规定执行；志书的装帧按甘志办发〔2007〕41号文

件执行。还需要强调的是按照中央1997年的文件规定,未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中央文献研究室等有关部门批准,任何公开出版物不得擅自刊载曾任和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以上(包括常委)的国家领导人照片,不管是工作照还是生活照,必需刊载的,须报上述领导机关批准。

八、最后讲一下需要注意的几个政策方面的问题

1.要正确处理涉及政治、政策方面的敏感问题。注意对香港、澳门、台湾的表述不能与国际上其它国家并列,应称“中国香港、澳门地区、台湾地区”,尽量将港澳台事务从“外事”和“对外经济贸易”栏目中分出单列。涉及用语应与中央的正式提法保持一致,对台湾某些机构的名称、称谓要加引号。涉及新疆、西藏等问题能避免的尽量避免。谨慎处理对历史人物、当今人物的评价,尽量只记事实不加评论。记载、公开华侨的捐款,尤其是东南亚侨胞对家乡的捐资及投资者的姓名时,应谨慎行事,不宜过细。记载1989年“六四”的准确提法,根据中央办公厅[1991]20号文件,应写作“1989年,发生在北京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避免使用“事件”“暴乱”等词语。

2.民族、宗教方面的问题。除了引用历史文献,对伊斯兰教不称“回教”,不能出现侮辱少数民族的语言。尊重少数民族的民间习俗,不在志书中作丑化或猎奇的描述。注意区分宗教与迷信。遵守宪法关于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法规;严格区分打着宗教幌子从事其他违反宪法活动的人和事;严格区分正当的宗教活动和非法的迷信活动;在处理邪教时注意区分骨干与一般人员的区别,只记载已定论的事情。

3.社会秩序稳定及涉及人权方面的问题。(1)注意信访工作对社会稳定的重要影响。不以对立的情绪、词语记述信访、上访问题。如“有效遏制了”“处理闹事、骚动者”等字眼。(2)计划生育方面突出优生优育原则,少用、慎用节育的具体手段,不要记载惩罚性的具体措施和统计数字等情况。(3)避免提“监狱经济”,不记载监狱劳改犯的改造情况。

4.保密问题。(1)军事、公检法、国家安全部门等单位的番号、驻地、配备、军事演习、后勤保障、战时动员使用的力量、重大未公开的战事、参与地方经济、特殊使命等情况;涉及公检法的侦察手段、公安机关的实力、案件细节、罪犯作案情节、方法和手段等。(2)新科技发明、特殊产品的工艺及生产流程不做详细记载。(3)不曾公开报道过的人为灾害情况(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及伤亡人数2005年8月1日起解密)。

二轮修志的时间较短,资料相对齐全,搜集资料的难度较前志相比相对难度小一些,但筛选、整理、把握资料的难度相对较大,要在浩瀚的资料中提炼出有历史价值的东西,把它编著成为一部质量上乘的精品,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可以说第一轮志书更具有历史学的意义,二轮志书更具有社会学的意义。所以,二轮志书的编修要认真研究社会问题,把握时代的主旋律,突出重点、亮点和特色,又要做到文字简明扼要,语言准确,文约事丰。希望我们的编修人员充分认识自己肩负的责任,按照“精(精确、精炼)、严(严谨、严格)、挤(挤干水分)、实(真实、客观)、高(高要求、高标准)”的要求,在仅有的四年时间内编纂出一部无愧于临泽人民、无愧于后代的精品佳作。

(作者系张掖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



提高志书“可读性”的几点思考

张国彦

在志书的编纂过程中,志书的可读性往往被人们所忽视,认为强调志书的可读性会影响志书的客观性、记叙性、权威性乃至志书的质量。“可读性”是指书籍或文章所记述的内容吸引人、文笔流畅等使读者爱看爱读的特性。志书的可读性应有其自身的表现形式和内在要求,它的可读性是指志书对波澜壮阔历史的立体记载、生动再现。主要体现志书文约事丰、生动详实,突出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文图并茂、文表互应,语言精练,精美典雅。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我们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就是要在前志的基础上再有所突破、有所创新,这样才能赋予地方志以新的活力,使得志书“资治、存史、教化”的功用得到充分的发挥和利用,从而达到全社会读志、用志的目的。

一、提高志书可读性首先要确保志书的编纂质量

我们都知道,质量是志书的立足之本。由于地方志是资料性著述,其资料的详实、完整、准确就成为志书的灵魂,否则,其功用和价值就不复存在。志书的质量除要具备全面、详实、准确的资料条件外,首先是要对主编资格的严把关。对主编资格的严把关就是要求主编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存真求实的科学态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如实地记述好在改革开放中一地的社会、政治、经济、自然、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和是非得失。主编既要有较高的政治思想水平,又要有较高的方志理论知识的积累,更要有统筹和驾驭全志的综合能力和高度的责任感。由于一部志书

要经过众人之手组稿汇集而成,就难免会出现志稿水平参差不齐、风格各异的现象,这就要求主编在最后统稿时,要严格按照志书编写的统一规定,把风格各异的志稿统一起来,形成全书统一的格局。其次是严格把好审稿关,明确岗位责任制。责任编辑、分纂审定应有明确分工,明确的要求。在确定好的总体框架基础上,各责任编辑各负其责,各司其职,认真的按照规定要求组织好所编写的志稿,这样一部志书大到总体框架设置、观点、政策,小至标点符号、遣词造句,按照统一的规定来记述,才能使全书达到统一。三是要注重修志队伍人员的建设。修志人员自身素质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志书质量的高低。修志人员不仅要熟练掌握编修地方志的理论和相关的规定,还应对所编修的某个部类、某个行业的专业知识有一定的了解,这就是所说的“内行修志”。鉴于续修志书仍免不了众手成志这一特性,因此,加强对修志人员的业务培训和自身素质的提高,及其关键。特别是加强对主编或总纂人统稿能力的提高更为重要。

二、提高志书可读性要充分体现志书的著述特性

李铁映同志在全国第三次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指出:“新编地方志是一种特殊体例的著述,每一部志书都是一部学术著作,都是一部精品,这是对新世纪修志工作最基本的要求。”地方志在大的范畴是归属文化产品,但又有其自身的特性,它是在收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经过编纂者分析、提炼、加工和深思熟虑后,围绕着记述的主体,用作者的语言编写出来,是对原始资料的再加工、再创作之后形成的。志书是严谨、朴实的资料性著述,不是资料汇编,但二者又有着必然的联系,不能只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如果只强调资料性,

忽视著述性,就会把志书编成长编式的资料汇编;如果只强调著述性,忽视资料性,也可能把志书编成经验式的总结或论述性的专著。社会主义新方志其学术价值和科学属性决定了它的著述性,而著述性正是它的学术价值的具体表现。如果著述性不强,则难以避免所记述内容出现依年记事、资料堆砌、详略不当、主次不分、缺乏深度、不加取舍、照搬照抄、逻辑性差、记述失误以及篇幅过长、内容琐碎等问题,这将会削弱志书的科学性和学术价值,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志书的可读性和质量。我们编纂的是社会主义新方志,全书要达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记述的事物要求反映出事物间的内在联系,给人们以规律性的认识。因此,只有增强志书的著述性,坚持资料性与著述性的统一,才能使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要增强志书的著述性就要从研究、消化入志资料着手,要求编纂者对所搜集到的资料进行认真的研究、分析,从中提炼出能够反映事物内在的发展规律,揭示事物兴衰起伏、前进与挫折或者反映阶段发展过程的资料,这样才能克服流水账式、平面式、观点加例证式的记述方式,才能达到观点与资料的统一。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宗旨是通过记述事物兴衰起伏的发展变化,揭示规律,为人们留下可资借鉴的资料依据。这就要求志稿的内容要有重点、有特点、有变化,不能不管有无变化、是否重点,都用相同的笔墨、相同的模式、相同的记述方法来记述,把志稿写成大事记、流水账。编纂者面对收集到的大量文字资料要善于提炼、概括和综合:一是要认真消化资料,吃透地情、行情,抓住主线事物发展变化的主要脉络;二是要科学的组织资料,分清主次,哪些是主体资料,哪些是背景资料,哪些是典型资料,哪些是辅助资料,由此来确定资料的主要位置和衬托位置;三是要坚持用正确的观点来统领资料。编纂者必须要坚持把握好志书“以实记事”的原则,在占有资料的前提下,不做评论、不加渲染的精心编写,要把每篇志稿都当成一篇文章来写。

三、提高志书可读性需要突出对“人物”的记述

人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主体、地方志书必须突出对“人物”的记述。这既是由地方志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也是提高志书可读性所必需的。地方志记述的是地方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如果抽去具体人的社会活动,方志对地方历史的记述就会显得苍白无力。人物作为“一郡之柱础,乡邦之光耀”,在地方志中占有突出地位。历代地方志都非常重视人物的收录,注重人物编纂。新中国二轮修志正处在贯彻落实胡总书记“科学发展观”的历史新阶段,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写好写“活”志书人物,既是地方志的本质属性所要求的,也是“科学发展观”在地方志工作中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提高志书可读性的一条重要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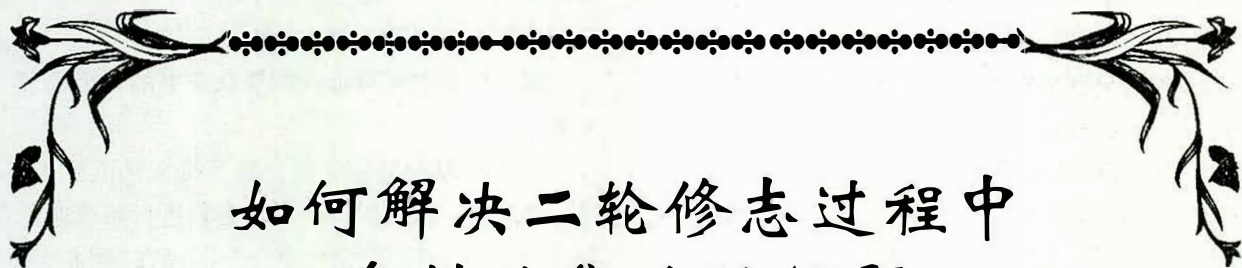
四、提高志书可读性需要从志书的各个细节入手

编修地方志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通过编纂志书,既可对历史文献资料进行系统地发掘整理,又可对国情、地情进行全面调查。因此,地方志是地情书,是一方之志,所记为一地之史,所述为一地之情,是地情资料的高度浓缩和科学提炼。地方志作为一种地情信息载体,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经历了地记、图经、志书等几个阶段,方志的内容、体裁、结构、篇目等编纂体式也不断更新、完善,形成了今天的“以概述为纲,以大事记为经,以各专志为纬”的新方志体式。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要记述的内容应更贴近社会现实,更具有可读性和观赏性。这就要求修志人员要参加社会实践,开展调查研究是不可缺少的环节。志书要为后人提供准确、详实的史料,反映某一历史阶段各地区、各行业中的大事、要事、新事,让人们对某一事物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易于理解,便于借用,这样才会赢得众多的读者。以往志书大多是一些志界或专业人士阅读、查看。但是随着志书编纂体例的创新,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发展,地方志编纂水平的不断提高和现代化新志体的出现,志书已经走出方志界的圈子,正逐渐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重视,志书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逐渐体现出来。一部著作是否能引起读者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它的观赏性。从封面规划、图片编排、版式设计等等整个装帧设计都是吸引读者的一个方面，志书也不例外。虽然志书记述的事物是以史为实，不予虚构、发挥、评论，但是在装帧设计上完全可以充分展现其特点和特色。一个好的装帧设计不仅能给读者留下美好的印象，也能吸引更多的读者，还能把具有较高的文化品位在外观上展现给观众。因此我们在注重提高志书的内在质量的同时，也应注意志书外观质量的提高，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全方位提高志书质量和增强志书的可读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工作也要有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新的思路和新的手段。修志工作者要认真学习方志理论和进行实际调查研究，不断地更新思想观念，牢固树立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事业负责的责任感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积极主动地学习、掌握新方法、新技术，在实际工作中大胆探索和开拓志书编写的新渠道，为地方志这一古老的信息载体注入新的活力，以适应现代化社会的需要。

(作者单位：秦州区地方志办公室)



如何解决二轮修志过程中 资料收集难的问题

杜小军

摘要：国务院条《地方志条例》明确规定：“地方志是资料性文献。”资料既是志书构成的基础，也决定了志书质量的高低。但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驻区单位由于不归当地政府直接管理，行政手段又难以约束，收集资料的难度很大，切身的一点体会是不支持，不配合。本人结合自己收集驻区单位资料的过程，谈谈解决驻区单位资料收集难的一些方法。

关键词：地方志 资料 解决 驻区单位 收集方法

地方志是一地的百科全书，方志的区域性特征界定了志书必须以行政区域为空间范围作为记述的对象，全面、详实记述好辖区内各行业的发展历程是方志区域性特征的基本要求。这就说明本地行政区域空间范围内的各行各业都要为地方志提供资料。胡乔木同志说过：“地方志是严谨的、科

学的资料书。”资料是志书编修的基础，是志书编纂的重要环节。入志资料的质量是衡量志书质量的重要指标。如果没有丰富、翔实的资料，就等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修志将成为一句空话。但是我们的二轮志书《秦州区志》自2007年启动以来，截止2012年底，大部分驻区单位都没有提供区志资料。如银行、保险等部门不参加地方志的会议、培训活动，要求提报资料以保密为借口不予提供，行政手段又难以约束，在资料收集方面存在着很大困难。本人结合自己自收集二轮《秦州区志》驻区单位资料的实践体会，就如何解决驻区单位资料收集难的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做法。

一、联合街道办事处、社区工作人员通过上门查阅、座谈等方式收集资料

秦州区是天水市政府所在地，是天水市政治、

经济中心,驻秦州区的国家、省、市单位多,这些驻区单位都属它们本系统上级部门垂直管理,秦州区政府运用行政手段难以约束管理这些驻区单位,我们区地方志办公室发给驻区单位的各种文件他们不理不问,召开的全区地志会、业务培训会不参加,打电话要求提报资料以保密为借口不予提供。秦州区地志办通过多次开会研究,最后决定利用街道办事处对驻区单位属地管理的权利,决定由地志办联合街道办事处、社区修志人员通过上门查阅、座谈等方式收集资料。我们先来到银行、证券、保险、供电、电信、邮政、移动等驻区单位,联系了这些单位的分管领导和办公室负责人,通过办事处和社区修志人员的介绍,说明了来意并强调了这些资料对编纂二轮《秦州区志》的重要性。针对每个驻区单位拥有资料的不同情况,我们采取了不同的方式来收集资料。

首先,对于资料拥有较多的驻区单位,如天水市供电公司、天水市移动公司,我们采用了查阅资料的方式来收集我们所需要的资料。我们通过查阅他们的档案资料,记载本系统情况书籍和专业性报刊,特别是他们每年给上级主管部门报送的工作总结和提供给上级部门的编纂部门志的资料。我们把对编纂二轮志书有用的资料复印带回区志办,经区志办编辑人员的整理编辑,成为我们二轮区志所需用的该驻区单位的资料,并最后返还给原单位审定核实。采用这种方法,我们收集到天水市供电公司、天水市移动公司为二轮《秦州区志》提供的资料各1万多字。

其次,对于资料拥有较少的驻区单位,如邮政、电信、银行、保险、证券等驻区单位,我们采用了召开驻区单位分管领导、办公室负责人和驻区单位修志人员座谈会的方式收集我们所需的资料。在座谈会上,秦州区地志办的领导和二轮《秦州区志》的总纂就这些单位应提供的资料提出具体要求,并把所需资料采用提纲的方式发给这些驻区单位,让他们根据提纲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

资料,并最后经区志办再次编辑修改,驻区单位审定核实后上报。采用这种方法,我们收集到天水市人寿保险公司、天水市农业银行、秦州区信用合作银行等几家驻区单位为二轮《秦州区志》提供的资料各5千多字。

二、区志办和地方政府联合,争取驻区单位上级主管部门领导的有力支持和其它各部门的积极配合收集资料

地方志是官书,“官书官修、官职官责”。在第二轮修志资料收集过程中,修志机构要坚定不移的坚持依靠政府,面向社会这一原则,积极争取政府切实负起责任来,充分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修志机构才能理直气壮地要求本地区、同级单位、部门予以支持,组织协调各部门提供资料。只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常常会大大降低资料收集工作的难度,使工作事半功倍。就各项工作来讲,都说领导重视是关键,我们认为,争取领导是关键的关键。对于我们联合街道办事处、社区工作人员通过上门查阅、座谈等方式还不能收集来资料的驻区单位,我们只能采用和地方政府联合,争取驻区单位上级主管部门领导的有力支持和其它各部门的积极配合来收集资料。我们主动多次向区委、区政府分管领导汇报,并得到了领导的大力支持。分管领导主动联系驻区单位上级主管部门领导,通过联合先后制定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文件,对《秦州区志》资料收集工作进行统一调度、安排部署,对提供资料的驻区单位提出了明确要求,并协调相关部门积极配合驻区单位完成资料上报工作。在政府分管领导、驻区单位上级主管部门领导的有力支持和其它各部门的积极配合下,我们收集到了天水市银监局、天水市人行、天水市工行、天水市邮政局等驻区单位的资料。

(作者单位:秦州区地方志办公室)

金川区志目录

概述

大事记

地理

第一篇 政区人口

第一章 地域

第一节 位置

第二节 区域

第二章 建置 区划

第一节 建置沿革

第二节 行政区划

第三节 乡镇街道

第三章 地名

第一节 自然地名

第二节 聚落地名

第三节 历史地名

第四节 城区地名

第四章 人口状况

第一节 人口来源

第二节 人口变动

第三节 人口分布

第四节 人口发展规划

第五章 人口结构

第一节 自然结构

第二节 社会结构

第二篇 资源环境

第一章 矿产资源

第一节 金川镍矿的发现

第二节 金川镍矿勘探

第三节 矿产资源普查与分布

第二章 土地资源

第一节 土地利用状况

第二节 土地资源保护

第三章 水资源

第一节 水资源状况

第二节 水资源开发利用

第四章 生物资源

第一节 动物资源

第二节 植物资源

第五章 自然环境

第一节 地质

第二节 地貌

第三节 气候

第四节 土壤

第五节 植被

第六章 自然灾害

第一节 水灾

第二节 旱灾

第三节 风灾

第四节 霜雹灾

第五节 病虫害

第六节 地震

第七章 环境保护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环境状况

第三节 环境监测与管理

第四节 污染治理

第五节 生态环境保护

第六节 环保宣传教育

第三篇 城乡建设**第一章 城乡规划**

第一节 城市规划

第二节 村镇规划

第二章 城市建设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市政建设

第三节 城市绿化

第四节 房产建设和管理

第三章 村镇建设

第一节 旧民宅

第二节 集镇居民点建设

第四章 城乡一体化建设

第一节 一体化规划

第二节 一体化建设与发展

第五章 城市管理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社区管理

第三节 环境卫生管理

第四节 城管监察

第六章 “五城”联创

第一节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第二节 创建国家卫生城市

第三节 创建全国残疾人工作示范城市

第四节 创建省级园林城市

第五节 创建全国双拥模范城

第七章 建筑

第一节 建筑设计

第二节 施工队伍

第三节 建筑管理

第四篇 交通 邮电**第一章 交通运输**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古道

第三节 公路

第四节 铁路

第五节 航空

第二章 邮政 通讯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邮政

第三节 通讯

第四节 无线电管理

综合经济**第一篇 经济管理****第一章 国民经济发展**

第一节 主要经济指标

第二节 经济结构构成

第三节 经济体制改革

第四节 经济开发

第二章 经济计划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计划编制

第三节 计划执行

第三章 统计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统计调查

第三节 服务与监督

第四章 审计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国家审计

第三节 内部审计

第四节 社会审计

第五章 物价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物价变化

第三节 物价监督检查

第六章 工商行政管理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集市贸易与市场管理

第三节 登记注册管理

第四节 经济合同管理

第五节 商标广告管理

第六节 维护消费者权益

第七章 质量技术监督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计量监管

- 第三节 质量监管
- 第四节 标准化管理
- 第五节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
- 第六节 组织机构代码管理
- 第八章 食品药品监督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食品监督
 - 第三节 药品监督
- 第九章 国土资源管理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
 - 第三节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 第四节 地籍管理
 - 第五节 土地监察
- 第十章 安全生产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安全检查
 - 第三节 安全培训

第二篇 农林水牧

- 第一章 农业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体制变革
 - 第三节 农作物种植
 - 第四节 产业结构调整
 - 第五节 农业技术
 - 第六节 农业综合开发
 - 第七节 农场 园艺
- 第二章 林业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林业资源
 - 第三节 植树造林
 - 第四节 林场苗圃
 - 第五节 林木管护
 - 第六节 风沙治理
- 第三章 水利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水利工程建设
 - 第三节 引疏济金工程

- 第四节 人畜饮水工程
- 第五节 水务管理
- 第六节 水土保持
- 第七节 抗旱防汛
- 第四章 畜牧业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畜禽养殖及改良
 - 第三节 特种养殖
 - 第四节 畜禽疫病防治
 - 第五节 草原建设及管理
- 第五章 农业机械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生产工具
 - 第三节 农机经营与推广
 - 第四节 农机管理与监理

第三篇 工业

- 第一章 综述
- 第二章 有色冶金工业
 - 第一节 采矿
 - 第二节 选矿
 - 第三节 冶炼
 - 第四节 有色金属深加工
- 第三章 电力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发电
 - 第三节 电网建设
 - 第四节 供电用电
- 第四章 煤炭 石油 膨润土采掘
 - 第一节 煤炭
 - 第二节 石油
 - 第三节 膨润土
- 第五章 加工业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农副产品加工
 - 第三节 食品加工
 - 第四节 金属加工
 - 第五节 机械加工
 - 第六节 机电加工

第七节 造纸印刷

第八节 木器具加工

第九节 医药品制造

第十节 纺织品加工

第十一节 服饰皮革加工

第十二节 工艺品加工

第十三节 塑料制品加工

第六章 建材 化工

第一节 建筑材料

第二节 化工材料

第四篇 商贸流通

第一章 商业

第一节 国营商业

第二节 供销合作商业

第三节 民营商业

第四节 服务业

第五节 市场建设与管理

第二章 粮油

第一节 粮油管理

第二节 粮油购销

第三节 粮油供应

第四节 粮油票证管理

第五节 粮油储运

第三章 石油产品经营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产品经营

第三节 安全管理

第四章 烟草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烟草购销

第三节 市场管理

第五章 盐业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经营管理

第三节 盐业营销

第六章 对外贸易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外贸经营

第五篇 财政 税务

第一章 财政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财政体制

第三节 财政收支

第四节 财政管理

第五节 财政监督检查

第二章 税务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税制改革

第三节 赋税征收

第四节 税务监管

第六篇 金融业

第一章 银行业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监管

第三节 储蓄

第四节 信贷

第五节 货币

第二章 合作经营业

第一节 农村信用合作社

第二节 城市信用合作社

第三章 保险业

第一节 发展概况

第二节 主要经营机构

第四章 证券业

第一节 发展概况

第二节 主要经营机构

民主政治**第一篇 党派群团**

第一章 中国共产党金昌市金川区委员会

第一节 机构

第二节 党员代表大会

第三节 决策方式

第四节 重大决策

- 第五节 综合协调
- 第六节 纪检监察
- 第七节 组织建设
- 第八节 宣传教育
- 第九节 统战工作
- 第十节 政法工作
- 第十一节 政策研究
- 第十二节 精神文明建设
- 第十三节 档案与史志工作
- 第二章 民主党派 工商联
 - 第一节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金昌市金川区支部
 - 第二节 中国民主促进会金昌市金川区支部
 - 第三节 中国民主建国会金昌市金川区支部
 - 第四节 工商业联合会
- 第三章 群众团体
 - 第一节 工会
 - 第二节 共青团 少先队
 - 第三节 妇女联合会
 - 第四节 残疾人联合会
- 第二篇 政权政务**
- 第一章 金昌市金川区人民代表大会
 - 第一节 代表选举
 - 第二节 历届区人民代表大会
 - 第三节 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 第四节 履职方式
 - 第五节 履行职责
 - 第六节 乡镇人民代表大会
- 第二章 金昌市金川区人民政府
 - 第一节 机构设置
 - 第二节 施政方式
 - 第三节 施政纪略
 - 第四节 综合协调
 - 第五节 法制建设
 - 第六节 信访工作
 - 第七节 机关事务
- 第三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金昌市金川区委员会

- 第一节 政协金川区委员会的产生
- 第二节 政协金川区委员会会议
- 第三节 政协金川区常务委员会
- 第四节 参政方式
- 第五节 履行职能

第三篇 司法 军事

- 第一章 公安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政治保卫
 - 第三节 治安管理
 - 第四节 户政管理
 - 第五节 刑事侦查
 - 第六节 交通管理
 - 第七节 消防管理
 - 第八节 监所管理
- 第二章 检察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刑事检察
 - 第三节 经济检察
 - 第四节 法纪检察
 - 第五节 监所检察
 - 第六节 民事行政检察
 - 第七节 控告申诉检察
 - 第八节 渎职侵权检察
 - 第九节 反贪污贿赂
- 第三章 审判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刑事审判
 - 第三节 民商事审判
 - 第四节 行政审判
 - 第五节 执行工作
 - 第六节 审判监督
 - 第七节 陪审制度
- 第四章 司法行政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法制宣传
 - 第三节 人民调解
 - 第四节 法律服务

- 第五节 安置帮教
- 第六节 司法鉴定
- 第五章 军事
 - 第一节 地方武装及机构
 - 第二节 兵役
 - 第三节 民兵
 - 第四节 驻军
 - 第五节 人民防空

社会事业

第一篇 教育 卫生

- 第一章 教育
 - 第一节 历史沿革
 - 第二节 机构
 - 第三节 幼儿教育
 - 第四节 小学教育
 - 第五节 普通中学教育
 - 第六节 中等师范和职业技术教育
 - 第七节 特殊教育
 - 第八节 成人教育
 - 第九节 教学研究
 - 第十节 教师队伍
 - 第十一节 学校建设
 - 第十二节 教育经费
- 第二章 卫生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医政管理
 - 第三节 药政管理
 - 第四节 卫生防疫
 - 第五节 医疗
 - 第六节 妇幼保健
 - 第七节 爱国卫生
 - 第八节 卫生监测

第二篇 文化 科技 体育

- 第一章 文化艺术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文化设施建设
 - 第三节 群众文化

- 第四节 文艺创作
- 第五节 新闻传媒
- 第六节 文化市场
- 第二章 科学技术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科技队伍
 - 第三节 科技管理
 - 第四节 科技研发及推广
 - 第五节 科学技术普及
- 第三章 体育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场地设施
 - 第三节 学校体育
 - 第四节 群众体育
 - 第五节 竞技体育

第三篇 文物 名胜

- 第一章 遗迹
 - 第一节 古遗址
 - 第二节 古墓葬
 - 第三节 古建筑
 - 第四节 现代建筑
- 第二章 出土文物
 - 第一节 石玉器
 - 第二节 骨器
 - 第三节 陶瓷器
 - 第四节 金属器
 - 第五节 其他
- 第三章 名胜景观
 - 第一节 名胜
 - 第二节 景观

社会生活

第一篇 社会管理

- 第一章 民政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基层政权建设
 - 第三节 社会事务
 - 第四节 老龄工作

- 第五节 优拥安置
- 第六节 社会福利
- 第七节 社会救助
- 第八节 勘界
- 第二章 人事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公务员管理
 - 第三节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
 - 第四节 离退休干部管理
 - 第五节 工资福利
 - 第六节 机构编制管理
 - 第七节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
 - 第八节 人才交流
- 第三章 劳动和社会保障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劳动与就业
 - 第三节 职工待遇
 - 第四节 劳动保护
 - 第五节 劳务输转
 - 第六节 劳动监察
 - 第七节 社会保险
- 第四章 计划生育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计生管理
 - 第三节 计生宣传与服务
- 第五章 民族 宗教
 - 第一节 机构
 - 第二节 民族
 - 第三节 宗教

第二篇 民俗风情

- 第一章 习俗
 - 第一节 生活习俗
 - 第二节 礼仪习俗
 - 第三节 岁时习俗
 - 第四节 禁忌习俗
 - 第五节 民间游戏
 - 第六节 民间传说
- 第二章 方言

- 第一节 金川方言概说
- 第二节 语音
- 第三节 语法
- 第四节 词汇
- 第五节 谚语
- 第六节 歇后语
- 第三章 人民生活
 - 第一节 婚姻家庭
 - 第二节 物质生活
 - 第三节 文化生活
 - 第四节 道德新风

荣誉 人物

- 第一章 荣誉
 - 第一节 集体荣誉
 - 第二节 个人荣誉
- 第二章 人物
 - 第一节 人物传略
 - 第二节 人物简介
 - 第三节 人物表录

附录

- 一、中央领导视察金川纪实
- 二、重要文件辑存
- 三、勘界资料辑存
- 四、碑文、艺文选辑
- 五、金川人民志愿护送班禅进藏史实

后记

- 一、首轮《金川区志》承编单位及供稿人员一览表
- 二、修志始末

张维与《陇右金石录》

《陇右金石录》校点序例

赵逵夫

[内容摘要] 张维,字鸿汀,是甘肃在民国时期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他从辛亥革命前后至上世纪二十年代末,抱着革新政治的理想积极从事各项活动。在三十年代几次挫折之后,转向学术研究,在陇右史地与文献研究方面留下大量论著。四十年代编成《陇右金石录》十卷,后又陆续编成《校补》与《补》,删除误收,调整朝代误置篇目,增收新搜集到篇目。所录文字时有与原文不合者,多为将原文俗字、罕见字改为正体字、通用字,避讳也改为正字,并改正了原碑文中一些错用之字词,因民间作碑者有的水平不高,故时有错讹。鸿汀先生的做法为地方文献的整理提供了一条有益的经验。

[关键词] 张维;陇右金石录;甘肃;金石;碑刻

张维,又名国钧,字维之,号鸿汀,曾署名南野,生于1890年1月16日(光绪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卒于1950年4月。甘肃临洮人,是民国时期甘肃著名学者,也是从清代末年至民国前期体现着新思想、新的政治追求的甘肃著名社会活动家。从1909年以后的十余年中,在甘肃他可谓时代的弄潮儿。这段时间他无论朝考还是国会众议员注册、发表政论还是为他人作序,都署名“国钧”。“钧”本为制陶器所用的转轮。《汉书·武帝纪二》:“天下之从上,犹泥之在钧,唯陶者之所为。”故后以喻国政。由这取名上即可看出他热心参与政治变革的志向。1919年返回甘肃以后改名为“维”,其意思可以从多方面理解,但实际上取义于“天有四维”,仍然是取维系国政民生之意。只是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他感到在政治上难有建树,才潜心甘肃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地方历史的研究,二十多年中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在方志与金石领域的贡献尤为突出。

鸿汀先生为清宣统己酉科拔贡,授职北京学部书记官。在京读康有为、梁启超有关变法的论著,深受其影响。两年后武昌起义,他参加了同盟

会。由内蒙潜归临洮,联合同盟会会员及开明人士,倡议组织狄道州议会,响应共和。1913年兰州国民党甘肃支部创办《甘肃民报》,后改为《大河日报》,鸿汀先生曾到兰州任该报主编,他又参与民间《金城周报》的创办。这些报纸因宣传民主思想,议论时政,皆被军阀政府所查封。甘肃因地处西北,比较封闭,守旧思想占上风,军阀统治严酷。1913年鸿汀先生以国民党员身份被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又到北京。不久,袁世凯搞复辟,解散了国会,他不愿在袁世凯的洪宪朝廷做官,便闲居京城读书,后因资费用尽而回家,以教书为生。1916年袁世凯死,国会恢复,他复赴北京任议员。翌年张勋搞复辟,又解散国会,他南下上海、浙江等地,并在上海拜会孙中山先生。同年广州军政府成立,护法国会众议院甘肃议员名录中列有先生之名。张勋复辟闹剧结束之后,他赴京复职。

1919年国会又被解散,鸿汀先生回甘肃,任督军省长公署秘书长。1922年被选为第三届甘肃省议会议长,1923年,任甘肃政务厅长。1925年至1927年任甘凉道尹,又曾任财政厅长。期间,制定财政会议章程及制度。在这当中因为触及一些人的利益,因在一些问题上与省当局意见不合,遂辞职。于是入川游历,广泛涉猎图书,交结名士。

1928年鸿汀先生回甘肃,任省政府顾问兼省图书馆馆长、甘肃通志局协纂,同时受聘兰州中山大学史学教授。鸿汀先生在决定疏远政界后走上地方史志的编纂和教育工作的,也同家庭影响有关。其父张明远,字致堂,是光绪丁酉举人,四川候铨知县,选任盐场大使,供职成都,有政声。辛亥革命前弃职回乡,研究地方史志,著有《情节堂论学集》、《鹤云山房诗文集》、《华阳忆旧集》、《燕晋行纪》、《熙州故事》等。所以鸿汀先生从小对地方文献耳濡目染。

鸿汀先生在图书馆馆长任期间,大量购置图书,请省政府通令各县征访地方史志,送馆收藏。

1930年任建设厅厅长,1931年历任省政府委员。在任期间,他力主公开省财务,整理币制,建议成立银行,建贫民教养院、贫民借本处,支持整修公路、桥梁,设立公园,力主兴修水利,开发林业和矿产资源。1939年由邵力子、张继、于右仁介绍,重新参加中国国民党,直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39年以后,历任第一、二届甘肃省参议会会议长,前后近十年。1946年后,两次被选为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兼任甘肃省党部主任委员。第二次被聘为兰州大学教授、并被聘为西北师范学院特约教授、甘宁青文官高等考试典试委员。1948年辞职家居,曾致函邵力子、张治中,拥护和平谈判主张。1949年初,拒绝国民党政府接其南迁。8月兰州解放后奉命至军营报到,王震将军嘱其参加学习,改造思想。1950年因脑溢血逝世于兰州寓所。先生任职于甘肃省通志馆副馆长凡七年,任职于省图书馆十馀年,为其从事陇右文史的研究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甘肃通志稿》上起远古,下至民国十七年(1928),包括甘肃、宁夏、青海分省以前的历史,全书450万言。鸿汀先生除参加《甘肃通志稿》的编纂之外,也留下大量著作。已出版的有:《甘肃人物志》(主编,1926年陇右乐善书局交和通印刷馆印刷,1988年由赵莹、牛得权校点作为西北师大学报增刊出版)、《陇右方志录》(2册,1933年北平大北印书局,1934年、1941年兰州共三次印成)、《甘肃地理沿革图表》(一卷,1934年北平大北印刷局铅印)、《甘肃省县总分图》(一卷,同前)、《兰州古今注》(1943年、同上)、《陇右金石录》(并目录、校补共12卷,甘肃省地方文献征集会1944年印)、《陇右金石录补》(2卷,1948年同上)、《元魏诸镇考》(1948年同上)、《仇池国志》(1949年兰州甘肃省银行印刷)等,另有论陇右经学之传授的文章30篇,《金城周报》发表文章17篇,及生前编成未刊印之书如《陇右著作录》、《陇右文存》、《甘肃丛书目录》、《陇右诗钞》、《陇右史事摭录》(各正史、地志、笔记、别集中陇右史料摘录)等多种。兰州大学历史学王希隆教授集先生《南野诗稿》、《砥庐论文辑存》及有关校读记、碑文、祭文、行纪并《元魏诸镇考》、《仇池图志》、《兰州古今注》为一册,名《还读我书楼文存》,由生活·新知·三联书店于

2010年5月出版。

陇右(传统指甘肃与青海、宁夏之一部分)因地域偏僻,金石文献被学者收辑而载之书籍及被史家引用者甚少。如鸿汀先生《陇右金石录序》所言:“秦中为金石渊藪,陇右河西,密迩关辅,古金贞石,随地而有。顾以僻在边隅,未有专录。古今金石书所载,率多简略。”“清《甘肃新通志》已较以往有关书籍载录很多”。据其所统计,宋欧阳修《集古录》只载一碑,郑樵《通志·金石略》四碑,王象之《舆地碑记目》十五碑,嘉嘉《陕西通志》二十碑;清王昶《金石萃编》四碑,冯云鹏《金石缩》、毕沅《关中金石记》、孙星衍、邢澍合编《寰宇访碑录》,近人罗振玉《西陲石刻录》、赵之谦、沈树镛《补寰宇访碑录》五卷、罗振玉《再续寰宇访碑录》二卷等,“少者五之,多者亦不过十馀”,(又清杨守敬有《续补寰宇访碑录》十卷,时为稿本,鸿汀先生应未见到)。“惟《金石萃编补》合金石都四十五事,《缘都庐日记》五十馀事,而所录者皆限于元以前”。清光绪三十四年安维峻任总纂所成《甘肃新通志》于卷九一、九二共收陇右石刻160馀块,如先生所说,“视诸书为最多”。

由杨恩为总纂、张维为副总纂的《甘肃通志稿》收录陇右石刻约270多块。张鸿汀先生在此基础上不断搜罗成《陇右金石录》一书。1943年先由甘肃省文献征集委员会印初成之《陇右金石录》(目录)一卷,1944年印出正文。《陇右金石录》收录先秦至明代在陇右发现铜器铭文、铜镜、碑刻、摩崖文字,共1303块,卷一为上古至隋,卷二为唐五代,卷三为宋(上),卷四为宋(下)、西夏,卷五为金元,卷六至卷十为明。书前有《自序》述编纂之缘起与准则,后有《校补》。书稿成于1939年,次年2月20日日军飞机空袭兰州,使家中的金石拓片尚未刊即化为灰烬。该书于所录金石文字都加按语注明存佚,考订相关史实。《校补》对1943年先印出之目录已收而当删落者,清碑而误为明碑应删去者、宋造像误入明目者等,加以说明。

《陇右金石录补》共载碑刻238块,其中个别为订补前书误载者。

甘肃处于丝绸之路之上,甘、青、宁都是民族交汇之处,而且甘肃、青海都是古昆仑山所在地,是华夏文化发祥之地。但汉唐以后,西北之地因为汉

唐以后偏处一隅，很多史实在正史及各种史书中缺载或记载不详，后代史学家对此无能为力。张鸿汀先生此两书为研究甘肃、青海、宁夏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历史、文化、教育、宗教等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原始材料。因此，《陇右金石录》的整理出版，对研究西北历史文化有很大意义。

关于校点体例，有以下几点特予说明：

一、本书是校点张鸿汀先生《陇右金石录》。故只以《陇右金石录》的不同印本补足印刷不清之字，不改换底本。因为此前有关金石著作及其他相关著作时有引录或列为参校之书，如果大变，会使一些人的引录、参校文字失据。

二、鸿汀先生在过录之中把碑文中个别俗字、罕见字改为正字、正体、通用字，避讳字也改为本字。从而消除了理解中的障碍。如礼县宋初《周故少师王公神道碑》“恒农杨氏，公之前夫人也。”“恒农”即弘农，汉灵帝刘宏避讳改为“恒农”，西晋时郡名、县名均又改为“弘农”。作“恒农”者用古也，而知之者少，故《陇右金石录》改“恒”为“宏”。这些，我们都从鸿汀先生刊本，不据原碑拓片改回。

三、《陇右金石录》对所收篇目文字经过认真研究，改正了其中一些错字。如礼县宋初《周故少师王公神道碑》“唐祚衰歇，广名播越”，一般皆录作“广明播越”，于意不通，作“名”者是也。这类情形较多。西和县唐乾元三年《汉源县令厅壁记》，清吴鹏翔《武阶备志》“始以上禄改名‘汉源’，复禹旧绩”，《陇右金石录》中下句作“复禹旧蹟”；显然《武阶备志》误，而《陇右金石录》改之者是。

再如民国《重修西和县志》中宋代《广福塔石刻》第三级塔记：“常于无相之中显莫穷志景界于此”，“景界”《陇右金石录》改作“境界”。佛经中均作“境界”而无“景界”之说，撰文者耳熟其说而不知其本，下笔遂误，则《陇右金石录》改为“境”是也。同一塔记中《重修西和县志》“六亲弃有露之因，四类受无生之记”，《陇右金石录》中“记”作“託”，佛教无“无生之记”一说，“无生之托”即“无生之生”，显然是《重修西和县志》误而《陇右金石录》是。

同题第四级塔记中，《重修西和县志》“愿收布施福德，上祝皇帝万岁”，《陇右金石录》“收”作“将”。《重修西和县志》显然是因为“将”字草书似

“收”而误识。第五级塔记“发愿主修塔第五级”，《陇右金石录》“主”作“誓”，盖“誓”字残损，余下部似“主”字，被误读“主”，而《陇右金石录》据文意与行文习惯探其本字作“誓”。

第六级塔记开头，“夫世教者，乃宫门澄谈，化同幽隐”。“世教”很可能是撰此村夫子浅学无知，尝闻“释教”之说而不知如何写，想当然而误书；“宫”则显然是“空”字行书误释所致。《陇右金石录》作“夫释教者，乃空门澄谈，化同幽隐”，关于第一个误字的修改虽然改变了原文，但使意思明了，是纠正了原文的错误，既合于刻石施主与撰文者的愿望，也免去后之释读者搜索枯肠，寻求解释。关于第二个字的释读，纠正了俗抄本之误，长于方志所载，也免去后之读者为此劳神。《陇右金石录》所据拓片皆各县所献，且《陇右金石录》所收《广福塔石刻》不全而《重修西和县志》所收文字全。可见虽然《重修西和县志》印出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所据材料要早一些。但识读方面个别地方有误。

四、《陇右金石录》对原文个别地方也常改动文字，或使文意顺畅，或使行文更为确切。如礼县宋初《周故少师王公神道碑》载王仁裕自陈于潞王，“潞王壮之，载以后车，俾随戎辂，教令诏告，咸出于手。”“戎辂”《陇右金石录》作“玉辂”。按之上下文，是言王侯之重才而非将帅在军中之用人，应以“玉辂”为确当。同篇“逢是偶圣，何幸会以逾涯；自卵化翼，岂生成之可报”，《陇右金石录》改“自卵化翼”作“卵化翼飞”，句意更为明显雅洁。再如礼县《盐关镇重修真武殿记》：“居纯辞之不获，言曰：……。”《陇右金石录》“言曰”作“乃言曰”，语气更顺。“神之格思，理存言像之际，而况真君乃金阙应化之身，容像之所在，宜其显灵之若是。”句子长，《陇右金石录》于句末加“也”字以结句。紧接着“中前敌人叛盟，意欲长驱而下蜀”，“中”显为衍文，《陇右金石录》删之。《重修西和县志》中《广福塔石刻》第五级塔记中“临终遗祝言于长子元礼”，《陇右金石录》作“遗言囑于长子元礼”，文意更为简洁确当。第六级塔题中“首先显化为僧，僧居此，人皆厌而恶视之。”《陇右金石录》中删第二个“僧”字。因此字实为多余，有此字，反而文意不连贯。因民间刻石，撰文者文字水平不一定高，有的地方缠绕不明，鸿汀先生移录之时顺手对不顺畅者稍加增

删调整,使其可读。如此之类,其例甚多。这些改动消除了误解和阅读中的障碍,有不影响文章的内容和感情色彩。此即陈垣先生《校勘学释例》卷六《校法四例》中所说“理校”,非不能作,只是非博学大家不能妄作而已。

所以,我们以为这应看作张鸿汀先生过录在整理甘肃地方文献方面的贡献之一。他的《陇右金石录》的文本有其独立的学术价值,不宜按原拓片或他书改回。同时张鸿汀先生当年所搜集一些拓片多已销燬不存,要按原拓片校改文本,也已不可能。

我认为上面四条为整理地方文献提供了一个有益的经验。有些地方文献本身比较粗糙,行文、用字都缺乏规范,如一切照旧收录,加上很繁琐的校记,徒增阅读障碍并浪费人的精力,整理者应在认真研究之后,消除一些明显的错误与阅读障碍。

五、本书只用《陇右金石录》各印本补足不清楚之字。因只是印本不同而底本一致,故不出校记。

六、《陇右金石录》中也有明显的错字,主要应是排印失校形成,所据抄本有误的情形也有。如礼县宋初《周故少师王公神道碑》“诗书一览。有如宿习”,《陇右金石录》下句作“如有宿习”。“有如宿习”盖言凡书只要读过一遍,即如隔日复习过一样熟习,则原文是。“桑梓故里,罇俎上列,归与之乐,適我愿今。”《陇右金石录》“归与之乐”作“归豫之乐”。原文当是用《论语·公冶长》子在陈曰“归与”之典,作“与”为是。同篇“晋祚初启,以本官归班,稍迁左司郎中,历左谏议大夫”。“晋祚初启”一句,《陇右金石录》作“晋祚初改”。碑文所载本晋初之事,据此则变为了晋亡后之事。按《旧五代史·晋高祖记》载:天福二年六月,“乙丑,翰林学士、司封员外郎、知制诰王仁裕改都官郎中”;《新五代史·王仁裕》亦云:潞王时“以都官郎中光翰林学士。晋高祖入立,罢职为郎中,历司封左司郎中、谏议大夫”。天福二年即晋代后唐之第二年,则原文应为“晋祚初启”。同篇“以大宋开宝七年三月十八日,秘书力护神枢,归葬于秦州长道县”,《陇右金石录》误作“大宋开宝四年三月十八日”。今存李昉作《王仁裕墓志铭》也作“大宋开宝七年闰十月十七日,归葬于秦州长道县汉阳里”,则作“四”无据,显

系笔误或刻印之误。同篇“耆欤少师,生禀灵气”,“禀”,《陇右金石录》误作“秉”;同篇“英魂凛凛以何归,宿草离离而永茂”,《陇右金石录》作“夙草”按“宿草”指冬天不枯之草,连岁而绿。故言“永茂”,以喻凛凛英魂,作“夙草”则无据。以上皆因种种原因偶而致误。如此之类,均尽量查找拓片或其他刻本以加订正,并处校记说明改正之理由与依据。

七、《陇右金石录》个别地方有脱文。如《周故少师王公神道碑》铭中于“惟我少师”之上脱“谁能起之”四字。如此之类,均应加修改或补充,并出校记以说明理由与依据。但书中所删,有的是碑末所列孝子、孝孙或善男善女,及集资、立盟村人名,少者十馀,多者数十。此于研究文中意义不大,为简洁和突出重点,凡此之类,不再补出。

八、原书在《校补》中已说明误收、误编者,据《校补》订正文字,对次序加以调整。并出校记加以说明。

九、《陇右金石录补》是《陇右金石录》出版之后所搜集之碑刻。在全书重印无期的情况下,为避免散佚及作到尽快向学界公布,而单独印行的。如鸿汀先生此后有机会重印全书,肯定会将《补》中各篇按年代加入原编之中,并依其看法对原书处理失当之处加以订正。因此此次校点,为了减少读者探究相关篇时间关系时的麻烦,径将《补》编各篇依其地域、年代插入原编,使成一体,而在《目录》中原属《补》编之各篇篇名之下注明“补”,以便了解。

一〇、《补》中对原编有所订正者,也径加以订正,而在有关篇下加以说明,以便于希望了解原书面貌者了解原编与《补》之本来面目。

一一、甘肃省图书馆所藏《陇右金石录》上有批校之语、校记多条。今加“补校”二字,将有关文字列于相应之处。需改正原文者,改正原文,并于校记中加以说明。

一二、鸿汀先生的哲嗣张令瑄先生在其先君之书的基础上对陇右金石又加搜求,有所补充,为避免学者查找之麻烦,使陇右金石的集录更为完备,今将其书附于本书之后。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从礼县大堡子山乐器坑出土乐器 看秦国早期的礼乐文明

魏泽民

【内容摘要】在秦国剪灭六国,统一天下战争中,因其战争的残酷性,秦国被视为虎狼之国,野蛮之邦;在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后,又因其严刑峻法,导致反秦局面的出现,所以古代一些士人常有贬秦、恶秦甚至诬秦的情绪。在他们的心目中,秦国没有礼乐教化,尤其没有发达的音乐和音乐教育。但古籍记载,尤其是近年来礼县西垂陵园乐器坑出土的编钟、编磬等精美乐器,以大量的出土文物证明了秦国早期不仅有精美的乐器,而且有发达的音乐和礼乐文明。

【关键词】秦国 礼乐文明 礼县 大堡子山 乐器坑

秦汉时期,中原士人对秦国和秦国的礼乐文化有很深的误解,不了解秦国的礼乐制度和音乐文化,也不理解缶和鞀是古代秦人的敲击乐器中的一种,甚至有人把缶和鞀这种古代秦人的敲击乐器理解成了百姓日常生活中的陶制器皿,把秦国理解成没有高雅礼乐文明的野蛮之邦,把秦人误解为没有音乐教化的野蛮之人,认为早期的秦国,其音乐无可称者。所以,《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才有赵国使臣蔺相如在秦国朝堂之上公然贬损秦国的音乐,就是曾在秦朝为官,位居客卿,后来成为三公之一的丞相李斯,也在其《谏逐客书》中说:“夫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①

箏、缶和鞀确实是秦国的一种传统乐器,犹如中原诸侯的钟、鼓和管弦,但它并不能说明秦国的音乐文化就不发达。实际上,秦国的传统乐器里面,既有打击乐器,也有管弦乐器。

“缶”在古代亦作“𩚑”,按《说文解字》:“缶,瓦

器,所以盛酒浆,秦人鼓之以节歌。”缶原本是古代的一种陶器,是古人盛水或盛酒的器皿,圆腹、有盖,肩上有环耳,盛行于春秋战国。缶有圆形的,也有方形的。这种酒器之所以能够成为乐器,是由于人们在盛大的宴会中,喝到兴致处,便一边敲打着盛满酒的酒器,一边尽情地吟唱,就这样,缶这种器皿逐渐演化成为一种乡土乐器。

箏、埙、鞀、鞀、琴、瑟、管、箫、竽、笙、篪、钟、磬等也是秦人的重要乐器。秦人的乐曲主要有《钧天大乐》、《六英》、《寿仁乐》、《昭容乐》、《礼容乐》、《韶乐》等;乐歌主要有《祠水神歌》、《翰妇歌》、《罗穀单衣歌》、《栗引》、《真仙人诗》等。《吕氏春秋》中记载的《吕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明理》等,是中国最早的音乐理论著作^②,由此又可以推断,用音乐歌舞祭祀、娱乐祖先和天地诸神的风俗,秦国早已有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搜集各国民间乐曲、乐舞,广征各地娼优伎乐,以助宴享娱乐,观民风民俗,八方乐舞、各种乐器和各国乐师齐聚秦都咸阳,秦都咸阳成了当时的文化中心。

实际上,秦国早期就有发达的礼乐文明,关于这一点,西北师大文学院前任院长、博士生导师赵逵夫教授曾有过充分而又明确的论述。赵教授认为,早期秦人不仅有精美绝伦的乐器,也有其发达的礼乐文化传统。《列子·汤问》有一段记载:“薛谭学讴于秦青,未穷(秦)青之技,自谓尽之。遂辞归,秦青弗止,饯于郊衢。抗节悲歌,响遏行云。薛谭乃谢,求反,终身不敢言归。张湛注曰:“秦青、薛谭,并秦国之善歌者。”

汉初刘向在《列仙传》中还记载了秦国有关

“凤女祠”的故事：“萧史者，秦穆公时人也，善吹箫。能致孔雀、白鹤于庭。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为妻焉。日教弄玉作风鸣。居数年，吹似风声，凤凰来止其屋，公为作风台，夫妇止其上，不下数年。一旦，皆随凤凰飞去。故秦人作风凰祠于雍，宫中时有箫声而已。”这里所谓的“雍”，是秦早期的都城之一。晋人赞之曰：“萧史妙吹，凤雀庭舞。嬴氏好合，乃飞风声。遂攀凤翼，参翥高冥。女祠寄想，遗音载清。”

《史记·秦本纪》记载：“戎王使由余观秦，穆公欲留之，乃令内史廖以女乐二八遗戎王，戎王受乐而悦之，终年不还。”秦穆公为了把西戎的贤士由余留在自己身边，就揣摩戎王的心思，给戎王送去了16个乐伎，让她们用歌舞伺候戎王，戎王深爱秦国的乐伎，以致“终年不还”，说明秦国乐伎的歌舞水平非同寻常，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秦人擅长音乐歌舞，秦国有发达的音乐文化。《三辅黄图》记述，秦咸阳宫廷“车行酒，骑行炙，千人唱，万人和”，可以想象当时秦都音乐歌舞的盛况。

秦国不但有发达的礼乐文明，而且对后世产生的影响也是深远的，可以说，秦汉以降的许多礼乐文明成果，大都是在秦国礼乐文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汉书·礼乐志》中记载了有关叔孙通主持秦遗民为汉高祖制作宗庙音乐的一些史料：“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太祝迎神于庙门，奏《嘉至》，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芡》、《肆夏》也；干豆上，奏《登歌》，独上歌，不以管弦乱入声，欲在位者遍闻之，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美神明既飨也；皇帝就酒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已成也。”^③

汉高祖所定宗庙音乐，《汉书》明言是“因秦乐人制”，说明秦国早就有专门负责宫廷音乐事务的官员，也说明秦国本来就有相对完善的礼乐制度和发达的宗庙祭祀音乐，这是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西汉建都长安后，叔孙通因秦之制，改制雅乐，其中知名乐曲就有《嘉至》、《永至》、《登歌》、《休成》、《永安》等。到汉武帝时，西汉国力达到强盛，与西域通好，又将西域各国和匈奴的乐器如胡笳、

鞞婆（琵琶）、箜篌、箏、箜篌等传入长安，异域音乐歌舞引入中原，中原音乐与外来音乐有机融合，产生了《摩诃兜勒》、《新生十八曲》、《明君》等著名乐曲。朝廷还设立了专门的音乐机关——乐府，一方面负责“采诗”，即收集民歌，一方面负责将文人歌功颂德的诗赋制成歌曲供宫廷乐人演唱，并任命李延年为协律都尉，主管乐府，“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

西汉乐府音乐主要分相和歌与鼓吹两大类。相和歌是有丝、竹乐器伴奏的艺术歌曲，分相和曲、吟叹曲、四弦曲、楚调曲等类别，知名乐曲有《东门行》、《陌上桑》等。鼓吹为军旅之乐，分黄门鼓吹、横吹、骑吹、箫铙歌等类别，知名乐曲有《昂马》、《南城》、《巫山》、《朱鹭》、《思悲翁》、《芳树》、《有所思》、《艾如张》、《上之回》等。

西汉时期也创作了许多歌曲，著名的有《阳阿》、《绿水》、《白雪》、《上灵曲》、《赤凤凰来》、《骊驹》、《琴歌》、《十二操》、《归风》、《单鸿寡鳧》、《双凤离鸾》、《思士操》、《采芝操》、《采薇操》等。《汉书·艺术志》记载的西汉“歌诗”就有28家324篇之多。据说汉武帝擅作“歌诗”，《太一之歌》、《天马之歌》、《定鼎歌》、《芝房之歌》、《白麟之歌》、《朱雁之歌》、《瓠子之歌》等均出自其手。

西汉长安除宫廷音乐相当繁盛外，民间音乐也很活跃，许多达官权贵、豪强巨贾蓄养歌伎，用以自娱和娱人。《风俗通》记载：“时亲师宾婚、嘉会，皆作《魁灑》，酒酣之后，续以《挽歌》。”《史记·乐书》载，汉武帝在甘泉宫祭太一神时，“童男童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阳》，夏歌《朱明》，秋歌《西皞》，冬歌《玄冥》，每次都是通宵达旦，尽兴方歇。

一言以蔽之，汉代礼乐文明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除了通西域和开发西南夷，吸收异域文化元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根植于秦国秦朝礼乐制度和礼乐文明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秦国秦朝为继起的汉帝国的全面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如同后来的隋朝为大唐帝国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样，没有早期秦国秦朝千年的礼乐制度和礼乐文明的积淀，就不可能出现汉代那么发达的社会繁荣和礼乐文明^④。

如果说典籍记载只能从一个侧面说明秦人很早就有很发达的礼乐文明和音乐教化传统的话,那么,出土的珍贵文物则能更加直观地证明秦国发达的音乐文化。

近十几年来,在陕西关中和甘肃东南部相继发现了早期秦国的音乐物质遗存,如宝鸡杨家沟发现的春秋前期秦公编钟5件、编铎3件,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春秋后期秦国的若干件编磬、还有等等,都证明着秦国早期就有发达的礼乐文明。

曾经主持发掘过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葬群的考古学家何双全说:“甘肃陇南市的礼县、西和县北部,天水市秦城、清水、甘谷、秦安等地就是秦人早期活动的地域,这里也是秦人崛起之地”。他说:“大堡子山在礼县永兴乡北岸的黄土平丘上,20世纪90年代,在礼县县城东10公里的大堡山上,挖掘出四座规模宏大的秦公墓,专家初步认定是秦仲、秦庄公陵墓。”近20年的考古发掘已经证明,以礼县大堡子山为中心的西汉水上游地区,就是秦人早期的发祥地和建国之地。

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的秦简中,就有关于《十二律》的记载,但更为重要的是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园及其周边的圆顶山等地的考古发掘成果,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早期的秦国就有高度发达的礼乐制度和乐教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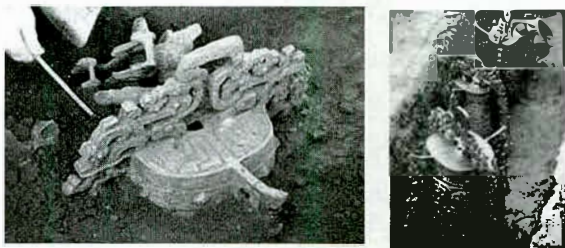
2005年,在甘肃陇南礼县大堡子山秦西垂陵园考古钻探中,在专家认为不可能出现文物的地方,竟然出土了铜铎、甬编钟和编石磬。



甘肃陇南礼县大堡子山地区秦西垂陵园秦子乐器坑发掘现场。编钟和石磬在同一坑内,铎钟和

甬钟共11件。石磬两套,每套各9件。图为礼县大堡子山乐器坑即将出土的部分编磬。

2006年,在发掘礼县圆顶山贵族墓祭祀坑的过程中,除了发现4座人祭坑、6个灰坑外,还发掘了1座秦子乐器坑,出土了早期秦人精美绝伦的青铜编钟和石磬等乐器,其中一组九件套的秦编钟,造型独特,精美绝伦,保存完好无损,出土后仍然可以敲击出清脆悦耳的美妙音响,且音色优美,是国内迄今发现的唯一的一套九件的编钟,虽然礼县编钟的个体比湖北随县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小了一点,却是目前中国出土的唯一一件九件套的秦编钟,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现藏于礼县秦文化博物馆。礼县圆顶山出土的铎钟,最大的高约70公分,口径约45公分,钟体上有铭文。乐器坑内南侧为铎钟与钟架,北侧为石磬与磬架。在钟架的一侧还发现了两组九件套的石磬,石磬的上方是磬架。编钟、编磬和编铎的出土,用实物证实了古代秦国曾有过发达的礼乐文明和很高的音乐演奏水平。



图为即将出土的铜编钟。

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在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还没有发现之前,人们认为《诗经·秦风》产生的地域在现在的陕西。随着秦西垂陵园的发掘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许多历史和学术之谜得以破解,所以赵逵夫先生说:“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秦公墓地的发现,秦人早期活动地域逐渐清晰起来,《诗经·秦风》中一些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现在,至少可以这样说,《诗经·秦风》中赞美秦人祖先的诗歌基本上是在甘肃境内产生的。《诗经·秦风》中《车邻》、《驷驖》、《小戎》、《蒹葭》这四篇是在甘肃南部西汉水上游一带诞生的,它们是秦人崛起西垂的见证。”这些诗歌都是韵文,可以配乐歌唱,这也从一个证明,秦国早期曾经拥有发达的礼

乐文明和诗教传统。

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保护(扩充)项目、被誉为中国古代乞巧文化“活化石”的西和礼县民间乞巧活动,据研究,就是古代秦人祭祀其先祖女修的原始宗教或者祭祀仪式在现代社会中的孑遗,是秦民族的集体文化记忆,较多地保留了古朴神秘的秦文化元素。在七天八夜的乞巧节期间,女孩们要举行迎巧、坐巧、拜巧、祭巧、花瓣卜巧、跳麻姐姐、送巧等一系列的仪式,祈求巧娘娘赐给她们巧慧。姑娘们所崇拜和祭祀的巧娘娘,实际上就是秦人先祖女修。在整个乞巧过程中,姑娘们的态度之虔诚、歌舞之繁盛、曲词音乐之优美,都从一个侧面表现着秦人对先祖女修的虔诚与崇拜。这些乞巧歌词、音乐、舞蹈,以及与之相配套的乞巧程式,也能从一定程度、某些侧面比较曲折隐晦地反映古代秦人的文化心态和秦国音乐歌舞的发达程度^④。

无论是古籍记载,还是考古成果,不管是民间传说,还是历经千年而不衰的乞巧民俗文化,都从不同侧面见证了秦国不仅有深厚丰富的礼乐文化传统,还有很发达的音乐文化和很高的音乐水平。秦人本来就擅长音乐歌舞,只是因为秦人更务实,不喜欢张扬,其传统是反对过分排场的音乐歌舞“侈乐”的,正如《吕氏春秋·侈乐》所云:“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以此骇心气、动耳目,摇荡生则可矣,以此为乐则不乐。故乐愈侈而民愈乱,主愈卑,则亦失乐之情矣。”这就给中原土人造成了错觉,认为偏居西陲的秦国没有发达的礼乐文明,甚至想当然地认为发达的音乐文化只应出现在中原诸国。

其实,中原土之所以要贬秦、恶秦甚至诬秦,与他们对秦民族的发展历史的看法有关。秦人西进以来,在广袤的西部与西戎杂居相处,奋起建国,然后秦军东进,雄霸关中,并采用连横之术以破合纵,以其正确的策略、发达的科技、先进的文化和威武之师,经过十几代人的努力,彻底打败了东方合纵诸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在这个过程中,秦人曾在西陲活动了近千年。在东方各国土人的眼中,秦国就是一个既野蛮又贪婪的虎狼之国,秦军就是毫无人性的杀

人机器,那里还谈得上礼乐文明!

在秦赵之间的那场旷日持久的外交和军事斗争中,国小力单的赵国“代表团”,面对国力强盛的东道主秦国,蔺相如还是凭着“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精神,奋不顾身,充分发挥了他杰出的外交才能,按照秦人的逻辑,采用了仿拟反射的逻辑修辞方法,针锋相对,据理力争,不屈不挠,甚至有些歇斯底里,豁出性命来应对秦国的无理挑战,最终使秦国君臣败下阵来,无言以对,取得了那场外交斗争的伟大胜利。从《史记》的文本考查,蔺相如用的是外交辞令,用的是逻辑技巧,并不是对真实历史事实的陈述。而司马迁又以其力透纸背的如椽巨笔,爱憎分明的历史态度、坚守正义的鲜明立场,绘声绘色地写下了那场秦赵君王之间的外交角逐,着力凸显了蔺相如不辱使命的外交才能和爱国热忱。他把秦国音乐说得那么糟糕,那是“别有用心”的,是政治和外交斗争的需要使然。但从尊重历史事实的角度看,那是一种不客观不公正并且带有情绪性的观点,是一种外交辞令,是对秦国上千年历史的不尊重,而并非历史的真实!

而李斯之所以贬秦诬秦,是因为他本人也在被驱逐的“客卿”之列。为了说明“客卿”对秦国发展曾经做出的巨大贡献。如果没有“外国专家”的参与,秦国秦朝就不可能出现国富兵强、一统天下的局面。为了维护“外国专家”在秦国的既得利益,为了挽救包括自己在内的“外国专家”不被秦国驱逐出境,为了“自保”,李斯才用夸张的笔法特意渲染。

【参考文献】

①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二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0月第1版第2页。

②参阅李纯一《先秦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5年7月版,2010年3月13日数字化处理。

③杜鹃.汉代宗庙仪式乐[J].淮南:《淮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01期

④参阅赵逵夫《汉水与西、礼两县的乞巧风俗》[J],兰州: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第2期

武都万象洞洞壁题记探微

董云飞

[内容摘要] 万象洞洞壁题记作为中国古代题壁文化的一种,有着独特的题记风格。自北周建德三年以来,历代名人都留有墨迹,题记内容形式多样,其中较多的是记事类题记和诗词类题记。这些题壁群共同勾勒了万象洞内的人文历史线索,在历史研究、旅游开发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价值。

[关键词] 万象洞;洞壁题记;研究价值;

关于万象洞洞壁题记的研究,学术界成果很少,提及万象洞洞壁题记的作品屈指可数,清代叶恩沛修、吕震南纂《阶州直隶州续志》(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1987年10月),对万象洞洞壁中个别题记有相关的记载和简单的分析,再有甘肃省武都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的《武都县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对于万象洞的形成、洞内景观和洞壁题记也有相关涉及。对于万象洞洞壁题记研究的文章只有一两篇,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蔡副全先生的《论题壁书》(《中国书法》,2010(5)),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探讨了万象洞洞壁题记的书法艺术价值。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所做的“陇南金石题壁文化研究”专题,对于陇南地区题壁文化作了详细的论述,其中也涉及到万象洞题记的诸多内容。因此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

一、万象洞及洞内题记概况

万象洞,又名仙人洞,是一个古老而神奇的天然溶洞,位于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白龙江南岸露骨山汉王乡杨庞村的半山腰,距陇南市中心7公里。万象洞堪称溶洞一绝,是一座神奇的地下宫殿,洞窟高低错落,深邃莫测。奇特的钟乳石凌空悬垂,天然雕就的自然景观星罗棋布。因其洞内千姿百态、包罗万象,随意扣之,惟妙惟肖,故此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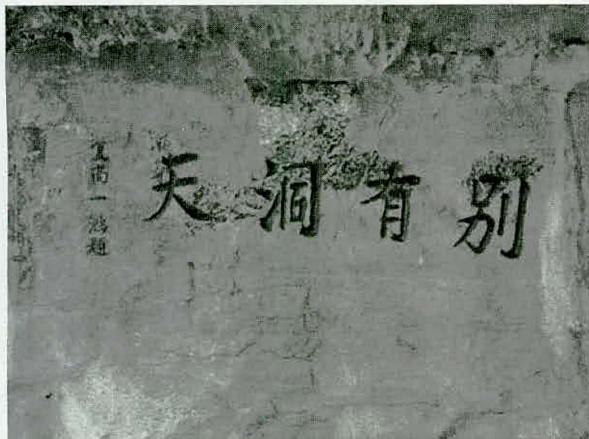
名,真可谓“空廊深邃出尘寰,万象森罗一洞天”。对于万象洞的形成,根据地质学的推断大概是形成于3.5亿年以前,当然这已经是比较确切的形成时间。它是国内规模最大、景观最佳的天然溶洞,深不可测,据说可以连通文县天池,但至今无人证实。现已开发深度4500米,游览面积36万平方米。其艺术价值很高,规模宏大。洞内除了优美的钟乳石风景之外,更是一座古代文化长廊。

万象洞自北周建德三年(574年)以来,历代名人、官宦、商贾、僧道和百姓前往游览者络绎不绝,有的磨石刻碑,有的洞壁挥毫,华章妙语,千古生辉,构成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映成趣的艺术世界。洞内题记很多,也是陇南地区题记保存最多的地方之一,但对于万象洞洞壁题记的研究却不多,而且其研究都集中在书法艺术和文学层面上,笔者通过对万象洞的实地考察和翻阅文献,对于万象洞的洞壁题记进行了整理汇录并作了浅显的分析,以飨读者。

二、万象洞洞壁题记

洞壁题记是指古代游人写在洞内天然壁面上的书迹。是古代游人给后人留下的宝贵的文化财富。在陇南金石题记中,数万象洞较多,万象洞碑刻题记总面积达100平方米,有历代石刻8方、碑2通,墨笔题记一百多方,现存的颂扬万象洞的诗词近千首,大多出自各地地方官员及各界名流之手,以赞美万象洞景色的居多,也有记载当时历史事件的佐证史料。早在1600多年以前,虽然游览者尚未留迹,但已在各界人士中很有名气了。到北周建德三年(574年),已有朝廷出巡大使武定公贺娄慈进洞观光并在黄泥坝岩石上题字作记。自此以后游人络绎不绝,从唐到清各朝来阶州的提

点、巡按、刺史，古阶州（今武都）知州、知县以及各界名流游览者相继题记。民国时期，陕甘青检察使高一涵、甘肃省政府主席郭寄峤、武都籍少将师长王咸一等人也留下来墨宝。这些题记当中比较著名和重要的有，北宋奏风路刑狱公事游师雄，南宋知州高英、万钟、宇文景仁等游者，留有石刻八方。有明代巡按陕西监察御史，阶州知州等巡游石碑两通。有北周出巡大臣武定公、贺娄慈及唐、宋、元、明、清各代墨笔题记一百多方，近千首。其中大周（北周）建德三年（574年）大使武定公贺娄慈行游至此题记最为著名，也是我们了解万象洞游人最早的史料佐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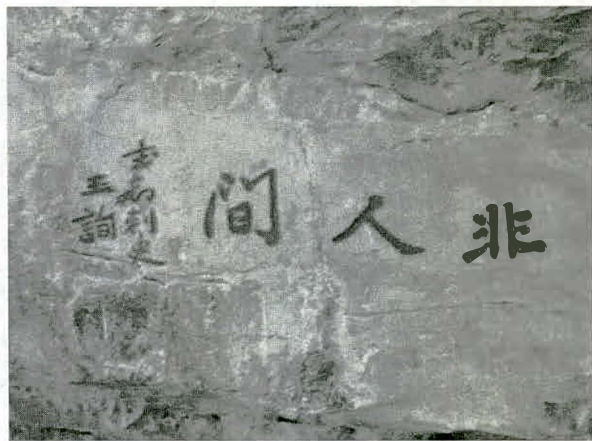
（陕甘青检察使高一涵题“别有洞天”）

万象洞题记之多，内容形式多样可以称为陇南金石文化之最，但是由于年代久远，保护失当，好多题记笔迹已无法辨认，能够完整保存的只有一半之多，笔者在实地考察之后，对于万象洞题记作了简单的汇录。对于万象洞洞壁题记总结为两类：一为记事题记，二为诗词题记。

1. 记事题记

记事题记有：武都万象洞书于北周建德三年（574年）的《贺娄慈题壁》，文曰：“大周建德三年五月廿六日，大使武定公，贺娄慈行境至此。”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吴挺在武都抗金保蜀，击败金兵，收兵石门（今武都旧城山），游人至此亦狂划于壁，关于“石门”地方史志中并未有记载，唯有万象洞题留“乙巳卒冬三日，石门复回淳熙……”，更有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的《福津令席彦儒题壁》墨迹是一丝不苟的楷书，由于墨迹模

糊，不能辨认，故此处内容缺失。洞内书于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的《李思齐题壁》，书曰：“观仙洞至此”（李思齐；元至正年间任陕西行中书平章政事）。明清时期，万象洞游人渐多，题记也较多。明代武都刺史王询题有“非人间”三字。清代阶州知州叶恩沛所提万象洞匾额“仙源有路”，雄健苍右，让人销魂。清代郡人贾廷琯题有“万象仙洞”洞额，现金仍然墨迹斑斑。民国到建国后更有陕甘青检察使高一涵写的“别有洞天”四字，语意惊人。1987年，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先生为万象洞题写了洞名“万象洞”成为罕见的书法珍品。



（武都刺史王询题“非人间”）

2. 诗词题记

唐德宗甲子贞元，始有题诗。诗曰：携友同来到洞天，奇奇幻幻金际间。十二元魁造仙府，仙人此去几何年？（唐·刘暄），立意不凡，意境幽远。南宋太守万钟勒石为记，作有长短句，重写洞口景观：“骅骝缓策，晴江上，沙嘴晓痕□新涨。春山数叠罗清幃，下有琼台玉帐。洞门敲遍，旌旗响、何处森罗万象！凭谁借我青藜杖？唤起蛟龙千丈。”南宋绍熙改元年间，福津县令宇文景仁在花岗岩石上所勒诗文，诗曰：“□挂破白云端，来扣云□访列仙。羽葆珠幢眩凡目，玉芝石随垂馋涎。直崑高澈庐无顶，遂但潜通小有天。兴尽却归到城郭，问今几世复何年？”。明代有郡人赵守正《万象仙洞》题诗：“古洞悬崖跨石门，杳无鸡犬任朝昏。遨游会见玄中景，身世浑忘静里存。……”把游人引入人间仙境。清代郡人贾廷琯的题诗最能表现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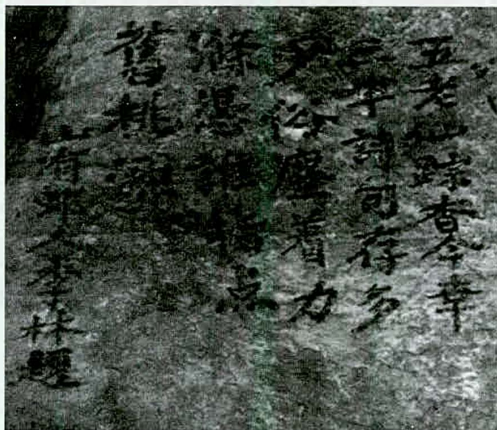
象洞之奇观,诗曰:“不是人世间,包罗万象天。卧龙何日起,玉柱几时悬?谁凿鸿蒙窍?空留丹灶烟。洞深苔石滑,何处际神仙?”。清咸丰年间武都人李林联句成诗,妙趣横生:“何年鬼斧劈混沌,万象包罗信有门。山水之间奇山水,乾坤以内小乾坤。”。以上石刻都从侧面为后人提供了当时武都区域变迁及所辖地界史料。当然万象洞内题诗远远不止这些,笔者通过实地考察、翻阅资料,大概汇录了以下主要洞壁题诗:

题诗者	题诗年代	诗名	题诗人身份	诗文字数
刘暉	唐德宗甲子贞元	《游万象洞》		28
高宝臣	宋代	《万象洞·卧龙坪》	知县	28
庐江子	北宋	《庐江子题诗》	高僧	28
万钟	南宋	《游万象洞》	州守	53
毋丘	南宋、绍熙改元	《万象洞》	州守	56
赵守正	明代	《万象仙洞》	郡人	56
尹继祖	明嘉靖四十三年	《尹继祖题句》		
胡明善	明嘉靖八年	《游万象洞》		56
熊载	明代	《万象洞》	知州	56
张三丰	明代	《万象洞留谢胡溪追访》	道教大师	42
张三丰	明代	《联句》	道教大师	14
连登科	清代	《万象洞》	成县令	56
贾廷馆	清代	《万象仙洞》	郡人	40
陈埏	清代	《春日重游万象洞》	州守	320
黄文炳	清	《游万象洞》	州守	56
李林	清	《题万象洞》	郡人	28
叶恩沛	清代	《游万象洞》	州守	224
陈焕奎	清代	《游万象洞》	武陵人	308

注:由于大多诗句都是信手拈来,并未有诗名,其中以《万象洞》为诗名者,部分都是后人加之。

以上所列均是万象洞现存保存完整、字迹清晰的古人题诗,当然万象洞题诗不仅仅有这些,由于客观条件限制,笔者收录的还不够详尽,实属遗憾。从以上题诗可以看出,题诗者大多数是时任武都郡或阶州的州守、知县、知州之类,当然也有当时比较著名的当地郡人,也有高僧、道士。从题诗的内容来看,主要都是反映万象洞景色为主,从中也可以窥见当时阶州人民的生活状况,以及当时阶州地区的地理区域变迁。对我们了解古代阶

州(武都)地区的历史文化提供佐证史料。



(清郡人李林题《题万象洞》)

三、万象洞洞壁题记的价值

万象洞洞壁题记群,是古代题壁遗存的宝库,有确切纪年及年代可考者约有156帧(北周4、隋唐10、五代2、北宋22、南宋23、明代74、清代17、民国8)。这些题壁群共同勾勒了万象洞内的人文历史线索,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文化财富,并且在历史研究、旅游开发等方面有着重要的价值。

1. 史学研究价值

万象洞洞壁题记中有一部分题记涉及到一些历史事实的重现,给历史研究者提供了部分鲜为人知的历史史料。如:南宋淳熙十二年(1185年),吴挺在武都抗金保蜀,击败金兵,收兵石门,游人至此亦狂划于壁,关于“石门”地方史志中并未有记载,唯有万象洞题留“乙巳窄冬三日,石门复回淳熙…………”,经后世学者考证“石门”即今武都旧城山,北魏后曾在此置县。除此之外,万象洞题记中也有高僧道士的题记,如北宋高僧庐江子的题壁诗云:“洞内滚滚口龙蛇,怪石高幢水滴花。此景已非凡俗景,更与何处觅仙家”。也有明代道教大师张三丰的两首题记,这些题记从侧面都可以带给我们一些信息,这也反映了当时佛教和道教在不同历史时期在武都地区的发展和影响。

因此可见,万象洞题记中不仅仅只有赞美景色的诗句,也可能为我们历史研究提供一些地方史志中并未记载的信息,而这些信息都需要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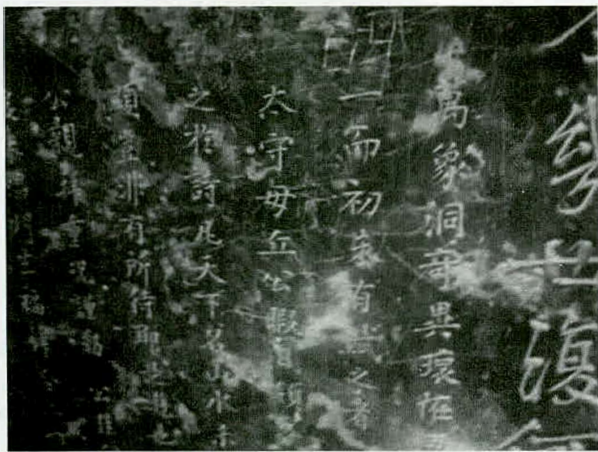
后世的历史工作者仔细挖掘。

2. 文学、艺术研究价值

武都万象洞保留着大量的古代诗文题刻与题壁墨迹。这些诗文题刻与墨迹,不仅从侧面反映了陇南的历史变迁和民俗文化,而且其本身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如唐《刘暄题诗》、明《胡明善题诗》等。在另一方面,题记最能表现出的莫过于书法艺术价值,如万象洞书于北周建德三年(574年)的《贺娄慈题壁》,墨迹清新如初,书写随意,结字平中寓奇,饶有隶意、或古拙质朴、或庄重典雅,充分反映了当时书法艺术的蓬勃发展。

3. 旅游开发价值

人文历史在旅游开发中历来比较受重视,万象洞是一个以自然景观为主题的旅游景点,但是由于万象洞中大量的古人题记,使得游人在感受自然神奇的同时,又能品位到洞内浓厚的人文气息,构成了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相映成趣的艺术世界。使得万象洞不仅是神奇的自然景点,并且有着历史性、文化性和精神的表现形式,万象洞洞内



的诗词题记对其旅游开发有着重大的意义。

(南宋、绍熙改元年间毋丘所题《万象洞》一诗)

四、结语

题壁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题记作为一种传媒手段和通俗书写形态,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数千年,尤其在印刷、造纸等传媒手段尚不完备的相当长的时间内,承担了社会传播的主要功能。由于大多数题壁常年裸露,其承载面又容十分脆弱,常因屋倒壁毁及风雨侵蚀而湮灭无存,因此,题记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常被史学家忽略。武都地处特殊的地理环境,正是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与气候特征,多数题记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尤其是万象洞洞壁题记,因其很少受自然力的破坏保留的比较完整。万象洞题记年代久远,数量繁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不仅是研究题壁文化的珍贵文物,而且也是考察古代陇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宗教、军事、民俗、旅游、生态环境等发展状况的综合史料。因此,作为文化工作者,我们在观光的同时也应做到保护文化遗迹、研究文化遗迹,使文明不断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 [1](清)叶恩沛修、吕震南纂.阶州直隶州续志[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
- [2]甘肃省武都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武都县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 [3]武都历史文化大观[M].2009年.
- [4]蔡副全.论题壁书[J].中国书法,2010(5).
- [5]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陇南金石题壁文化研究[M].2010

(作者单位: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陇南市委党史研究室)



民国时期甘肃工业

安文迟

民国时期甘肃工业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11年到1937年;第二阶段从1937年7月到1945年9月,即抗日战争时期;第三阶段从1945年9月到1949年8月,即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解放战争的时期。

第一阶段,1911年辛亥革命后,甘肃进入了军阀统治时期,清末民初发展起来不久的民族工业,由于战乱的影响和资金匮乏及原材料短缺,未能得到继续发展的社会环境。除了军事工业、机器制造业、采矿业、纺织等行业中,已开始采用较为现代的生产技术外,其他的工业行业基本上都还是手工业生产作坊。

甘肃的工业除少数几家官办厂家外,民间生产大部分都处在前资本主义的小作坊和工场手工业阶段,这些场家又时常遭到官府的掠夺压榨和兵祸,很难维持下去,更难有所发展。就连甘肃制造局、甘肃造币厂、兰州制呢局等官办企业也是经常停业倒闭,朝不保夕,所以甘肃的工业生产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比重是微乎其微的。

这个时期甘肃的近代工业仍属起步阶段,而且发展滞缓。清末左宗棠经手创建的二局——甘肃机器局、甘肃织呢局(甘肃近代工业发端的标志。他们的处境也可作为民国初期近代工业在甘肃的缩影),也在时断时续中缓慢前进。

甘肃机器厂在辛亥革命后停工。张广建时期扩建,国民军时期易名甘肃制造局,制造机枪、追击炮,全厂职工约千人。国民军东下后,业务停顿。甘肃织呢局,辛亥革命前已停产。1914年恢复生

产,但因销路不畅而再度停产。1919年改为官督商办,更名为甘肃制呢公司,由邓隆、牛泽厚经营。因亏损于1925年停办。1926年,又更名为甘肃织呢厂恢复生产,职工增至120人,生产绒毯和粗毛呢。毛呢日产10匹,质量也较好。1928年河湟事变后,职工都被征用于军需,工厂关闭至1937年。

辛亥革命后至抗战前,甘肃新建的使用机器设备的工厂中当以孔繁锦在水天创办陇南机器局最具规模。20年代初,孔繁锦在水天创建了陇南机器局、天陇纺织厂、和丰制革织呢公司等企业。孔派人到上海、武汉购买机器,总价值在300万银元以上(不含运费),其中有不少是外国著名厂家的产品,建厂房所用的钢筋、水泥购自天津。聘有职员技师500多人,其中有德国工程师。陇南机器局投产后曾炼钢、炼铁、炼铜、造机器、铸银元、铜元、制造军械等。陇南机器局是继兰州机器局、织呢局之后,甘肃第三个机械化程度较高的近代工厂。1927年,国民军占领天水后,将陇南机器局有关铸造银元的机器和制革厂的设备搬运至兰州,分别成立甘肃造币厂和兰州制革厂。其中铸币的机器有:锅炉2台、70马力发动机1台、车床3台、刨床1台、钻床1台、40马力碾片机1台、碾辊机1台、春光机4台、光边机3台、剪刀机2台、印花机(空心)10台、烘台1座、印花机(实心)牌坊2件(后增)。

甘肃造币厂的机器来自天水,原料则主要来自没收马廷劼、马廷贤的200万两白银。另外,也委托一些钱庄在市场上收购零星白银。全厂职工300人左右,日产银元最高为六七万元。财政部规

定银元含银量为 88.9%，甘肃造币厂规定为 82.5%，经常连这个规定也达不到，有时甚至降至 70%。马麟给青海藏区新铸的半元银元，含银量只有 50%。造币厂于 1935 年停工。

甘肃的电力工业诞生于这个时期。1914 年，张广建成立兰州电灯电话局，安装 1 台 6 千瓦直流电话机。1920 年、1924 年增设 1 台 20 千瓦 220 伏交流发电机和 40 千瓦 380 伏三相交流发电机，主要供应省级机关照明，也兼供少数绅商家庭照明。1935 年改称兰州电灯厂，又新购进 1 套 102 千瓦 2200 伏三相交流蒸汽发电机。至此，兰州共有 168 千瓦发电设备。1922 年，孔繁锦建立天水发电厂，有 1 台 30 千瓦煤气发电机，1932 年划归省建设厅管理。1934 年，马步青建立武威发电厂，设备为 12 千瓦发电机 1 台、50 马力锅炉及蒸汽机各 1 台。1936 年，甘肃的发电设备共 210 千瓦。

这个时期较有成就的是火柴业。1914 年，邓隆等人在兰州创立光明火柴公司，资本 3.5 万元，工人 100 多人，年产约 700 箱，每箱 7200 盒。1931 年，兰州同生火柴厂投产，资本 6 万元，正式工人 70 人，临时工人约 80~90 人，年生产火柴 700 箱。1919 年，静宁中和火柴厂建立。1921 年迁岷县，资本 1.5 万元，年产火柴 460 余箱。1920 年天水炳兴火柴厂成立，初期资本 1.4 万两白银。1933 年产火柴 1000 箱。1923 年，平凉富陇（陇东）火柴厂建立，资本 3 万元，职工 200 余名（其中厂内职工 70 余名），另在华亭设立分厂，年产火柴 1000 箱。全省火柴年产量约 3500 箱。能满足需要量的一半以上。在甘肃工业产品中，是自给率比较高的。

现代印刷业始于 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的甘肃官报局。1912 年后改为公报局、政报局。1925 年后，成为省督署、省政府的印刷厂，曾添置印报机 1 台。辛亥后出现私营印刷局：1915 年成立三兴印书馆，资本 2000 元；1928 年成立国民印刷所；1931 年后先后成立俊华印书馆（资本 1 万元）、集义印书馆。此外，还有新华局、树德书局（资本均为 3000 元）等。这些企业都有铅字对开机、铸字机、切纸机、画线机、脚踏机等印刷机械。

1935 年，兰州出现“华陇烟草公司”，实际资本 5 万元。这是甘肃第一家采用动力制烟机（卷烟）的工厂，生产“五泉山”、“北塔牌”等三种纸烟。所用烟叶不是兰州出产的水烟叶，而是河南产的美国种烤烟。

从清末到 30 年代，甘肃的省、县两级政府还举办了一些有少许机具而以手工为基础的工厂。最早的是甘肃省劝工厂，分织布、裁绒、绸缎、玻璃、卤漆、铁器六科。辛亥后只剩下织布、裁绒、卤漆三科。1926 年，成立省第一民生工厂，生产卫生衣、袜子、手巾、线哗叽、布匹等。后又增资 2.9 万元，设第一分厂，又名洋胰子厂，设肥皂、洋烛、牙粉部等。1927 年，劝工厂并入第一民生工厂二分厂。1927 年，兰州市政筹备处以冬季赈济粥费开办 3 个济贫工厂，生产棉毛织物，有裁绒、毛褐、毡毯等。1919 年，省立兰州工业职业学校以 5000 元建立附属工厂，有编织机数架。1926 年添置纺织机数架。供学生实习，并有毛衣裤、毛袜、裁绒、肥皂等产品供应市场。1926 年后，在临洮、临夏、榆中、会宁、陇西、甘谷、天水、岷县、秦安、文县、庆阳、山丹、临泽、酒泉、敦煌等 26 县都设有平民工厂，大都出产棉毛制品和皮革加工品。甘谷在 1926 年后办有永新肥皂厂（年产值约 1000 元）、维国纺织厂和织袜厂（年产值在 5000 元左右）。上述工厂，都设有现代动力，实际上都是手工工场。

第二阶段，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心西移。甘肃成了支援抗日战争的战略大后方，兰州成为大后方的重要工业城市和交通枢纽以及各种抗战物资的中转站。沦陷区的工业企业内迁甘肃，根据战事的需要也新建了一批工业企业，特别是苏联等国际援助的一些军用物资也要在甘肃兰州等地加工装配。所有这些在当时都促进了甘肃工业的发展。

抗战时期，特别是前期，甘肃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在稳步地发展，但国民经济在结构上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工矿、交通、邮电通讯、金融等现代产业，虽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仍然很低，但它已不再是处于零星的萌芽状态，而是在甘肃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着明显的影响。这种影响

超过了旧中国任何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比较突出的成就，主要是近代工矿业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先进的生产力，其中天然石油工业，是全国领先的行业。这种领先地位大约保持了近20年。陈南夫的《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摇篮》记载：从1938年至1949年玉门油田的原油产量占全国同期石油总产90%以上，约占旧中国45年石油总产量的70%以上；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期间，占全国天然石油产量的80%以上。当时的玉门油矿已成为大后方第一个大规模的现代企业，成为中国石油工业的摇篮。兰州已初步建设成为新兴的西北近代工业基地之一，也是大后方的毛纺织中心之一。

现代工矿企业，东部工业区沦陷后，为了满足抗战对工业品的需要，国民政府对大后方进行投资，兴建了一批现代工矿企业。甘肃是资金和技术人才重点分配地区之一。战时主管工矿企业建设的资源委员会独资或与省、部合资在大后方兴建了85个厂矿企业，其中甘肃有10个，占11.76%，居西北各省之首，计有：(1)甘肃油矿局——玉门油矿；(2)甘肃煤矿局(含永登、阿干两矿)；(3)兰州电厂；(4)天水电厂；(5)天水水力发电工程处；(6)甘肃机器厂；(7)华亭电瓷厂；(8)甘肃水泥公司；(9)甘肃化工材料厂；(10)甘肃矿业公司。前9个厂都由资委会主管经营。甘肃矿业公司(资委会和四行联合投资850万元，甘肃省人民政府投资150万元)由甘肃省人民政府主管经营。此外，资委会所属中央电工器材厂(总厂设昆明)在兰州设立兰州支厂电池厂。这样以资委会投资为主的厂矿共有11个。中国银行是战时在甘肃的第二大投资者。它直接投资或利用信贷投资的生产单位主要有5个：(1)兰州机器厂；(2)兰州制药厂；(3)兰州化学厂(实用化工厂)；(4)兰州毛纺厂。以上四厂属于雍兴公司系统。(5)甘肃水利林牧公司。这个公司在开发水利、农垦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与此同时，还举办了一些现代工厂。

军政部在甘肃主管经营和兴办的工厂有4个：(1)军政部第二制呢厂，即左宗棠创办的兰州织呢总局。1938年由军政部向省政府租用。1943年

后改为部、省联合经营。(2)兰州纺织厂。(3)兰州颜料厂。(4)第一军需局皮衣厂。

中央卫生署在兰州投资兴建西北制药厂。这是甘肃最大的西药厂。财政部复兴商业公司西北分公司同爱国资本家刘鸿生(中国毛纺织特种股份公司)在兰州创办全国惟一的西北洗毛厂。经济部、甘肃省人民政府、青海省人民政府与刘鸿生(占股份50%)等合资1亿元，于1943年开始兴建西北毛纺厂。

甘肃省人民政府、甘肃省银行还与中国交通银行合组兴陇工业公司(登记资本500万元)。其所属造纸、化学、印刷、瓷器等工业企业，在资金、规模上仅次于中央所属的企业。

著名民族资本家荣氏集团，把汉口福新五厂迁至天水，职工99人，日产面粉520袋。这是战时迁甘的最大工厂，也是甘肃境内最大的独资民营工厂。

战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投资，是甘肃近代工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公营企业的发展为民营工业提供机械、动力和一些原材料，在一定程度上为民营工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甘肃的民营资本主义工业，在战时也有较大发展，主要分布在纺织、面粉、机修、冶炼、化学等行业中。但大多是中、小厂家，没有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的民营厂矿，因而也没有形成较大的民族资本集团。

1943年，经济部中央工业实验所在兰州成立西北工作站，其任务是在技术方面对甘、宁、青三省的工业建设进行指导和帮助，是非营业性的事业单位。

由于新建厂矿相继投产，甘肃近代工业的一些行业开始形成了规模生产，特别是能源工业的石油开采和冶炼，成为我国当时最大的石油和石油制品的生产基地。甘肃的近代加工业主要集中于兰州。从此，兰州成为我国西北初具规模的工业基地。

抗战期间，由于抗日战争需要大量军用物资，也由于战争和交通的阻隔，国外和沦陷区的工业品难以进入甘肃，这就为甘肃省工矿业的发展提

量达到 397.2 万加仑,煤油 175.1 万加仑。1948 年原油产量 60 万桶 (2520 万加仑),汽油 800 万加仑,煤油 200 万加仑。1949 年产油 69635 万吨,占全国产量的 57%。从 1939 年至 1949 年,玉门油矿生产原油 45.5 万吨,约占旧中国 45 年间石油总产量的 70% 以上。

交通运输业,这个时期,甘肃的现代交通有一定发展。宝鸡至天水的铁路于 1945 年底竣工,1946 年正式通车。但工程质量较差,不能正常运行。1946 年,抗战后期开工的 3 条公路干线,在甘肃境内部分先后完工。1 月底,甘川二线岷县至武都段竣工。3 月,南疆公路(敦煌至新疆若羌)甘肃境内段 333 公里竣工试车。6 月,兰州经靖远至银川公路(全长 489 公里)竣工。1947 年,全省公路通车里程 6469 公里。

甘肃工业到 1949 年 8 月,全省只有设备简陋、生产手段非常落后的几十家小厂矿和近千家小手工业作坊,从业人员仅 7100 人,全部固定资产原值不过 2300 万元(折合人民币 1952 年价格)。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凋敝,全省失业人员达到 30 多万人,物价飞涨,工厂不能开工生产,经济全面崩溃。

机械制造业

1. 甘肃机器厂

始建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 年),辛亥革命后一直属甘肃省政府直接管理。民国 5 年(1916 年),张广建任甘肃省省长兼督军,时值军阀混战。次年,将制造局(当时名称)迁建于萃英门内(今兰州大学第二医院院址),扩充职工 140 多人,制造枪械弹药,并将兰州制造局改为甘肃制造局。民国 14 年(1925 年),国民革命军刘郁芬入甘,甘军与国民革命军战事频繁,甘肃制造局日夜赶制枪械弹药,人员迅速增加。民国 17—19 年(1928—1930 年),制造局日平均 500 余名职工,最多时达千余人。

民国 25 年(1936 年),“西安事变”后生产完全停顿。民国 27 年(1938 年),甘肃省政府将甘肃制造局改为甘肃制造厂。民国 29 年(1940 年)1 月,改名为甘肃省建设厅机械工厂。1941 年 7 月,甘肃省府与国民政府行政院资源委员会协商合

办机械工厂,改名为甘肃机器厂。在兰州西郊土门墩(今兰州通用机器厂厂址)购地 344.4 亩另建新厂。民国 31 年(1942 年)5 月新厂奠基,民国 32 年(1943 年)正式迁至新厂生产。合办后资本总额 3000 万元(法币),其中,省方 400 万元,资源委员会 2600 万元。共有职工 322 人。各种设备 67 台。至 1945 年产品已发展到六大类 60 种,六大类是机床工具类、农机灌溉机械类、石油机械配件类、轻工毛纺机械类、汽车零件及公路建筑机械类、枪械军工用品类。从民国 30—34 年(1941—1945 年)连年亏损,5 年累计 39.64 亿元(法币)。

抗日战争胜利后,甘肃机器厂陷于困境,资源委员会将甘肃机器厂交由甘肃省府独立经营,省府财力有限难以维持。《甘肃民国日报》民国 35 年 1 月 29 日报道《风雨飘摇中的甘肃机器厂》,惊呼“数年来费尽心血,惨淡经营之甘肃惟一机器婴孩,未能顺利成长。即脱离襁褓,而陷于颠沛苦境之中,为甘肃工业前途着想,孰能让其夭折而不悲痛乎,孰能视其没落而不扶持乎。”民国 38 年(1949 年)7 月兰州解放前夕,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将甘肃机器厂暂行借用,成立兵工厂。隶属西北军政长官公署。1949 年 7 月 4 日,强制将造币厂与机器厂的设备拆卸移运青海。

2. 甘肃造币厂

民国 11 年(1922 年),陇南镇守使孔繁锦在天水建造币厂,取名“陇南机器局”。民国 16 年(1927 年),刘郁芬将陇南机器局迁兰州,改名“甘肃造币厂”,划定萃英门内制造局西工厂库房及“潜园”为厂址,同年冬制造银币。民国 17 年至民国 18 年(1928—1929 年),年职工 400 至 500 人,月产量最高记录银币 40000 元。甘肃造币厂于民国 24 年(1935 年)停工。

3. 兰州机器厂

属宋子文为董事长的雍兴公司,系中国银行投资,经理潘炳兴,民国 30 年(1941 年)7 月在兰州七里河吴家园建成,资金 5 万元,设备有车床、牛头刨、钻床、铣床等 7 台。民国 34 年(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兰州机器厂歇业,机器迁回陕西蔡家坡机器厂。

4. 汽车修理业

民国 26 年(1937 年)7 月 7 日,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爆发,甘肃省成立了战时经济委员会,甘肃是抗战的大后方,兰州又是连接苏联的国际运输线,国民党中央提出了“开发西北”“发展西北工业”的口号。沿海城市的一些民族工业和技术人才纷纷涌向兰州,使甘肃的机械工业在此期间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民国 26—34 年(1937—1945 年),全省开过业的汽车修理及零星修配工厂有 54 个,其中在民国 30—33 年(1941—1944 年)开过业的有 37 个。据《甘肃省统计年鉴》记载,民国 33 年(1944 年),全省共有机械修配工厂 46 个,资金 3930 万余元(法币),从业人员 824 人。金属切削机床 185 台,其中:车床 90 台,刨床 19 台,铣床 8 台,钻床 28 台,镗床 2 台,其他金属切削机床 38 台。民国 31 年(1942 年),对兰州市工厂进行了调查,其中机器冶炼厂 23 家。战前成立的有 12 家(包括 7 家手工翻砂厂)。机器冶炼业资金总额为 53 万元(法币),工人总数为 99 人。民国 34 年(1945 年),这些工厂大都歇业,私营工厂中最大的森森机器厂,于民国 36 年(1947 年)将全厂设备出售给青海。济生铁工厂创办不到两年于民国 3 年(1944 年)被迫停工。后经改组继续经营,但抗战胜利后,业不抵债,不得已将机器设备、原材料出售一空,只留 10 人维持部分翻砂业务,勉强支撑到甘肃解放前夕。

甘肃省汽车修配行业最大的企业是交通部西北公路运输管理局兰州机厂,该厂成立于民国 27 年(1938 年),有职工 100 多人,各种设备 23 台。民国 30 年(1941 年)10 月,兰州机厂修理部改为兰州修车厂,制造部改为公路管理局制造厂。公路管理局制造厂民国 34 年时(1945 年)共有职工 293 人,设备 21 台。这是甘肃省汽车修配行业的开始。

民国 36 年(1947 年)7 月,国民党军队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第二汽车四级修理厂由昆明迁来兰州,后改为第十二军用汽车修理厂,有员工 385 人。设备 81 台。国民党第十二军用汽车修理厂抗拒国民党西迁工厂的命令,组织职工护厂。

能源工业

1. 玉门油矿

1913 年,甘肃护理都督张炳华曾派人会同玉门县知事调查有关石油情况。1938 年 12 月,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成立甘肃油矿筹备处,开发玉门油矿。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孙越崎任总经理,工程师孙健初、严爽直负责技术工作。从 1938 年到 1944 年,资源委员会对玉门油矿共投资 9.3 亿元法币,抗战前法币(与银元等值)1030 万元,占同期资源会投资总额的 15%。甘肃省府大力支持玉门油矿建设,把玉门、酒泉、金塔三县作为油矿招募工人的基地,三县应服兵役的壮丁全部拨交矿上作工人。1941 年,玉门油矿有职员、技术人员 631 名,工人 5097 名,1942 年增至 6800 人。到 1945 年共钻井 26 口,年产原油 6.5 万吨。抗日战争期间共生产原油 25.5 万吨,天然气 3600 多万立方米,汽油 3.7 万余吨。

2. 阿干煤矿

煤的开采较铁普遍,产量较多的是皋兰阿干煤矿(1924 年日产 280 吨,有工人 1390 人)、永登窑街煤矿(年产量 4—5 万吨)。此外,华亭、永昌、民勤等地有小规模开采。

民国初年,阿干镇矿为私人经营。产煤炭的地区只有大煤山和山寨两处。民国 27 年(1938 年)成立甘肃矿务局,在阿干镇设矿务管理处。1939 年,甘肃省府投资 10 万元,用以购买动力采煤机械,扩建了阿干镇煤矿。最初该矿月报原煤 30—50 吨,后增至 100 吨,1941 年,甘肃省府与资源委员会又合资创办永登窑街 300 万元。1943 年,上述二矿合并,改称甘肃煤矿局。郭寄峤任甘肃省府主席时,将阿干镇山寨的私营平洞子煤矿上收,由阿干矿务管理处经营。1942 年产煤 3249 吨,1945 年达到 8959 吨。全省煤矿战前年产约 10 万吨,1945 年增到 20 万吨。

3. 甘肃电业

甘肃电业创始于民国 3 年(1914 年),最先在兰州建立电厂。民国 11 年(1922 年),孔繁锦建立天水电厂。民国 23 年(1934 年)马步青建立武威电厂。民国 30 年(1941 年),建立玉门(油矿)电厂。到 1949 年解放,甘肃省装机容量为 1750 千瓦,而实

际发电不到 1100 千瓦。全部线路(包括 380 伏)仅 100 多公里。1948 年,兰州动力用户只有 85 户,全年发电 409.5 万度。解放前甘肃电力工业职工共计 332 人。

1941 年,华亭电瓷厂建立,职工 350 人。有磨粉机、炼泥机及多种试验装置。年产绝缘陶瓷装置 90 多万件。中央电工器材厂兰州支厂于 1942 年建立,每月产日月牌 A、B 电池 5 万只,单节电池 1000 打,能满足西北地区需要。

轻纺工业

1. 甘肃制呢厂

始建于 1879 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代。民国 3 年(1914 年)张广建督甘,派蒯寿枢为甘肃制呢局总办。次年,经营惨淡,存呢竟值银币十万元之多。民国 14 年(1925 年),刘郁芬再次恢复制呢局,仍用原有的厂房和机器设备,职工 120 多人。次年,因马仲英的反冯战争,甘肃制呢厂又告停产。

民国 26 年(1937 年)冬,国民党军政部派该部武昌制呢厂厂长蔡德明来兰州开办军政部兰州制呢分厂。甘肃省主席朱绍良即令甘肃省建设厅予以接洽。经双方研究,决定将甘肃制呢局的机器、厂房租借给军政部,月租定为法币 400 元(后减为 250 元),1938 年 7 月 1 日试车投产,甘肃制呢总局便改为军政部第一制呢厂,主要生产军毯。1943 年,军政部与甘肃省合办制呢厂,投资 500 万元。双方各让一半。1945 年 4 月,仍改为军政部制呢厂。1946 年,国民党将军政部制呢厂改为联合勤务总司令部被服厂制呢厂,厂址在畅家巷。1949 年有员工 300 余人,机器陈旧。

2. 兰州西北洗毛厂

民国 29 年(1940 年),重庆实业家刘鸿生与复兴商业公司合资经营,洗毛机系外国进口,厂址选在兰州草场街口西北分公司兰州仓库后院。职员 10 人,正式工人五六十人,其余都是临时工。抗战胜利后西北洗毛厂并入西北毛纺厂。1949 年 8 月,自动组织工人护厂队,西北毛纺厂安然回到人民怀抱。1949 年度,洗原纯毛 44 万公斤。纺毛线 6.3 万公斤,生产呢绒 6.95 万公尺。西北毛纺厂是兰州市第二毛纺厂的前身。

3. 雍兴公司兰州毛纺织厂

民国 28 年(1939 年)冬筹建,资金 60 万元(法币),经理潘秉兴,厂址兰州市第八区吴家园街 52 号,占地十余亩。安装有 32 台钢制高阳式窄幅制机,20 台铁织高阳织布机,20 台手拉制机,60 架手摇纺纱车,3 口染锅,自备动力,小型马达 9 部,合计马力约 30 匹。民国 30 年(1941 年)6 月开工生产,生产毛呢、毛毯、地毯。民国 33 年(1944 年)有职工 179 人,年产褥子 3038 尺,地毯 4382 条,双幅纯毛呢 20333 尺。民国 35 年(1946 年),将毗邻的兰州化学厂划拨该厂,厂址扩大到 60 亩。1949 年 8 月,雍兴公司兰州毛纺织厂由人民政府接管,即今兰州一毛厂前身。

4. 兰州光明火柴公司

创办于清宣统二年(1910 年)地址黄河北靖远路。民国 9 年(1920 年)由官绅合股改造官商合股,邓隆(1894—1938,字德舆,号玉堂,河州人,清光绪甲辰进士)为董事长兼总经理。民国 19 年(1930 年),在青海设立分厂,资金总额 2 万银元。民国 32 年(1943 年),资金增至 3 万元,张善卿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光明火柴公司创办时,兰州道彭英甲以凤林关官铁厂(凤林关 20 号)土地作为官股而投资于火柴厂。光明火柴厂占用的,只是官铁厂的部分,其大部分是在修筑兰包公路时拆除,其后在修筑靖远路时,因要拓宽路面降低路基,又占用了部分厂区,拆除了部分厂房。1950 年 8 月,光明火柴厂在西北地区火柴工业调整中停产,厂址划拨“福音医院”即后来的市第二人民医院门诊部。

兰州的光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的创立,是兰州实业界接受官办企业难以推进的教训而兴办实业的一大转折。它的创办,不仅完成清末民初甘肃实业界一大要举,还开兰州股份制企业之先河。创设初,刨剥机、切梗机、下火机、排梗机、印刷机都采购自日本,年产 1000 箱。民国七年(1918 年),设窑街分公司,其后又设西宁分厂。民国九年(1920 年),因黄磷自燃引起火灾,厂房、设备毁于一旦。不久,从四川购来铁木加工设备恢复生产。至 1950 年停产,其间存世 41 年。41 年间,先后产生两任总经理。首任邓隆,兼任董事长,任期至民国

三十一年,因年事高而辞职;第二任是经股东大会推选,张善卿任总经理。任期至关闭。

光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初创时,以“大鹿”为商标,以“鹿”谐“禄”之音,取发财之意。“五·四”运动前后,国人发起“振兴国货,挽回利权”运动。光明火柴公司利用火柴商标设计,改“大鹿”为“轮船”(黄磷,阴火)、“朝阳”(硫化磷,阳火),寓意国货权益从国外回来。还需要说的是,所谓的阳火、阴火,就是硫化磷火柴和黄磷火柴的俗称。硫化磷火柴,以硫化磷为原料,因发火快,使用方便,是火柴成为商品后的主要产品。药头燃烧时发出明火而引燃梗子,故俗称“阳火”,但因为它随处可以擦划,属于不安全的火柴。黄磷火柴,药头主要原料是黄磷,擦划时发出蓝色磷火,慢慢引燃梗子,故称“阴火”。它虽有引梗率高的优点,但发火没有硫化磷火柴快,所发之火不怕风是它成为商品的主要理由,又故有一俗称“气死风”。因黄磷暴露在存放处容易自燃而引起火灾,亦属不安全产品,上世纪60年代淘汰而被安全火柴取代。

5.天水火柴业

主要有炳兴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和永和火柴两和公司。1918年底哈锐募得股金白银(当时通用货币)三万二千两(每股50两,共640股)。购得市区合作巷原黄家烟房为厂址:在小陇山林区党家川设立山厂,生产火柴梗、火柴盒片;在甘泉寺元店附近建外厂,加工、运送山货原料;派人去重庆聘请技师、购买生产设备,研制出黄磷火柴。1919年3月召开第一次股东会议,决定设立董事会,选出

张仲武为董事长,哈锐为经理,胡子为副经理,王鼎山为监理,同时报请立案注册,成立“天水炳新火柴股份有限公司”,以“雄鸡”为注册商标,1920年正式投入生产。时哈锐已57岁。“雄鸡”牌火柴投入市场后,先以质量优于陕西宁羌“松鹤”牌火柴而占领陇南市场,渐次扩及陇东、河西一带。半年后,又开发出发火迅速而相对安全的“山羊”赤磷火柴,更受消费者好评。炳新声誉日增,产品销路日旺,行销陕西、青海,在西北市场占有很大份额。1921年到1930年10年间,由日产7箱到20箱上下(每箱100包,每包6小封,每封72盒,每盒100枝火柴),年总产值达15万元以上。1946年至1949年间,法币贬值,业务不振。永和火柴两和公司成立于民国27年(1938年),股金法币8万元,后增至40万元,经理罗成肃。

6.兰州同生火柴公司

民国14年(1925年),国民革命军入甘后开办的济贫工厂,厂址设在小西湖陶公祠,1931年春正式投入生产,生产的“阳火”为“日光”牌,生产的“阴火”为“月光”牌。有工人90余人,内工70余人,外工20余人。每年共生产700—800大箱,每大箱7200盒。1936—1938年公司情况好转。同生火柴公司在1949年兰州解放后立即恢复生产,及时供应了市场需要。



1960年

上肖“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第一师”案

镇原县地方志办公室

在全国经济状况不断恶化,人民生活保障受到威胁的情况下,1960年12月20日,屯字公社上肖、光辉(杨城、南李村)、庆丰(党堡村)、太阳等4个大队的12个生产队及泾川县荔堡、党原等公社,暴发了“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第一师”案。案件的发生,虽以军事建制,用武装起义的形式出现,但实际参与者都是一些普通农民,是在听说能“吃饱肚子”的诱惑下聚集起来的,是一群没有任何军事行动能力的农民集体进行的一次哄抢粮食事件。案件发生后仅8天,即于12月28日被平息。

1957年冬季,全县开展了全民整风运动,开始了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提出了粮食亩产翻两番的战斗口号,促使各公社出现了很多严重超出实际虚报产量的统计数据。据1958年10月11日县计划部门统计,1958年全县夏收粮食总产5.53亿斤,是1957年18451万斤的3倍,平均亩产达到330斤,是1957年115斤的2.87倍,人均产粮1928斤(总人口28.68万人),是1957年645斤的2.99倍。这些虚报的数字,导致上级部门制定出台了不合实际的粮食征收任务。1959年6月25日,县委下达了《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规定夏季收入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应占到总收入人的60%左右”,即40%上缴国家,按此计算,农民实际人均上缴数量要达到771斤,参考1957年农民人均产粮,农民在颗粒不见的同时,还要拿出126斤,这就导致了农村灾荒和农民饿死村头现象的发生。1958年9月人民公社化后,推行食堂

制,使群众生活更加艰难。

1958年至1960年三年,全县共为国家拿出粮食168830万斤,占三年总产的39%,平均每年完成5634万斤。其中1959年最多,在1956年8月将党张乡划归泾川县,1958年12月将占全县1/6土地、1/5人口的肖金等公社划归庆阳等周边县的情况下给国家交售了6855万斤,超过解放后任何一年的负担。1960年,即使在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还拿出了5254万斤。由于负担过重,购了过头粮,造成了群众生活困难。”(引自1961年8月中共镇原县委《关于1958年到1962年的工作检查报告》)

“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第一师”案,是由原屯字公社梧桐生产队人孙和忠搞起来的。孙和忠,富农成分,31岁,1949年10月在平凉市公安局第一派出所任户警,1952年因病回家,1958年在“许张反革命集团”冤案中逮捕,审查未果,释放后,1959年仍以“反革命集团干将”(《镇原县政法公安部关于敌情调查摸底工作情况报告》(59)镇公权字第10号)被监视。阴阳刘清彦对其预测说“甲子春荒庚子乱,唯有丙子水浇田。庚子年是刀兵年,共产党不得过庚子年。”1960年即庚子年,根据当时的形势,孙和忠即开始了起事准备。1960年农历七月,刘维玉、刘俊章对孙和忠说:“张万海(刘维玉岳父)说,洪河川青红帮都起了皮了,有四千多人,头子是谢子英、王崇山,平凉有一个姓马的,勾结的是地主、富农、右派、敌伪人员、辞职和犯错误的干部”。问孙参加吗,孙未答应。农历九月中旬,孙

和忠两次去找白浪亭。(白浪亭,贫农成分,50岁,屯字公社梧桐生产队人,曾任固原国民党警长、巡警、督查十多年,当时定为反革命。)互相讨论了国际消息。白说:“形势不好的很,青红帮行动起来了,人不爱共产党了,今年万众一心了,人都有反心哩。”又说:“我是五类分子不好行动,你办去,能组织一、二百人,我给你带兵”。并要孙把曹世虎(曹世虎,贫农,四十四岁,雄武生产队人。曾当过国民党保长,自卫队中队长,分队副,当时已定为反革命分子)、刘维均(刘维均,贫农,四十一岁,梧桐生产队人。曾当过国民党常备队特务长、分队长)、杨万虎看重些,说这些人都有反心哩。此后,孙便积极发动联络人员。农历十月初,孙和忠与王廷瑞密议,以吃饱肚子为名拉拢些人抢泾川白家桥子洋芋仓库,准备将抢粮的人全部拉入,扩充势力,但因仓库保管严密,未能得逞。11月26日(农历十月初八日),孙买羊一只,以吃肉为名,叫来田多麦(理发工人),同王素瑞等12人,密谋活动。田说:“泾川王乐五月份组织起二三百人,找不着头绪。”孙即叫田一方面联系这些人,另一方面去西峰打探消息,他自己去平凉打听消息联系人。28日(农历十月初十日),通过王廷瑞、贾应福去荔堡张凤武、武光魁家接收张、武二人参加,并密议了荔堡活动事宜。

12月6日(农历十月十八日),孙和忠和张仲魁借给屯字公社上肖大队梧桐生产队支书苟彦福买自行车之机,去平凉打探国际消息和平凉情况。通过范有良找到张桂霞。张说:“平凉市北门外面粉厂被抢了,市内每晚巡逻查户口,释放宣统王还贴标语欢迎来,形势很紧张。”孙说:“洪河川青红帮起皮了,有4000多人”。张说:“如果能成功,我爱人尚文义(平凉大寨公社武装干事)在大寨训练的民兵叫带上过来。”孙又向张布置了联络其他人事宜。

11日(农历十月二十三日),孙和忠从平凉返回后,派人四处接头,扩大势力。当日,孙和忠通过王廷瑞、路世魁、吴学智联络玉都吴崇教,并约定二十四日晚在泾川白草湾吴孝彦家孙、吴见面,当晚召集泾、镇两县20多人开会。吴崇教杀羊一只

款待。会后孙和忠接收了吴崇教的80人,孙又指示继续大量发展。

14日(农历十月二十六日)晚,孙和忠召集白浪亭、王廷瑞在家密议,研究了组织名称、机构,任职名单,行动路线等。名称拟为“泾、镇起义为民五极军”。组织编制是“以师为头”,设师长、副师长。师部设参谋、军械、军需、军医、秘书主任和外交、通讯若干;下设六个团、团以下设营连。会议任孙和忠为师长,白浪亭、王廷瑞为副师长,并对团以下职务做了计划性委派。当时白浪亭提出:“60年12月28日全国民变哩,行动越快越好,否则时机一过,就等于没干。”

16日(农历十月二十八日),孙和忠一面派其弟孙和福联络邢天星(邢天星,下中农,三十四岁,光辉生产队人,曾在共产党游击队当兵三个月,时为光辉大队卫生所医生。)一面召集曹世虎、刘维均在其家密会,二次磋商组织名称、任职名单、行动路线和抢粮问题。决定组织名称改为“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一师。”孙和忠亲自刻制印章,并在师部增设了副官主任,又委派了一些职务,并决定在二十九日大会上宣布。

17日(农历十月二十九日),又在白草湾吴崇孝家召集泾、镇两县首领和积极分子会议,到会四十七人。会议由孙和忠、邢天星主持,会前孙要刘正发、刘继军为会议提主张。最后决定:(1)组织名称,组织编制。组织名称为“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一师。师长孙和忠,副师长白浪亭;师部参谋主任王廷瑞、路世魁、刘思贤;军械主任曹世虎、吴崇教;军需主任兼军医主任邢天星;副官主任孙元秀;秘书主任张维芳;外交孙和福、白明勤、赵克俭、张维金,通讯员孙和福、刘维佐;战斗通讯员刘维平。按地区划分了团,一团团长曹世虎(兼),二团团团长张凤武,副团长武兴魁;三团团团长张万海,副团长张世芳;四团团团长吴崇教(兼),副团长张学信;五团团团长刘维均,副团团团长刘维培;六团由邢天星编制放任。营以下由各团编制。(2)行动路线、行动办法。农历十一月初三(公历12月20日)起义。先抢荔堡,后上肖、屯字,次打镇原县城,放出囚犯,扩大军势,开仓放粮,安抚民众。行动口令是

“起义”；行动暗号是每个人左手腕绑一白线条；行动口号是：“堵塞粮食外调”（当时平凉专区正在向外调运粮食）、“推翻粮食定量制”、“为吃饱肚子而斗争，不杀干部，不伤生”。抢荔堡的方法是：各地人员利用跟集名义到荔堡集合，由其“底线”张凤武、武兴魁二人预先各担柿子、蒸馍在公社周围售卖。刘维均等七人为“尖兵”，以卖馍有意制造纠纷，斗殴打架，扯到公社评理，其他人看热闹拥进，趁机实施抢劫。(3) 抢劫粮食，安排口粮。农历十月初一、二两日，各地的主要活动是：编制营连，抢劫粮食。二日晚进行小暴动，统一抢粮。一、二、三团由曹世虎率领抢党堡子粮仓，其“底线”是马长久；四、五、七团由白浪亭率领抢泾川白头仓库，“底线”是刘维培、张学信；六团抢粮地点由邢天星安排。参加者每人带十天熟食，家属每人每天一斤半粮（当时供应口粮，每人每天六两），未参加的每人每天一斤粮，安排一月时间。和生产队勾通的由生产队安排，没勾通的就抢。(4) 枪支弹药，武器来源。派人联络风翔路口 30 多人，20 多支枪，取孙元虎、马昌前家的轻重机枪各 1 挺，步枪 2 支，预抢荔堡公社步枪 50 支，机抢 2 挺，上肖大队步枪 3 支，并要各地收集枪支、子弹、炸弹。抢荔堡时有啥带啥，如土枪、手榴弹、月牙斧等。(5) 发放奖金，经济来源。经济来源由上肖信用社主任马长久、会计苟宗显支援，预计要支出一万元。抢了荔堡、上肖后，发奖金。(6) 指挥部设在孙和忠家，孙于农历十一月初二（即 12 月 20 日）坐阵指挥，若活动中有被捕者，即组织抢夺。会后吃羊两只，各自散去。

白草湾集会后，各团开始活动。六团是邢天星组织起来的。邢于 19 日（农历十一月初一）早，指示苟宗显与马长久准备了经费（苟、马备妥 7300 元，存放苟家）。后又亲自发展了邢天常等 6 人。这六人于当天又分头串连了 5 人。当晚邢天星在其工作的光辉大队卫生所召集这 11 人开会。传达了白草湾会议内容，并编制了六团机构，委邢天常、李玉江为副团长，团部秘书，宣传 2 人，通讯 2 人，割电线 2 人，后勤 3 人，下设 3 个营（营长 3 人）；会上提出发展对象为 36 人，要求到会者分头发展。并派李步海于初二日到镇原城打探守备军事

力量和接线活动等。初二日，各路发展串连后，当晚在邢万虎家召集密会，到会 25 人。李步海向邢天星报告说：“镇原公安局人员很少，城里也未来军队。”遂决定初三日每人带十天熟食，参加荔堡行动，并当会发给李步海五元奖金。会后吃羊一只，率众抢李家社仓库，未逞。七团初一晚以刘正发、刘金义为首在刘润富家召集 10 人密会，提出发展对象 57 人，布置分头活动。初二日，刘正发向孙和忠报告发展人数 110 人。还报告净口有公安干事 5 人，携带长短枪各五支。受到孙表扬，遂委刘为师部秘书主任，并为刘填发了“工作证”，加盖了印章。孙又指示：(1) 初二当晚带人抢白头粮库；(2) 净口编为第七团；(3) 组织 15 名“尖兵”初三日抢荔堡；(4) 行军口粮由后勤人员运送；(5) 夺取公安干部枪支。刘返回后即组织两路人马，一路由刘全义率领 80 余人抢白头仓库，一路由马甲喜等率领 45 人抢夺公安干部枪支，结果均为得逞。一、二、三团于初二晚按原定小暴动、大抢粮计划，由曹世虎等率领抢党堡专业队仓库，结果马长久、党志远（专业队长），给前来的 20 多名抢劫者分装粮食 600 余斤。四、五、七团由副师长白浪亭率领泾川、镇原两县 200 余人，抢泾川白头仓库，中途由于泾、镇首领内部发生矛盾，未得逞。五团副团长刘维培又率领六人，抢刘家山仓库粮食 2800 斤。师部外交白明勤等 7 人偷杀本队羊 4 只，当晚吃掉 1 只，七团在返回途中，刘思敏、刘全义先后到孙和忠处研究了七团人事编制，孙当即任命刘全义为团长，刘思敏为付团长，还派了四个营长，并指示二人将人带回，抢本队粮仓，结果被公安人员阻击而散。

20 日（农历十一月初三日），即约定暴动之日。这一天荔堡逢集。各路人员以赶集为名，齐聚荔堡。下午三时行动前，师长孙和忠一面召集各路人马，一面派一团团长曹世虎与其“底线”张凤武、武兴魁联系，侦探荔堡公社情况，并暗示以买卖蒸馍不给钱蓄意制造纠纷，要求政府处理为名，闯入公社。曹世虎侦得公社干部正在吃饭，孙率众约 200 余人，包围并闯入公社，堵截了隔院党校学员（110 名）的去路。砍伤公社统计员何孝清，抢

去步枪两支,自行车7辆,电话机1个,被褥1套,公文袋1个。军需主任邢天星率领刘启栋等十多人闯入邮电局,砍坏电话总机,打伤电话员石具才,抢去现金8元,汇款单1005元,又割断长途电话线。此时到处散发传单,大声疾呼,“要吃饱肚子跟我们走”,号召群众参与。

邢天星在前往荔堡途中,发现县、社四名干部去了雄武生产队,因此在抢了荔堡后,孙、邢、曹等部率队前往,包围了雄武生产队,打伤干部一名,夺去长枪、小口径步枪、手枪各一支,砸坏电话机,割断电话线,烧了会计账,又抢去该队供销社现金40元,白洋布13丈,毛巾、手套、线衣、纸烟等物多件。

抢了雄武后,撤至下肖,孙和忠整顿了队伍,为攻打上肖做了准备。因二团未到,即将三团改为二团,余皆依次上升,组成六个团,共一百多人。又因原三、六、七团团团长未到或被捕,又派张维金为二团副团长,李文棋,邢立先为五团副团长,刘清安,刘金治为六团副团长。并组织了冲锋团(20人)一个,警卫连(8人)一个。孙宣布他为战场总指挥,率六团警卫连督后,曹世虎为第一副指挥,率一、二、三团打冲锋,祁天星为第二副指挥,率四、五团围攻。后即前往攻打上肖。八时许首次围攻上肖大队,被干部、民兵击退,再次组织进攻时,住在上肖的王学礼向孙、邢报告当地守备情况,孙即率队撤退。十二时许,有几人二次进攻,又被击溃,其中张有财被击毙,1支长枪被缴。

上肖溃败后,撤至北苟生产队准备吃饭。中途邢天星带刘全治3人,以先去北苟办生活为名借机逃跑。孙率众到北苟后,无饭可吃,又去该队窟边食堂,抢去洋芋、面粉二百多斤。至此,大部分群众回到自己家或藏亲友家中。

在北苟大队大多数人散去后,孙和忠、曹世虎率18名坚定分子,于21日拂晓逃至光辉大队先锋生产队马岷岷王廷儒家躲藏。当晚又抢先锋生产队面粉厂,未逞,又逃到石崖景生产队金佐王家躲藏。22日晚孙又和金万福抢去该队仓库粮食3000多斤,面粉200余斤,清油一罐。23日孙和忠等4人窜至新集公社唐原大队大湾掌生产队,已

无路可走,28日晚孙被捕。邢天星带领3名骨干沿蒲河川向北逃跑,24日至新集公社唐家原大队姚家原生产队枣阳小队社员食堂,以平凉“检查团”名义骗吃了饭,后被尾随追捕时,鸣枪脱逃。25日拂晓至环县天池公社马俭生产队其族爷邢玉明等人家躲藏两昼夜,并伪造证件,改名新山。27日,返至新集公社白露大队张大湾生产队,遭围捕,邢手持空枪威胁,当即被捕。

在屯字公社上肖大队调查12月14日发生抢粮案件的赵维璧等6人,在19日期下午六时左右,发现一嫌疑分子李子宏,经讯问,李供;当晚有许多人要包围你们,并继续抢粮。19日晚九时五十分,镇原县公安局即将这一情况电话报告平凉地委。地委即派公安处副处长李志德等人前往。当时地委书记李正廷在西峰,得悉情况后,即派镇原在西峰参加地委分片会的镇原县委书记处书记刘兆南、赵信谦2人赶回。20日下午五时,又先后得悉,泾川荔堡公社电话线被割;荔堡公社(与上肖接壤)被劫,夺去了枪支。

平凉地委立即成立了统一指挥部。副书记刘文正当即召开有关单位研究部署。一方面组织了以军分区副司令员杨仲林为首的,有军分区、地委、公安处、民警大队、九〇二一部队,平凉市委等一些负责人参加的九人指挥机构。在地委统一领导下,统一指挥,统一布置,统一情报,统一联系等事宜。另一方面,又立即进行军事布置,专区民警十队抽调36人,配有机枪,乘卡车二辆,由民警大队长和军分区顾科长率领,于十时三十分出发,经肖金去上肖,并派军分区参谋刘干从西峰赶上肖指挥。镇原县抽调民警和基干民兵20余人增援。泾川县抽民警11人,基干民兵15人,于十二时出发去荔堡上肖。随后又增派九〇二一部队一个连连夜乘五辆汽车,由炮营李参谋长带领,于21日三时半出发,经新城、平泉、镇原县城至屯字、上肖一带。甘肃省公安厅派人于20日午夜时即赶到平凉,后深入屯字公社上肖,配合当地党委和专、县工作组,兰州军区派出一个骑兵连,配合行动。

21日晨六时左右,九〇二一部队、民警赶到屯字、上肖等地时,暴乱人员已撤离,分散潜藏。21

日,又抢去白苟生产队羊 35 只,被部队民兵追击赶回 33 只。同晚,在光辉大队马岷岷小队有 18 人,鼓动群众抢粮,被击溃散。23 日拂晓时,平叛部队同干部民警在石崖景生产队与其接触,追击两小时。于三处俘获 11 人,内有团长 1 名,其余溃散,当晚各路堵截。捕获 22 名,击毙 1 名(即张有财),10 人投案。

28 日,平叛行动基本结束,捕获师长孙和忠、军需主任邢天星、团长刘正发共 31 人,下属和被胁裹群众大部分已回家。副师长白朗亭和 228 人投案自首。曹世虎在潜藏 3 个月后被击毙(一说自杀)。

缴获物品:

1、武器类 12 件:月牙斧 5 个;小铁头 1 个;手榴弹 6 个;步枪子弹 38 发;步枪 2 支;小口径枪 1 支;土枪 1 支;铁链架 1 个;匕首 2 把;手枪 2 支;剃头刀 1 把;手枪子弹 11 发。

2、证件类 11 件:笔记本 3 本;五项原则 1 份;净口队花名册 1 份;路条 13 张;红布片 2 个;白布袋 31 条;传单纸 41 张;传单 3 张;私章 10 个(未刻字 8 个);印章 10 个(2 个是偷的);(印泥盒 1 个。

3、财物类 17 件:手表 1 个;人民币 7540.50 元;粮票 5.8 斤;眼镜 1 副;存折 1 个(款 8 元);小皮包 1 个;药包 1 个;旧包袱 1 个;手套 3 双;毛巾 2 条;白洋布 11.45 丈;衣物 8 件;粮食 5066 斤;自行车 3 把;羊 36 只;清油 10 斤;面粉 101 斤。

“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第一师”行动一开始即已被当地的干部民兵击溃,平叛部队,只仅仅起到追捕分散、潜藏、逃逸的残余势力的作用。

12 月 24 日,平凉地委书记李正廷在屯字联防会议的讲话中说:“镇原屯字反革命暴乱,利用了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抓住了我安排生活中的一些问题组织反革命暴乱,这不是一般的粮食问题,而是有政治纲领,有计划的蓄谋已久的反革命,有美蒋特务指挥下的反革命组织。”“屯字问题,12 月 12 日抢了粮食,14 日县公安局长到这里分析这个情况,是粮食问题还是反革命问题?最后还说是粮食问题,19 日又抢了两千多斤粮食”,

“地委下了决心,县上没有执行…组织的不好”。李正廷同时要求:“群众生活现在要确实确实安排好”。

同日,平凉地委在报省委、兰州军区的“情况简报”中称:“社员口粮要一个小队一个小队、一个食堂一个食堂的去检查,保证每人每天最少吃够六两粮。向群众宣布,口粮不够六两的要补足六两,明春还可以多点”。“要想一切办法,使群众在现有口粮标准的基础上,吃得更好一些,吃热饭。同时,要向群众说清你分的粮食吃完了,缺的口粮,国家保证供应,使群众放心来”。

据案发地群众回忆,当时人们认为粮食问题是上级被下面虚报浮夸所蒙蔽,曾有一些公职人员暗中动员有历史问题人员带头闹事,铤而走险,通过把事闹大来引起高层重视,了解真相,进而解决粮食问题。

经司法机关本着首犯从严,从犯从宽,抗拒从严,坦白从宽,少杀长判的政策依法审理,判处孙和忠、邢天星死刑,立即执行。判处 4 至 20 年徒刑 33 人,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66 人,定为案内成员 58 人,划为知情人 276 人。白朗亭在审理期间已死于狱中。后于 1973 年 3 月,经地、县有关部门复查,维持原判 82 人,摘掉反革命帽子 8 人,平反纠正 348 人。

资料来源

(1)1961 年 1 月 13 日李志德报平凉地委的《关于“救国起义为民五极军第一师”反革命暴乱审讯进展情况初步综合报告》;

(2)1960 年 12 月 21 日甘肃省委《关于泾川、荔堡发生反革命暴乱事件的情况报告》;

(3)1960 年 12 月 21 日甘肃省公安厅《关于泾川、镇原、庆阳等县结合部发生反革命暴乱的通知》;

(4)1960 年 12 月 22 日平凉地委《关于镇原屯字公社上肖大队发生反革命叛乱案的情况简报》;

(5)1960 年 12 月 24 日李正廷、刘于、史银琚报省委、兰州军区《关于镇原县屯字公社十二个生产队反革命暴乱情况简报》



散见于西北地区的旧式婚姻

潘硕珍

娃娃婚 娃娃婚是指由父母为幼小儿童缔结的婚姻，提亲的一方男孩子一般在十岁左右，也有更早到孩子刚刚出生就经双方老人议定的，更有甚者在怀孕期间双方老人就议定好，如双方生一男一女便结为婚姻，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指腹为婚”，但要等到成人以后方可举行婚礼。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于政府部门严格执行婚姻法，订娃娃亲的旧俗几乎绝迹了。

近亲结婚 姑舅或两姨表结为夫妻，即为近亲结婚。贾宝玉和薛宝钗系姨表姐弟，他们的结合，就是典型的近亲结婚。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近亲结婚的陋习也逐渐消失了。

童养婚 童养婚是我国封建社会家长制产生的一种畸形婚姻形式。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家无劳力，用钱买来较大的女孩子帮家中干活，待儿女适龄到期，便为其成婚。《马五哥与尕豆妹》是回族著名叙事诗，是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发生在甘肃河州的一个真实故事：“莫尼沟青年马五哥与尕豆妹相爱，两人互赠信物，订下终身。不料尕豆妹因人才出众，被当地大恶霸马七五看中。马七五借口给十岁的儿子尕西木娶妻，将尕豆妹霸占。一天，尕豆妹与马五哥在泉边相遇，相约夜里在尕豆妹家会面。这对难分难舍的情人夜间幽会时，惊醒了小女婿尕西木，两人不得已将尕西木掐死。马七五买通官府，将马五哥和尕豆妹斩首于兰州华林山。”（《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杨亮才等著）一是贫穷户怕儿子今后娶不上媳妇，便先行抱养或买进别家幼女，待长大后完婚。甘肃作家邵振国的成名作《麦客》里，甘肃庄浪县后生吴顺昌，于改革开放初期去陕西临游割麦挣钱，叫他的媳妇名叫水香，最初当妈的是把她作为童养媳买来的，后来见她出

落得水灵灵的，不忍心嫁给自己的“白货什”儿子，“再后来，眼看着娃一天天大了，要出门做人家的了，当妈的半生辛苦、一点盼头全都化为乌有了”，老人一横心，“娃，跟你哥成婚吧！”水香以为神话时期兄妹结婚的荒唐故事要在她身上重演，哭着说：“成婚？妈——，我是你的亲女儿，亲女儿呀！……”从她十四岁成婚到现在的日子，她从来没有爱过人，但却爱上了大她儿岁的麦客吴顺昌。

招夫养夫 贾平凹的短篇小说《天狗》讲述的是偏僻乡村一种“招夫养夫”的陋习。井把式在一次掏井事故中腰被巨石砸伤，导致下身瘫痪。为了养家糊口，主动让自己的徒弟天狗来做师娘的第二个丈夫。善良、质朴的天狗痛苦地蒙头昏睡三天之后，打算逃离到省城。然而，正是由于对师娘圣洁的爱使他最终放弃了逃避的念头，挑起了师傅、师娘家生活的重担，却并没有与师娘过过一次夫妻生活。故事的结局是以井把式的自杀换来了天狗与师娘的结合。贾平凹通过井把式并不悲壮的自我牺牲以及喜剧性的结尾，指出了农村中的陈规陋习得以存在的根源就是贫困。

交换婚 也叫亲换亲，即两家互为婚姻，多为贫困人家为延续后代而采用的婚姻形式。一般都由父母包办，有连带关系，一家好，家家好；一家散，家家散。2012年1月号《天津文学》发表了邵振国的中篇小说《那道嵯峨》。那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孙志福与儿子成嫫到集上卖自家树上产的苹果，与张家的父女攀谈起来。孙志福想与张家结亲。他写了些信物，亲自上门求婚，知道张家很贫困，大儿子张山近尚未娶上媳妇，便想拿自己的女儿成英和张家的女儿近月换婚。“倘若能换亲，对于孙志福也不啻为一件好事，他便无须再去筹措

1500 1200

彩礼钱,两家谁也不给谁,都节省了。”孙志福提出的亲换亲的主张,首先得到了张山远的赞同,他说他能做通妹妹的思想工作。孙成英是个孝顺女子,为了减轻父亲的经济负担,答应牺牲自己,为已经老大不小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孙成檩换回张近月。孙志福还让女儿去征求已经分居的母亲的意见,妈妈对这一桩婚姻也没反对,“教她过那边先不要同房,须等到那边的丫头过门稳定了之后。倘若变故,丫头你必须回来。”这种换亲,很好准备,依照农村的惯例,双方既免了彩礼也不摆席待客,到日子相互一过门就是了。孙成英“嫁”过去,很快又回娘家了,抽泣着对孙志福说:“大大,女儿应该回来,他家的近月逃婚,跑得不见踪影了……”

错房婚 指兄(弟)歿后由弟(兄)改室为妻,前提一般都是兄(弟)生前留有子女。这种婚姻形式,也叫收继婚,在羌族、土族中流行过。“兄死弟娶寡嫂,弟丧兄纳弟妇。”(《羌族》,周锡银、刘志荣著)

抢婚制 在羌族、土族等少数民族中,还流行抢婚制。“当男方求婚被拒绝时,就趁女子在外劳动时抢回家去,若被抢女子愿意成亲,就住在男家,五天后由男方送上财物到女方家谢罪;若被抢女子不从,即使成婚后亦可偷跑回家。抢婚可以抢姑娘,也可抢寡妇。”(《羌族》)“贫不能备财者,辄盗女去。”(《魏书·吐谷浑传》)

入婚 据朱洪斌编著的《中国民间婚丧习俗》介绍:“入婚。旧社会称为‘倒例转门’,即贫困家庭或多子家庭的男子到女家落户继嗣,改姓换名,还要大请女方家族,名曰陋娶。”入婚也叫入赘。陕南巴山地区就有招婿、嫁儿的风俗。话说邵振国笔下的孙成檩,自从换亲失败后,死心塌地替家里当长工。还是他的堂嫂子同情他,给她出主意招婆娘去。孙成檩经到外地当倒插门女婿的同乡三丑介绍,倒插门来到岷县马坞乡曹氏人家,做了上门女婿。丈人、丈母娘生了两个女儿,还有两个尚在炕上玩耍的儿子。当初,孙成檩到曹家时,曹家大大提出了三个条件:“一嘛,这屋里半年后圆房,把我大丫头曹改换许给你做女人;二嘛,你必须在这屋呆够10年,10年后才可以带上你的女人和娃

另家或迁转别的地方;三嘛,就是这10年中,你只是把我屋子的地种好,而没有你个人的地和劳动所得,所收成的粮食和钱都是我这大屋的,你有责任把这屋的两个碎兄弟拉扯长大。”孙成檩的丈人果然很苛刻,岳母替女婿向他求情:“我看现在也没有啥农活了,让成檩带上改换走那边探视一回吧!他来咱屋日子久了没回去过,娃大大给他们几个车费盘缠。”岳父没吭声,也许在琢磨车费盘缠,对女婿说:“明天是大集,你拉上一车洋芋去卖掉。”成檩对父亲的思念只好埋在心底了。岷县有句俗话:“招婆娘要吃八担狗屎呢!”极言上门女婿所受到的虐待和压迫。在西北农村,入赘女家,是被人们瞧不起的一种人生选择,等于去做女家的长工,而且死后不能葬埋祖坟。

一妻多夫 一妻多夫制主要在门巴、珞巴和藏族存在过。地处四川阿坝的山巴藏寨,便是这样一个村寨。山巴藏寨一般都是兄弟共妻。为了壮大家族,兄弟几人共娶一妻,成人后不分家,生子不分彼此。公平对待每个丈夫是妻子的美德,家庭和谐,倍受尊重。一夫多妻制和一妻多夫制已成历史。我记得那是上世纪70年代,邻村兄弟二人,因家庭贫困,父母亲只为他们娶了一个媳妇。那个女人的娘家也贫困,加上本人奇丑无比,长着一副傻相,对这样的婚姻自然是逆来顺受。

一夫多妻 我曾在散文《红泥小火炉》里写了一个一夫二妻的真实故事。出现这种婚姻,除了传宗接代的观念根深蒂固外,还与人们的法制观念淡薄有关。故事里的男主人公,先娶的女人漂亮贤惠,但不能给他生孩子,后又娶了一个长相平平的女人,生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大老婆是明媒正娶的,他不忍心休掉她,留下她还是一把干活的好手;二老婆是他私下娶的,为他家延续了香火。那时候的乡村,民风淳朴,没有谁肯去有关部门告他犯了重婚罪。老汉享受着“齐人有一妻一妾”的生活情调。

(作者单位:甘肃岷县二中)

月色溶溶的中秋之夜,看到柠檬色的月亮,或者听见清脆的天籁之音,何人不起故园情呢?当代诗人、诗评家张同吾写道:“中秋月是用彩笔画圆的/中秋月是用梦幻编成的/挂在天上挂在心上/用永不消失的诱惑/把期盼照圆/把泪珠照圆……”(《中秋月》)

我想起了童年时代在故乡过中秋节(在我们乡下,农民把中秋节叫做八月十五)的情景。那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每逢八月十五日,生产队队长下令,宰二三头大绵羊,将连骨羊肉抓成大小基本一样的二十几堆,按照户数分发下去,算是动个荤腥。羊圈和打麦场毗连,家家户户的男孩女孩簇拥在打麦场里,仿佛啄食粮食的麻雀,吵闹不已。屠夫将羊肠子扔在地上,就被胆大包天的男孩子双手掬起来,向河滩奔去,后面跟着二三十个男孩女孩。几个不怕脏的男孩,利用汤汤流淌的河水,洗净羊肠子里草绿色的粪便,开始从头到尾地绽开,足有三四十米长,手捏肠子的孩子们向打麦场迈进,大家把这叫做拉电线。大家齐声念诵“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童谣,憧憬起光明美好的未来。直到竹筛大的月亮升上打麦场上空,狂欢的气氛都减弱不了。杀羊过中秋节该是游牧民族和汉民族融合的习俗吧。中秋节杀羊的习俗随着生产队的解散不复存在了。

故乡人当然也不举行祭月拜月活动,让皎洁的月夜蹉跎而过。

据家住岷县十里镇大沟寨村的师范校友刘贵才说,岷县十里镇十里铺、大沟寨村一带的村民有八月十五晚上抢面灯的习俗,该是庆祝庄稼丰收、合家团圆之意。也包含“以助月色,藉以庆贺中秋”的意味。

25年前,我在岷县西江学区工作。农历八月十五晚上,我和一位师范校友坐在公路边的大石头上谈心,月亮尚未露出山头的时分,一群野孩子手拿用麻秆或麦草扎的火把从峨路村跑出来,大呼小叫地向庄稼地跑去,却不点燃什么。如今,我读了国风编著的《中国农民的传统生活》,终于恍然大悟:“若中秋夜儿童执火炬,结队走田野以摘取果豆等物相与识别,则谓之‘摸秋’。因为万物都

家乡的中秋节 (外五篇)

潘硕珍

在秋成,此种风俗一方面可以验收秋之丰歉,同时可以增进儿童对于栽培作物的兴趣,寓教于乐,甚有意义。”像西江乡峨路村儿童于中秋之夜打火把跑向田野的风俗,在岷县似乎绝无仅有。

青苗会 “村落组织属于小型的社区组织,在一些多姓杂居的村落,由于人们分属于不同的宗族,因而十分有必要在宗族之外建立一个村落组织,以帮助当地居民协调彼此之间的关系。村落组织通常都设有村庙,里面供奉着保护神,有些村庙只供奉土地神……此外,还设有青苗会,主要负责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事务,如农田用水、抗旱防涝、看护庄稼、家畜管制、摊派钱物、祭祀鬼神等。”“等到拔苗的时节人们要祭祀青苗神……干旱时祭祀雨神……”(《民俗常识》)

“当青藏高原上春暖花开的时候,也是一年中美好的季节。妇女们成群结队地来到青苗地里,给刚长齐的麦苗锄草。绿油油的麦苗地里便响起一片柔美的花儿声。红凉圈、白凉圈、花凉圈在太阳底下缓缓移动。凉圈帽下飞出一串串花儿:‘那我给你买给个(好心肠呀)凉圈箍儿呀,二龙戏珠蓝雀探梅绿飘带的凉圈箍儿呀,戴上了来,四月的青苗地里拔两天草了去;那我给你编给个(好心肠呀)破草帽呀,露掉顶的烂掉圈的毛线缩下的破草帽呀,戴上了来,四月的青苗地里浇两天水了去’。这时候的歌声是欢快的、甜美的。望着春光明媚的景色,她们的心中充满了希望,充满了企盼。”(贾

文清《花儿是我们心上的油》)“六月初六,互助县威远镇有朝山会,另外在姚庄的马家寺中有无量神会。无量神会,设‘青苗头儿’六个人,每年十月份由青苗头向群众收一二升粮食,到了六月初六这一天,村里男男女女,拿上碗筷,到寺里吃一顿好饭此外,还有请三四个阴阳师在庙内念经。周围村里的人都穿上新衣服来逛神会。”(郭璟《土族》)这是青海省互助县土族人在过青苗会。

岷县茶埠乡将台村的庙会时间为每年农历四月初四,供奉的神灵是范仲淹。“如果正好在四月田苗出土时遇到大旱,则在四月会时必唱一折儿《干荒店取雨》,唱戏时舞台上演员手拿柳树枝,并不时向台下泼水,以示龙王爷已取到救苗的灵水。”(季绪才《岷县茶埠将台四月四庙会花儿会》)将台四月四庙会同时也就是青苗会。在马坞乡沙金风景区东沟的山顶,“有一眼久旱不涸久涝不溢的清泉。相传与大海相同,故名小南海。传说这里很早以前就有庙宇,每年四月初八日,当地农民到这里祭神求雨,以后逐渐演变成了庙会。”(李树《岷县境内庙会概况》)马坞气候比岷县各处炎热,农历四月份,正是庄稼盼望天降甘霖的季节。因此,沙金小南海庙会也就是青苗会。

根据学者戚晓萍的调查,西寨镇坎卜塔“村中有民间组织青苗会与社火会。”(《洮岷南路花儿现状调查报告》)坎卜塔庙会(包含青苗会在内)从古历五月十八日开始,十九日达到高潮,二十日结束。庙里供奉的湫神是明朝时期的张锦(二郎山十八湫神之一,俗称艰难爷)。

每年农历六月初一至十三日,岷县锁龙乡赵家庄与后家沟之间的月楼滩上,要举办一年一度的青苗会。该庙会规模宏大,参与的有来自严家庄、买家庄、赵家庄、后家沟、潘家寨、锁龙等村庄的民众,庙里供奉的两位女神分别是九天圣母京华娘娘和九天圣母京皇娘娘。与抗旱有关的宗教活动是抱水取水。该地的青苗会定在六月天,是气候条件决定的,“因为锁龙六月还未天熟,老百姓把丰收的希望寄托在两位娘娘身上,庙会的一切活动都是为此目的而为之,所以当地群众称其庙会曰青苗会。该庙会已入选第二批《甘肃省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李树《岷县境内庙会概况》)

写春联 大年三十日是汉族人辞旧迎新最忙碌的一天。为了除旧布新,增添节日的喜庆气氛,民间均要在门窗框、屋柱上张贴红纸写的春联。春联有对联、斗方和横额之分,内容多为辞旧迎新,祈求来年五谷丰登和吉祥如意之类。

每年春节期间,常有提着礼品春风满面的拜年人,走到那家大门,不急于敲门喊主人,却先要欣赏春联的内容和书法艺术。我记得2006年6月初,我随同事们赴甘肃通渭县城参加普通高考监考,抽空穿街走巷,发现红纸褪色的春联依然历历在目,都是不错的书法作品,不像咱们岷县人的春联,大多为印刷品。“通渭人爱字成风,写字也成风……”(《贾平凹《通渭人家》)每到一户人家的大门,我都禁不住啧啧称赞,流连忘返。

“如果怀有才气,当然可以自制春联,不过对仗要工,平仄要调,并不是上下联字数相同即可充数。”(梁实秋《对联》)“春联的内容不一定是吉祥如意的字眼,有时也是文人抒发郁闷的工具。抗战时期就有两副有名的春联:‘年年难过年年过,处处无家处处家’、‘说什么新年旧年,还不是昨日今朝’,便道尽了离乱人的辛酸。”(国风《中国农民的传统生活》)数年前的正月,去乡下给亲戚拜年,见一农家大门上贴的对联,竟是家长口授念小学二年级的儿子,用竹篾蘸着墨汁写的,真正的孩儿体,其文为:“世事如棋难预料,人心不足蛇吞象。”

著名作家莫言在短篇小说《月光斩》里讲了一个与春联有关的故事:“县城东门外,原有个东关村,村里有户铁匠,姓李,李铁匠六十丧妻,三个儿子,陆续成人,都无妻室,跟着父亲打铁为生。父子都是文盲,春节时,请村里一位曾经当过私塾先生的人写对联,那人好谗,提笔写道:一门四光棍,父子八大锤。横批不合规矩,只有三个字:硬碰硬。此联大为有名,县城的人都知道。”

有人自己作不出春联,就以名人律诗绝句为春联,“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毛泽东的上述诗句,我在上

世纪七十年代的春联上常能读到。在大兴阶级斗争的岁月,书写毛主席的诗句,就是非常有威力的护身符(可能免于抄家吧)。

贴对联也需要懂得对联的知识。横批自左向右书写的,贴对联时,上下联也是这个顺序;横批自右向左书写的,上下联也自右向左。我就知道一位善于解方程的中学老师,将老丈人(也是当地一位书法家)写的两副对联,贴得驴唇不对马嘴。丈人应邀去女婿家做客,看到自己的书法作品,受到如此“委曲求全”的待遇,亲手撕去春联,转身回家了。这乃是春联的不幸,书法家的不幸。

腊八节 腊八节是中国农民进入腊月过的第一个节日。过腊八节,当然要喝腊八粥。吃腊八粥来源于佛教仪式。佛教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29岁离家出走,采用绝食苦修的办法,不但没证得觉悟,反而搞垮了身体,累饿交加,晕倒在地,被一个牧羊女子发现,她将自己的米粥喂给悉达多。悉达多体力恢复后,在菩提树下静坐沉思,于十二月八日得道成佛,佛教徒便把腊八作为佛教的成道节。每逢这天,寺院都要熬米粥,念经敬佛。汉代时,蔡愔去印度求佛返国后,吃佛粥的习俗在我国传播开来。南北朝以后,随着佛教势力的发展,腊八节吃腊八粥的习俗十分盛行。“此月八日,寺院谓之腊八。大刹等寺俱设五味粥,名曰腊八粥。”(南宋吴自牧《梦粱录》)“此月八日”即腊月初八日。其实,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中国人就有过腊八节吃腊八粥的风气。腊八粥象征着五谷丰登。冰心曾写过回忆她小时候过腊八节的文字:“从我能记事的日子起,我就记得每年农历十二月初八,母亲给我们煮腊八粥。这腊八粥是用糯米、红糖和十八种干果掺在一起煮成的。干果里大的有红枣、桂圆、核桃、白果、杏仁、栗子、花生、葡萄干等等,小的有各种豆子和芝麻之类,吃起来十分香甜可口。母亲每年都是煮一大锅,不但合家大小都吃到了,有多的还分送给邻居和亲友。母亲说:这腊八粥本来是佛教寺煮来供佛的——十八种干果象征着十八罗汉,后来这风俗便在民间通行……”(《腊八粥》)

我在故乡过的腊八节,印象很模糊,因为那时正值上世纪70年代中期,村民们的生活状态用

“饥寒交迫”形容最为恰当。我在小时候,根本没吃过米饭,过腊八节时,谈不上喝什么八宝粥,普通人喝的是萝卜拌汤(以腊萝卜丝和燕麦面为原料),家境稍好的人家,喝的是肉拌汤(以猪肉臊子和白面为原料)。近年来,我和爱人也讲究起了过传统节日,爱人为我们煮的腊八粥,以白米、黄豆、红豆、绿豆、枸杞、红枣、葡萄干、蕨麻为原料,就是平常人们所说的八宝稀饭。

我依稀记得,腊月初八那天凌晨,祖母即吆喝尚沉湎梦境的我和同岁的四叔穿好棉衣棉裤,来不及洗把脸,背上背篋,扛着镢头去河滩里砸冰。我对祖母打搅了睡觉,是很有意见的,嘴里嘟嘟囔囔的。祖母问我:“你爱吃我家的梨和杏儿,是不是?”我说:“当然爱吃了。但这与砸冰块有什么关系?”祖母说:“每逢腊八节,乡下人都要砸些冰块夹在果树的树杈里,果树在来年开的花多,结的果子也就繁。赶紧行动吧!”我和四叔真的走出大门,一手握着镢头把,一手捂住耳朵,去了我们天天打陀螺滑冰车的河滩里,每人只挖了半背篋冰疙瘩就打道回府了。在大人们的帮助下,我们将大小不等的冰块,分配给每一棵杏树和梨树。那些捧着冰块的果树,如同捧着银元宝。吃过早饭以后,再来打量果树们,冰块在阳光的照射下开始滴水。我才明白了祖母要我们砸冰的意图,就是在干旱的季节,给果树们嚼些“冰糖”,润润它们皴裂的嘴唇。我和四叔就憧憬起有杏花和梨花次第绽放的春天,又遥想那瓜果飘香的秋天。

清明时节“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清明节既是二十四节气之一,又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

南宋诗人陆游写道:“忽见家家插杨柳,始知今日是清明。”一般认为,“家家插柳于门,以招子推之魂。”(蔡元放编《东周列国志》)清明插柳之风,兴起于春秋时期,盛行于唐宋。清明节那天,内地大多数人家都有在门窗缝隙插柳条的风俗。国风在其著作《中国农民的传统生活》中写道:“插柳的意图有五点:第一,柳枝可以招魂,插在檐前及门上,使鬼魂知有归依,不致迷途;第二,柳枝可以避免鬼或驱鬼,清明时无所归的野鬼甚多,恐其闯入家里作祟,故悬此以驱之,使其不敢入而避去。第

三,柳枝有避毒功能,挥柳可避疫虫。第四,插柳可以预测天气……第五,插了杨柳,可保吉利……”“江苏各地,遍植杨柳,踏青时,人们格外喜欢刚刚吐绿的柳条、柳叶。少年喜爱头戴柳圈……妇女喜爱把柳枝外皮连着绿叶,捋到顶梢处,做成杨柳球,并喜爱把柳球戴在鬓发上,据说,可使红颜不老。”(《民间风俗》)

清明节是人们扫墓祭祖的日子,约在每年的公历4月4日至6日。扫墓是清明节的主要活动。扫墓又叫墓祭,祭扫,上坟。清明节这天,人们备酒馔、香烛、供果,拔除祖宗墓上野草,修葺坟墓,对坟拜祭,以示对死者的怀念。据曹永森在《民间风俗》一书的记述,“秦代以前已有野外祭奠的做法,唐代开始盛行。”陈炳合编写的《农历和农事节气》一书认为,清明节开始于春秋时代晋文公纪念功臣介子推形成的寒食节。慎终追远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清明祭祖的风俗正式形成于战国时期。《孟子·离娄》记述了一个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齐人向东郭墦间乞其余,履足而归,回家后还给妻妾炫耀,证明战国时代墓祭已经相当普遍了。寒食节和清明节在唐朝时期才合二为一,有诗为证:“佳节清明桃李笑,田野荒冢只生愁。雷惊天地龙蛇蛰,雨足郊原草木柔。人乞祭余骄妻妾,士甘焚死不公侯。贤愚千载知孰是,满眼蓬蒿共一丘。”(黄庭坚《清明》)子推之谦和齐人之贪同为一丘了。宋朝诗人高翥也写了一首题为《清明》的诗歌:“南北山头多墓田,清明祭扫各纷然。纸灰飞作白蝴蝶,自泪梁成红杜鹃。落日狐狸眠冢上,夜归儿女笑灯前。人生有酒须当醉,一滴何会到九泉。”孔尚任描述了清朝初年扬州清明节的祭扫情景:“纸灰乱舞荒冈草,遮断红桥柳树烟,最好溪边安冢处,儿孙拭泪看游船。”(《清明红桥竹枝词》)白蛇传的故事发生在宋高宗绍兴年间的一个清明节,身为生药铺伙计的许宣(人称许仙),买了纸马、蜡烛、经幡、钱垛等物品,辗转来到保俶塔寺烧香,追修祖宗。在回去的路上,“不期云生西北,雾锁东南,落下微微细雨,渐大起来……那阵雨下得绵绵不绝。”(冯梦龙《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许宣刚登上一艘渡船,看见一主一仆两个美妇人

朝艄公招手,这才有了同舟共济的话题。白素贞对许宣说:“奴家是白三班白殿直之妹,嫁了张官人,不幸忘故了,见葬在这雷岭。为因清明节近,今日带了丫鬟,往坟上祭扫了方回,不想值雨。”(同上)

清明节又是人们踏青的好时光。“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清明》)唐朝诗人崔护于清明节去城南踏青,走近了桃花盛开的一个农家庄院,叩门讨水喝时,与一光彩照人的妙龄少女邂逅,然后恋恋不舍地离去。第二年清明节,诗人再次来到那家庄院,依然桃红柳绿,只是大门紧锁,无限怅然的崔护,在人家门扉上提笔写下《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过了几天,诗人按捺不住自己,又去寻访少女,见到了少女的父亲,说他的女儿看了崔护写的诗句,病倒在床,已经不醒人事。崔护哭着扑向少女的床边,“我来了!我就是那首诗的作者!”少女奇迹般地复活了,身体恢复健康后,老汉就把女儿嫁给了崔护。优美的诗歌,的确是治疗心病的一剂良药。

二月二 农历二月初二日,是土地神的生日,也叫龙头节,“二月二,龙抬头”。在我的故乡,从正月三十开始,家家户户要煮甜醅,做凉粉,煮猪头肉,啃猪蹄,亲戚们礼尚往来,还要招待坐娘家的女儿。

炒大豆,爆米花,也是该节日的重要内容,童谣曰:“二月二,炒豆个儿”。吃炒豆子,既能补钙,又能健齿,也是节日期间招待亲戚朋友的礼品。儿童们还喜欢聚在一起,玩“丢个儿”游戏。一种玩法是在平地上挖一个拳头大的坑窝,以石头砸河的方式分出宝官和“丢个儿”的角色,“丢个儿”的人站在三尺以外的划线上,往坑窝里丢自家炒的豆个儿,扔进去几颗,宝官要按照一比一的办法赔偿给“丢个儿”的人。扔在坑窝外的豆子,归宝官所有。这类似《西游记》中的抢窝游戏:“只见有两个孩子,在那里使弯头棍,打毛球,抢窝耍子哩。”(第三十一回)抢窝:一种儿童游戏,类似弹玻璃球,先入洞或入洞多为赢。另一种游戏是用木棍或石子在平地上画九个方格,依次写上从1到9的字样,

“丢个儿”的人站在方框以外的划线上,往方格内抛掷熟豆子,压在方框线上和丢在方框以外的豆子,算宝官的,丢在方格内的豆子,赔偿的数目一清二楚。

二月初二这天,有些人家要请女艺人,以颗粒花椒为麻醉药,用绣花针替幼女扎耳孔,将来好戴耳坠。据说这天扎的耳孔,不容易发炎淌脓。

二月初一至二月初三,距离故乡 30 多华里的秦许乡包家族村有庙会,二月初二日是庙会高潮。这几天,大人给孩子门传授起有关这个庙会的歌谣:“二月会上,黄蜡灌上,牛车驾上,把婆娘娃娃引上,黄梨买上,大刀买上……”我家生活穷困,父亲从没有带我浪过二月二庙会。记得在山沟外的扎地初中上学时,逢上会期,身上恰好有 6 角钱,一个同学才吆喝了一声,便跟上他徒步走了 20 里路,才到了会场。庙里供奉着一尊女神雕像,俗称小西路阿婆,后来从当地一些学者的考证文章里得悉小西路阿婆也叫西路太太,书面语叫分巡圣母,本是卓尼康多地区的藏族年轻媳妇,因为不堪忍受婆婆家的虐待,在树林里上吊了。她的鬼魂被

进山割柴的包家族人,用灯笼指引着,带到村庄里,化布施盖庙塑神像,因此,分巡圣母别称灯笼佛。再后来,办了村学,没有教室,老师领着学生就在庙里上课。逢上庙会,学校只好放假。院子中央,无数支黄蜡燃烧的“火焰山”烤得周围的善男信女脸蛋发烫。走出庙门就是戏台,请的是县剧团的秦腔演员,白天黑夜都在唱戏。会场里人山人海,周围都是交易物资的货摊,有卖黄梨、苹果、橘子的,有卖酿皮、凉粉的,有卖糖饼、馒头的,有卖葵花子、落花生的,有买木工制作的大刀长矛的。包家族二月二庙会,又叫黄梨会,到了会场,你不买些黄梨吃,或者给家里老人孩子买些,实在有虚此行。我拿的钱少,买了一个馒头,称了一两葵花子,用剩下的 1 角钱买了一个橘子。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吃来自南方的水果。会场外围,几个男人分别骑一匹骏马赛跑,据说这是藏族人的习俗。我和同学怕马蹄踩伤,只是老远里看了一下黄色的蘑菇云,就沿原路返校了。

(作者单位:甘肃岷县二中)

(接 21 页)

一部分志书都只能为当代政府及一些高层人士所用,却不能在民间广泛流传。存史、资政的功能发挥了,可教化育人的功能被搁浅了。那么,编纂地方志书和地方资料,能不能打破现有的一些框束,大胆革新,融入更多的群众元素呢?“改革是现今全中国人的使命,是我们的历史责任”,没有改革就没有发展。只有通过改革,我们才能把贴近民生的教科书奉献给群众。《庆城综合年鉴》自 2007 年始编,至今已完成 6 卷,在篇目结构和选材内容上,逐年创新,特别是 2012 卷,重点栏目突出,内容更为翔实,增加图片容量,强化大民生的记述,更加贴近人民群众,可读性、感染力大幅增强,至此,综合年鉴突破了由原来只在部门单位内部发放的局限,一些企业,民众更是爱不释手。编修《庆城县志(1986—2012)》,我们将瞄准庆城“一座城、一簇坟、一口井、一群人”四大特色,重点记述改革开放以来,27 年间庆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人民生活的新突破、新变化,力求更加贴近民生,让方志工作接上“地气”,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编符合民意的志书及地方资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地方志资源是一个天然宝库,习近平同志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作为新时代的地方志工作者,我们要大胆地走出框框,创新发展,编修人民群众喜爱的志书及地方资料,放大“资政育人”“资治教化”功能,通过开展史志地情资料库建设、加强史志资源成果开发、加大史志成果的宣传,不断丰富和发展史志文化内涵,激发民众热爱庆城、建设庆城的正能量,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积极打造“民牌”志书,为地方志事业不断注入生机和活力。

(作者系庆城县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

百年沧桑向君寺

令陆胤

当你漫步武山渭河风情线，抑或踏青南山公园绿林间，蓦然北望，巍巍盘龙山蜿蜒起伏，众多支脉像龙爪探渭。山麓坐落着一个个充满生机的古老村庄，山头矗立着一座座满身伤痕的残破堡子。韦庄村塌堡子东，一处红粉院基、青石栏杆、翠柏掩映的寺院，格外耀眼夺目，那就是远近闻名的向君寺。

向君寺正对县城主山老君山故名。因主尊为观音菩萨，当地又称菩萨殿。背倚韦坪山中峰，前临县城区腹地；松柏明月伴寺眠，匾额碑刻放文光；得城区交通便利，拥四众弟子共仰；历数度变革罹劫，赖民众信念坚定，大殿保存依然，宝像毁后重塑，萧墙重整焕容光，圣地开颜颂盛世。每逢农历二月十九日或春节，石雕栏杆、古树之上，灯似游龙，盘旋庄顶；寺比画舫，满载游人；灯火辉映，梵呗悠扬，蔚为壮观。伫立寺南，凭栏而望，县城全貌一览无余，渭河风光尽收眼底。

向君寺，始建于清道光十七年（1837），土木结构，大殿面阔三间，四明柱与绰幕方保存完好，中间两柱上置天禄头像，威猛奇特。山墙顶部清代山水画充满空阔静雅气息，深蕴清静追古韵味。寺南正对泰山庙，地势较之略高，西连山神庙，再西邻文昌庙。民间说日观峰主山黑虎嘴，是“将军坐帐”脉象，泰山庙建此能镇南面之煞，却对韦庄村不吉利，影响仕宦者的前程性命。为镇村趋吉保平安，天锡家（因商铺号名）五世大房奉直大夫张应瑞、韦莫主持修建了菩萨殿及僧房等。而主尊塑观音菩萨，也是鉴于泰山爷的显赫和神力。寺成之后，村里果然平安顺遂，风调雨顺。时天锡家从福建迁到武山正好一百年，而寺院至今也有177年的历史。

向君寺“百年衍化，历劫不衰”。光绪十九年（1893）遭震毁，奉直大夫张玉楼、张鹏采、张成福主持重建，张洞书匾“慈航普度”。民国十年（1921）张兴汉等主持震后重建，张涛书匾“得一以宁”。民国十二年寺南建成山门，张涛书门额“仙笠寺”。民国十三年（1924）九十六军中将参谋长张韬安书匾“难得佛心”。民国二十年张梅等献匾“慈航普度”。一九五八年，磬与两口大钟及匾额俱毁。一九六六年古寺再遭浩劫，神像全毁，山门移寺东南角，大殿改作村学教室。一九八三年村民修缮大殿，将张韬安家四扇精雕花鸟图案的门扇改作大殿窗扇，以保护木雕遗存，兼饰建筑之美。此后，村民大力恢复古寺，重塑神像，彩绘装饰，新修僧房，硬化道路。天锡家九世张如一等立“向君寺纪念碑”，深掘备述寺院历史，开悟随缘素位精神，倡导“卓树文化理念，铸就民俗淳风”，以期“行合天地，聚善心田”，春秋永续，岁月常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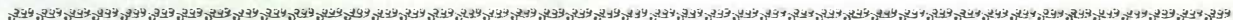
寺内存青石三块，其一靠椅状，两块细颈长伸，人称鸡娃石，惟妙惟肖，颇具情趣，曾被学生常骑，光溜发亮。殿前古柏下一通三棱柱形的鸳鸯玉“长寿不老”碑，字迹隽秀刚劲，方正挺拔，为1924年张潮立张棧书。据张如一讲，张潮乃天锡家七世祖，时天锡家人丁兴旺，家业颇丰，教书行医隆盛，投身报国名显，但像民主斗士张雨僧英年早逝（35岁）者同辈之中就有数人，如曾任四川崇庆州知州的张溥，为官清廉，政绩卓著，四十而卒等。饱读诗书的张潮于是在先祖创建的寺殿前东边柏树下立此碑，以求菩萨保佑、福寿康宁。詎料碑立后，除在张韬安部任第三营军医长的张涛，四十三岁（1926年）在宝鸡战场不幸牺牲外，族人皆长寿，多耄耋者。张潮亦享年八旬有四，其子九二身体硬朗。该

碑历遭劫难仍矗原址，与大殿相依共存，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一方历史的发展，承载着一方百姓的信念，凝聚着族群的精魂和信仰。

向君寺寄托了一方民众向往美好未来和幸福生活的愿望，寄托了他们对先祖构建精神家园功绩的缅怀。一寺一殿一重天，寄寓黎庶夙愿；一砖

一瓦一棵树，铭刻善众功德。向君寺也是当地社会发展的缩影，伴随古寺流传的故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经济、文化现状以及群众的生活状况、精神寄托。

(作者单位:武山县文物局)



力量的源泉

写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时

桂发荣

我们耕耘在华夏几千年神奇的热土上
眺望着东方冉冉升起的旭日朝阳
鸡形版图随着地球旋转正在展翅翱翔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灿烂辉煌

古老的中华史海铭记着历史悲痛沧桑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稿纸书写辉煌
文明古国显示出空前的繁荣和富强
华夏儿女迎着五星红旗贡献才智和力量

中华民族强国富民的梦想源远流长
先锋队的理想照射在党章的旗帜上
人民的智慧闪烁着时代的需求和光亮
群众的力量耕耘着自强不息的篇章

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指明航向
“三严三实”给宏伟大业插上腾飞翅膀
众志成城耕耘着深化改革的土壤
群策群力描绘着振兴中华的乐章
华夏文明的沃土上成长着祖国的栋梁
人民群众的心情格外的激动和欢畅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构想
时时处处体现老百姓的心声和愿望

富强民主撒播执政党文明和谐灿烂阳光
爱国敬业呈现老百姓诚实友善崭新篇章
“从群众中来”收集自由平等的珍珠宝藏
“到群众中去”奉献公正法治的无限希望?

“一切为了群众”凝聚亿万人民殷殷渴望
和煦春风尽情地在民众的田地里温馨飘荡
“一切依靠群众”展示出巨大的精神和力量
滴滴雨露琼浆缓缓流进广大老百姓的心房

“照镜子”的甘霖使乐于修身的肌体洁净流芳
“正衣冠”的神笔描绘出为民务实清廉的设想
“洗洗澡”的节日里闪烁着群众的智慧和愿望
“治治病”的灵丹妙药点缀着惩前毖后的配方

江河将航船围绕航标选出一个新的航向
火红的太阳为大地又披上一层云霓霓裳
绵绵瀚海重新向森林剪裁着绿色的盛装
滔滔长江再次向大海表示出清澈的愿望

高高的山峦上闪烁着强国富民的斑斓霞光
广袤的田野里渗透着“中华梦”的宏伟设想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铭记在全国人民的心房
全心全意为人民向着新的高度努力展翅翱翔

净化心灵聚焦“四风”打开自我反思之窗
对症下药治病救人在活动中真心真意回荡
揭短亮丑将肢体结构整改得更加纯洁优良
敢于坦诚查摆问题检查宗旨意识究竟强不强

大江上下波涛汹涌千帆竞驰乘胜前进不迷航
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歌声符合民心震天嘹亮
长城内外龙腾虎跃万马奔腾为国奉献斗志昂
坚持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巨帆乘风破浪

刮骨疗毒撒开惩治腐败敢于“打老虎”的网
壮士断腕抗起勤政为民善于“拍苍蝇”的枪
踏石留印制定出清正廉明务实的长效大纲
抓铁有痕编制出永远铲除腐败的天罗地网

反腐倡廉将风清气正的火焰点得正旺
群众路线教育给为民富民注入巨大力量
殷殷汗水耕种着清正廉洁的精神食粮
滚滚车轮收获着万众一心的稻谷芳香

理论联系实际飞泻革命传统的蜜汁芬芳
批评和自我批评叠涌根本宗旨的滚滚玉浆
惩前毖后是人民群众伸出的巨手大臂膀
治病救人是老百姓勇敢挺起的高肩阔胸膛

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章》的博大构想
从容的给新时代凝聚“中国梦”的力量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
勉励勤劳勇敢的中华儿女们再创辉煌

先辈们曾经浴血奋战在中华这片热土上
他们的遗愿寄托着前仆后继的无限畅想
英模们公而忘私争当时代的楷模和榜样
他们的闪光心灵点燃着光荣传统的光亮

同舟共济书写民心民智民生的史志文档
为党立碑亿万人民一鼓作气心情激荡
为民谋利全体民众鼓足干劲斗志昂扬
为民立言广泛纳谏即知即改奋发图强

老百姓徜徉在惠民大树下充满着渴望
碧草丽花绽显出饥渴表情却意味深长
人民群众吮吸着阳光雨露的激动模样
盛情的甘露滋润着老百姓干渴的喉嗓

立党为公比学赶帮超争做时代的模范
任劳任怨真心为民撑起乐于担当的标杆
执政为民豪情满怀再苦再累也心甘
问计于民间需于民不辍耕耘流汗流汗

群众的需求靠辛勤的汗水来诚心浇灌
群众的愿望靠不懈的努力争做样板
共产党人中流砥柱乘风破浪扬大帆
民族英雄力挽狂澜前仆后继过险滩

祝愿学习贯彻《党章》的战旗永远轰动
期待执政党勤政务实为民的步伐更加严整
盼望实现老百姓愿望的心声更加火红
中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众志成城

矫健的雄鸡喜迎着灿烂明媚的朝阳
徜徉着伟大的祖国美丽富饶的无限风光
伟大的神龙期盼着祖国处处稻谷芬芳
沐浴着执政党万众一心奔小康的阳光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主义强国梦想
依靠走群众路线插上大展宏图的翅膀
为民务实清廉的新时代战歌更加嘹亮
朵朵葵花向着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作者系金塔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关于致社会各界参与甘肃双联行动的倡议书

各有关单位、机构、社团组织、爱心人士、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者：

甘肃省位于祖国西部地区，地处黄河中上游，地域辽阔，东接陕西、南邻四川、西连青海、新疆，北靠内蒙古、宁夏并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甘肃地貌复杂多样，山地、高原、平川、河谷、沙漠、戈壁交错分布。总土地面积 4537 万平方千米，占全国总土地面积的 4.72%。总人口 2600 多万。

甘肃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县的建制最早从春秋开始，迄今已达 2200 余年；境内汇聚了始祖文化、敦煌文化、丝路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化和红色革命等多元文化。新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段全长 1700 公里。2013 年 1 月 21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甘肃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

甘肃人民经过多年的共同奋斗，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城乡面貌和人民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历史的、自然的各种原因，经济总量小、人均水平低、贫困人口多、欠发达省份的省情还没有根本改变，与全国和兄弟省市发展差距仍在拉大。到 2020 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按照国家新标准测算，全省 86 个县(市区)有 58 个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占全省县(市区)总数的 67%。全省贫困人口达 692 万多，占全省农村人口将近 50%。不仅贫困面广，而且贫困程度深，与全国同步脱贫面临巨大压力。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领导同志对甘肃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加快脱贫致富步伐，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甘肃省委决定，从 2012 年开始在全省开展以单位联系贫困村、干部联系特困户为主要内容的“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从 2012 年 2 月开始，省市县乡四级 15 万个机关单位结对联系 1.6 万个特困村和贫困村，40 多万名干部结对帮扶 67 万特困户，深入农村围绕“宣传政策、反映民意、促进发展、疏导情绪、强基固本、推广典型”六大任务开展工作。两年多来，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广大干部充分发挥组织、人才、智力、技术等优势，带着感情访贫问苦、带着责任结对帮扶，使群众脱贫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2012 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比 2011 年增长 15.3%，增速居全国第 4 位，其中 58 个贫困县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17.7%。2013 年，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51078 元，增幅 13.3%，再破历史记录，实现了全省农民增收“十连快”。这项行动的开展成为机关作风转变的形象提升工程、造福人民群众的德政民心工程，得到中央领导的充分肯定、干部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为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传统美德，恳请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伸出援助之手，更多更好的参与到这项德政民心工程中来，帮扶甘肃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为此，我办倡议：

1. 任何有意参与帮扶的社会各界组织、单位、个人等都可以同我省 58 个特困县中的 1.6 万个贫困村中任何一个村或几个村结成对子，从项目投入、资金援助、信息共享、劳务输出、智能培训等多方面开展帮扶工作。对援建的项目，如：桥梁、公路、学校、医院、文化广场等建成后，可以援建单位、组织、个人来命名。

2. 我办双联单位是华夏第一县——甘谷县大庄乡杨家坡村。目前需援建的项目有：① 2.5 千米村级公路硬化工程，预算 210 万元。② 村级文化广场硬化工程 150 万元。③ 村学改造工程 500 万元。④ 村庄美化亮化工程 100 万元。

3. 联系方式

① 任旺民 甘肃省委农村工作办公室新农村建设处处长 0931-8288695 13993159861 传真：8412629
邮箱：13993159861@139.com

② 孔令奇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出版发行处主任科员
0931-8960951 13919038028 传真：8960951

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2014 年 5 月 15 日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党组书记田嘉一行 莅临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检查指导工作

2014年6月12日下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党组书记田嘉、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李富强莅临省地方史志办公室检查指导工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李虎汇报了全省地方志工作开展情况。

田嘉书记对我省地方志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通过省史志办向全省修志工作者表示问候。田嘉书记要求，甘肃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要认真贯彻落实第五次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对全省各级修志机构的组织指导，把全省修志工作开展好，严把第二轮志书质量关，多出优秀成果，坚持高标准、严要求，推动地方志工作再上新台阶，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